###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 创造力与感知的人类学研究系列

\*\*主编\*\*：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英国阿伯丁大学

本系列书籍探讨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感知、创造力和技能之间的关系。其共同目标是超越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中的传统方法，这些方法将居住的世界视为一个完整对象的储存库，已经存在并可供分析。相反，这些作品聚焦于不断将这些对象带入存在的创造性过程，以及与之纠缠在一起的人的生活。

所有创造性活动都涉及运动或姿态，本系列书籍特别关注理解这些创造性运动与其产生的铭文之间的关系。同样，在考虑人工制品的历史时，这些研究突出了其制作者兼使用者的技能及其带来的转变，而不是追踪它们作为成品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整合。

本系列书籍将具有跨学科的取向，其关注点始终是跨学科的实践：即如何与其他学科一起进行人类学研究，而不是对这些学科进行人类学研究。通过这种“与”人类学，它们旨在实现一种既整体又过程性的理解，致力于开辟新的研究路径，而不是追求最终的合成。

---

###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编辑\*\*：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和乔·李·维冈斯特（Jo Lee Vergunst）

英国阿伯丁大学

\*\*出版社\*\*：Routledge，泰勒与弗朗西斯集团

伦敦和纽约

2008年首次由Ashgate Publishing出版

2016年由Routledge再版

---

### 目录

- 图表目录

- 贡献者简介

- 前言与致谢

- 引言

- 第一章：在马来西亚彭亨州森林中与巴特克（Batek）狩猎采集者同行

- 第二章：行走的故事；留下足迹

- 第三章：行走的困境：比较视角

- 第四章：跟随蹄印的脚步

- 第五章：在景观中表演与做景观：漫步实践、视觉与归属感

- 第六章：聆听时间的声音：与圣徒同行于安达卢西亚村庄

- 第七章：日常生活中的旅行与关怀

- 第八章：穿越废墟的行走

- 第九章：走出教室：在阿伯丁街头学习

- 第十章：魅力工程与行人赋权：日内瓦案例

- 第十一章：“带着线条行走”：行走作为一种美学实践

- 第十二章：可收藏的地形：行走、记忆与记录山脉

---

### 图表目录

1. 多拉·尼齐萨（Dora Nitsiza）和莉莎·杰拉梅卡（Liza Jerameka）寻找软化皮革的石头

2. 克里斯蒂安·拉波德（Christian Rapold）、阿巴库布·//加姆//加埃布（Abakub //Gam//gaeb）和托马斯·维德洛克（Thomas Widlok）在18/18交汇处记录当地关于土地的故事

3. 在度数交汇处的GPS读数，被称为“交汇舞”，游客通过向不同方向迈步以在GPS显示屏上获得完整数据

4. 一位行人在山坡上滑倒

5. 阿伯丁的花岗岩路面

6. 一位行人在爱丁堡的亚瑟王座（Arthur’s Seat）上行走

7. 阿伯丁国王学院外的七年级学生和AEEC领导者

8. 阿伯丁Esslemont Avenue 42号的公寓楼，虚构人物杰米·克雷格（Jamie Craig）的住所，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生活的证据

9. 作者担任AEEC导游时使用的注释手册

10. AEEC“梦想盒”，用于记录行走中体验到的地点的想法、感受和绘画，作为回到教室后进行想象性构建的基础

11. 孩子们在Footdee停下来思考

12. 瑞士的相遇区域，呈现上升趋势

13. Jardins de Poche：长椅作为魅力工程的框架装置

14. Passerelle du Seujet，流水与行人交织在一起

15. 行走艺术

16. 巴黎的通道

17. 《在东京迷路》的流程图

18. 《在东京迷路》中的拉班舞谱样本

19. 《在东京迷路》中的建筑块原型

20. 源自塔可夫斯基电影《潜行者》的迷宫区域安排

21. 完整的迷宫

22. 《在东京迷路》中的照片示例

---

### 贡献者简介

- 伊丽莎白·柯蒂斯（Elizabeth Curtis）：阿伯丁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 蒂姆·埃登索（Tim Edensor）：曼彻斯特都会大学文化地理学高级讲师

- 佩妮尔·古奇（Pernille Gooch）：隆德大学人类生态学部高级讲师

- 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阿伯丁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

- 索尼娅·拉瓦迪尼奥（Sonia Lavadinho）：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领土发展系研究员

- 艾丽丝·莱加特（Allice Legat）：阿伯丁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

- 海登·洛里默（Hayden Lorimer）：格拉斯哥大学地理与地球科学系高级讲师

- 雷蒙德·卢卡斯（Raymond Lucas）：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建筑系研究员

- 卡特琳·伦德（Katrin Lund）：冰岛大学地质与地理系讲师

- 肯尼斯·R·奥尔维格（Kenneth R. Olwig）：瑞典农业科学大学景观建筑系教授

- 莱·塔克-波（Lye Tuck-Po）：环境人类学家，隶属于Naga研究小组和HeritageWatch

- 乔·李·维冈斯特（Jo Lee Vergunst）：阿伯丁大学人类学系RCUK学术研究员

- 托马斯·维德洛克（Thomas Widlok）：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荷兰奈梅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 伊夫·温金（Yves Winkin）：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社会科学教授

---

### 前言与致谢

让我们开始吧。2005年9月，我们在阿伯丁大学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活动，简称为“行走研讨会”。尽管大部分时间我们坐在传统的研讨室里，但参与者们讲述的旅程让我们感觉仿佛已经走遍了远近各地，无论是非凡的还是日常的地方。在空闲的下午，我们去了阿伯丁的山——本纳奇（Bennachie），穿过森林，爬上了开阔的山坡。我们从脚下安静的松针走到了粗糙的巨石、石南和呼啸的风中，这时我们大多停止了交谈，但继续行走。

研讨会的目的是开始探索人类学家和其他工作者所在地区的多样化行走实践。我们感到，尽管“行走方式”这一主题可能经常出现在民族志学者的田野笔记中，但在他们最终撰写和发表的文章和书籍中却很少见到它的身影。它似乎被推到了幕后，通过将“有目的地做的事情”（比如到达某个地方）与“如何做到”（通过一步步沿着路径到达那里）分离开来。我们希望通过关注这两者来发现可能的见解。因此，我们邀请参与者将与他们共处的人的实际行走经历带到研讨会中，以探索生活是如何沿着路径在地面上展开的。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回应了这一任务。在他们提交的论文中，他们不仅描述了人们如何通过他们居住的地方行走，还反思了行走作为一种民族志研究技术的作用。因为作为研究者，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是世界的居民，需要找到最好的方式在其中穿行。对每个人来说，学习如何做到这一点是一个没有明确起点或终点的过程。同样，一次行走或一段旅程的结束——实际上是一次暂停——通常标志着另一次的开始。所以让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衷心感谢所有研讨会参与者的努力。除了保罗·巴苏（Paul Basu）之外，所有参与者都包括在本卷的贡献者中。我们还要感谢阿伯丁大学人类学系的许多成员和朋友，他们也参与了讨论。研讨会得以举办，得益于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UK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用于一个为期两年（2004-2006年）的研究项目，题为《从地面看文化：行走、运动与场所营造》（RES-000-23-0312）。本卷的第8章报告了这项研究的部分结果。最后，我们很自豪地以本书作为《创造力与感知的人类学研究》系列的第一卷，并感谢Ashgate出版社的尼尔·乔丹（Neil Jordan）在启动该系列时的鼓励和帮助。

乔·李·维冈斯特和蒂姆·英戈尔德

阿伯丁，2007年5月

---

### 引言

\*\*蒂姆·英戈尔德和乔·李·维冈斯特\*\*

我们的行走从何时开始？它何时会结束？我们无法记得，也永远不会知道。在这方面，行走与交谈非常相似，两者都是我们所认为的人类生活形式的本质特征。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交谈时，我们已经开始交谈了；只有在我们离开后，别人才会知道我们最后说了什么。我们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也是如此。生活本身既是一次漫长的行走，也是一次漫长的对话，而我们行走的方式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当然，有开始和结束。但每一个开始的时刻本身都处于事物的中间，因此也必须是一个结束的时刻，与之前发生的事情相关。同样，每一步都面向两个方向：它既是通向过去生活的轨迹的终点，也是迈向未知未来的新起点。我们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也是如此。我们开始写作，你们开始阅读，都处于事物的中间，只是因为我们暂时放下了其他任务。然而，我们并非独自前行。我们的主要论点是，行走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活动：在时间、节奏和语调上，双脚对他人存在和活动的反应与声音一样多。我们坚持认为，社会关系不是在原地展开的，而是沿着地面一步步展开的。

通过本书，我们汇集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几条思路：关于人类身体及其运动；关于感知和感官的工作；关于教育、技能培养和知识的形成；关于空间和场所的构成；关于漫游和讲故事；以及关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我们追随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脚步，他在1934年关于《身体技术》的著名文章中，可能是第一个将行走作为比较民族志研究的严肃课题提出的人（Mauss 1979, 95-135）。正如他的许多著作一样，莫斯只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草图，勾勒出一个仍需开展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在其表述上是如此不合时宜——列出了世界各地的习俗——然而在其提出的问题上却如此超前，以至于长期以来无人问津。它被彻底遗忘，以至于大约四十年后，当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77）推出以身体倾向（habitus）为中心的实践理论时，很少有人记得莫斯已经将habitus引入人类学，作为他理解身体技术社会形成的关键，并小心地将其与个体的“习惯”区分开来，通过行走的叙述来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叙述是关于手臂和手的：“我认为我可以认出在修道院长大的女孩。一般来说，她会握紧拳头走路。我仍然记得我的三年级老师对我大喊：‘白痴！为什么你总是张开手走路？’因此，行走也有一种教育”（Mauss 1979, 100）。

确实，行走是整个身体在运动中的成就，既是手和肺的工作，也是脚的工作。

当然，布尔迪厄对habitus的理解与莫斯相去甚远。因为莫斯仍然是他的导师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忠实追随者，将集体表征系统置于他思想的核心。他的观点很简单，即要实施或赋予这些表征以物理表达，必须调用某些物质手段，而对于人类来说，这些手段首先由身体提供——无论是否通过体外工具扩展。因此，身体扮演着集体主体（即“社会”）的客体。布尔迪厄拒绝这种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habitus牢牢地置于身体与其周围环境积极互动的空间中，在日常任务中涉及特定姿势和手势的“实践掌握”或特定的身体hexis（Bourdieu 1977, 87）。例如，一种行走方式不仅仅表达通过文化规则和礼仪教育已经传达的思想和感受。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和感受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在行人运动的实践中，这些文化形式不断生成（同上，93-4）。

但我们是否也可以反过来提出这个命题，认为思考和感受是行走的方式？这无疑是对行走概念的更广泛解释，作为马克辛·希茨-约翰斯通（Maxine Sheets-Johnstone 1999）所称的“运动中的思维”的典型实例。然而，采取这一步迫使我们承认，思考和感受并不是在主观心理状态与客观物质世界条件之间建立外部接触或对应关系，而是通过一个信息世界中的运动，这种运动既与我们周围其他人的运动（我们分享他们的旅程或交叉他们的路径）节奏共振，又是开放式的，既没有起点也没有最终目的地。因此，我们不仅因为我们是社会存在而行走，我们也因为行走而成为社会存在。行走是社会的，这似乎显而易见，但令人惊讶的是，社会科学家对此关注甚少。然而，坚持——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社会生活是行走的，这是一个更强的主张，即社会根植于生活经验的实际地面，我们踩踏的土地与我们呼吸的空气相交。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而不是在某种超越物质世界的话语建构意义的空灵领域中，生活在其相互关系中一步步展开。因此，我们建议，对行走的细致民族志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存在的真正含义。这是一项尚待完成的任务。在呼吁将身体理解为文化形式存在的存在主义基础的喧嚣中（Csordas 1990, 5），我们往往忘记了身体本身是建立在运动中的。行走不仅仅是身体所做的；它就是身体本身。如果身体是文化的基础，那么行走——或运动中的思维——就是“成为身体的基础”（Sheets-Johnstone 1999, 494）。

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指出的（Lee and Ingold 2006），民族志学者习惯于在行走中完成大部分工作。但与一群人生活通常意味着与他们一起行走，而反思行走本身的民族志却很少见，更不用说从我们在这本书中提供的比较视角来看。毫无疑问，行走的主题经常出现在民族志学者的田野笔记中。然而，一旦他们开始撰写结果，它往往被边缘化，转而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人们前往的目的地或途中发生的对话。即使是多地点田野调查（Marcus 1998）也关注地点本身，仿佛生活是在散布的固定地点上度过的，而不是在它们所在的高速公路和小路上。但人们如何步行（绝大多数人类在历史上都是如此）是重要的。他们如何准备和出发，如何穿越那些由于各种原因难以行走的地方？他们如何到达？借鉴现象学传统（Jackson 1996），我们旨在将我们的社会和象征观念嵌入到将实践与表征、行动、思考和交谈结合在一起的日常活动中，并表明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移动中。在描述他们自己的足迹或与他们一起行走的许多地方的人的足迹时，本书的贡献者——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并代表多种理论视角——都怀有一个共同的抱负，即关注与世界进行触觉、脚先行的接触体验。通过介绍，我们将逐一与他们见面，最终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正如一次旅行的结束。

\*\*出发\*\*

当我们开始行走时，我们的目光并不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我们迈出的第一步是试探性的，甚至是实验性的，时间在我们尝试它们时过得很慢。由于还不确定我们的方向或方位，每一步都感觉像是我们的第一步：一个可能引导到第二步、第三步的独立步骤，但也可能毫无结果。换句话说，我们不像运动员在起跑枪响时那样开始行走，瞬间跃入行动。因为只有在走了相当多的几步之后，当双脚找到节奏，身体找到动力时，我们才会发现——没有意识到任何开始的时刻——我们已经开始行走了。在这方面，出发以一种高度简化的形式重演了婴儿期发生的事情。婴儿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近处。试图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到达它，他或她会即兴创作一种混合了步伐和跌倒的运动模式——俗称“蹒跚学步”——直到经过看似漫长的时间后，它成熟为一种完全成熟的行走。当然，婴儿很少独自行走，父母或年长的兄弟姐妹会伸出援手。有时，他们可能会被抱着，而正是在坐在或骑在成年人的肩膀上时，婴儿第一次体验到行走作为一种有节奏的活动，眼睛可以瞄准更广阔的视野，而双脚则自己照顾自己。在此之前，未出生的婴儿在子宫中也会体验到类似的节奏运动。

即使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脚，小孩子们对近处的关注和对周围一切的无尽好奇心——他们想要伸手触摸和观察——可能会不断挫败与他们一起行走的成年人的意图。在现代西方城市中，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街道上的秩序和适当行为规则与来自过往交通或与人群分离的真实风险相结合。紧紧握住的手可能会调解某种接近拔河比赛的情况，成年人由于优越的力量和身材总是胜出，而孩子则必须一步一步地走，以免脸朝下摔倒。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不服从的最终惩罚是被强行绑在婴儿车上，由胜利的成年人坚定地推着走。年长的孩子则被拖在后面。社会学家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描述了城市父母如何将七岁以下的孩子当作行李，像拉行李箱一样拉着走（Wolff 1973）。当成年人向前看，通过与迎面而来的人进行眼神交流来协商路径时，孩子的眼睛则坚定地向下看。当孩子达到学龄时，他或她应该已经通过这种纪律训练“知道”如何行走了。

\*\*认识伊丽莎白·柯蒂斯（第10章）\*\*，她陪同阿伯丁市的小学生沿着街道行走。这些教育性外出的目的是增强孩子们对城市建筑遗产的认识。他们遵循一条预先规划的路线，连接一系列特别感兴趣的地点。在每个连续的地点，他们停下来进行观察和记录。这些观察可能是听觉和触觉的，也可能是视觉的，比如隐蔽沟渠中流水的声音或切割石头的质地。然而，就他们的老师而言，行走本身并不被理解为一种观察实践，他们使用的路线手册也没有提到它。观察被认为是从静止的位置进行的，而不是在移动中进行的。因此，行走仅仅被视为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工具。在行走过程中，孩子们被期望表现得理智并遵守道路安全规则。理想情况下，他们应该以两人一排的整齐队伍行进，这种队形传统上被称为“鳄鱼队”。尽管被指示要看和听，但注意力应集中在交通和行人上，以避免事故，而不是在风、雨或阳光、鸟的飞行和狗的吠叫、水坑和秋叶，以及从蜗牛到栗子、从掉落的硬币到告密的垃圾等无数小事上，这些使每条街道对眼睛仍接近地面的小侦探来说都是一个如此引人入胜的地方。每个孩子都是这样的侦探，尤其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步行上学和回家时，吸收着周围环境在不同天气和季节中的景象、声音、感觉和气味。

\*\*学习道路\*\*

正如柯蒂斯所展示的，受监督的遗产路线将街道变成了教室。它通过将室内学习环境的基本公理带到户外来实现这一点，即知识是通过从不同地点获得的信息，通过头脑和手的工作拼凑而成的，而不是沿着孩子们步行从一地到另一地，通过他们学习的世界的路径生长的。这种知识与运动之间的划分对马来西亚的巴特克（Batek）来说似乎很奇怪，###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 与土著居民不同的足迹

与那些在他们所访问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人不同，探访者并不会在居住的路径上留下他们的足迹。对他们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教室——一个全尺寸的教室地球仪的复制品。

我们在纳米比亚北部遇到了维德洛克（Widlok），这是他非常熟悉的地区，因为他曾在这里的阿克霍·海//姆（Akhoe Hai//om）狩猎采集者中进行过田野调查。为了比较土著视角与探访者的视角，他决定自己注册为一名探访者，并访问该地区三个经纬度完全交汇的地点。不出所料，他发现阿克霍·海//姆在日常生活中所关注的地方和路径并不与这些交汇点重合。从探访者的角度来看，这些地方和路径几乎是看不见的。仿佛他们在到达并占领这些地点时，踏入的是一个尚未被占据的世界。而对于阿克霍·海//姆来说，除非这些交汇点能够被纳入当地的行走和地点创造的叙事中，否则它们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的生活任务不是占领世界，而是居住在其中（Ingold 2007, 81-4）。在追求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人类和非人类居民留下的足迹成为了寻找当地资源的有用线索。然而，这些足迹是通过在世界中行走而形成的，而不是在其表面上踩踏。这些足迹不是印记，而是印象。正如莱加特（Legat）对特利乔（Tłı̨chǫ）的观察，即使人们离开了他们走过的地方，他们的一部分仍然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踩在前人的足迹上，使它们与自己的足迹混合，足以建立一种共同存在的关系。因为居民的足迹是记忆的痕迹。知识和足迹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身体运动与其印象之间的关系。如果知识和足迹看起来是等价的，那是因为知道就是做，做就是执行任务，而执行任务就是记住它们是如何完成的。

#### 留下印象

显然，留下足迹与印刷完全不同。印刷工将已经雕刻或设置好的图案印在绝对平坦、均匀且坚硬的表面上。表面本身不会因这种运动而变形，之所以留下痕迹，只是因为印版或字模已经上墨。然而，居民行走的表面既不平坦也不均匀。正如乔·维尔冈斯特（Jo Vergunst）在第8章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些表面是有纹理的。与他一起在阿伯丁市及周边乡村行走时，我们意识到人们通过精细的步法来应对纹理地面的小障碍，以及那些可能让他们摔倒的绊脚和滑倒。像碎石、基岩、鹅卵石或沥青这样的耐磨表面不会被这种步法留下痕迹，尽管它们可能会逐渐被侵蚀。在草地上，通过脚的定期通过而形成的路径并不是足迹的积累，而是被踩踏的植物茎的矮化或弯曲生长。实际的、清晰的足迹在柔软且易变形的表面上最为明显，如雪、沙、泥或苔藓。然而，正因为这些表面不容易保持其形状，这些足迹往往是相对短暂的。雪可能会被新的降雪覆盖或最终融化，沙可能会被风重新塑造或被潮水冲刷，泥可能会被雨水溶解，苔藓可能会重新生长。因此，足迹具有时间性的存在，其持续时间与它们所属的景观的动态密切相关：有机生长和腐烂的循环、天气和季节的循环。正如肯尼斯·奥尔维格（Kenneth Olwig）在第6章中所论证的那样，居民的景观不应被比作他们表演的舞台，而应被比作他们自己的生活交织其中的挂毯。足迹是挂毯的一部分。

#### 行走与叙事

所有这些方式——在它们的纹理、时间性和在居住景观中的字面嵌入——足迹都与印记不同。也许，它们应该被比作铭文，是在表面上描绘的线条，而不是印在其上的。毕竟，这就是手写与印刷的区别：在印刷中，技术有效的动作与其所传递的图形形式之间没有关系，而在手稿中，字母、单词或字符是手的实际动作的痕迹。然而，足迹又有所不同。人们可以从足迹中读出步行的动作，就像从书写的线条中读出手的动作一样（Ingold 2004, 333）。然而，书写的手与其书写工具在表面上滑动，留下弯曲的痕迹，而踩踏的脚则落在表面上，留下具有一定轮廓和表面形态的凹陷。正是从这些线索中，侦探或追踪者可以“读出”先前经过者的动作和可能的意图。简而言之，足迹是印象而不是铭文，它们记录的是身体与地面之间压力分布变化的运动。这种压力的感官体验通常被描述为触觉。因此，正如维尔冈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地面纹理与触觉有着内在的联系。

#### 行走与非人类

人类并不是城市工业景观中唯一的居民。城市中充满了各种非人类的动物生命，从狗、猫、狐狸和啮齿动物到鸟类、昆虫和蜘蛛。除了城市居民有意与之共享家园的家养动物外，这些非人类通常被隔离在隐蔽或有限的空间中，不会显著影响人类的日常生活。然而，在废墟中，它们占据了上风。正如埃登索（Edensor）所做的那样，在废墟中行走，既承认了普通双足行走的局限性，也承认了这种运动方式只是更广泛运动范围中的一种，更多时候是四肢并用，通过爬行、匍匐、攀爬和挖掘在工业社会崩溃的基础设施上下移动。事实上，埃登索的描述与莱伊（Lye）在雨林中移动的描述有许多共同之处，将废墟视为雨林的城市对应物可能并不牵强。在这两种环境中，地面可能会在脚下塌陷，碎片可能会绊倒你，而你可能会抓住的任何支撑物都可能与它所附着的一切一起倒塌。在这些条件下移动通常涉及尽可能实际地模仿其他生物常用的运动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以类似于它们的方式感知环境。

#### 跨越道路

范古贾尔人（Van Gujjars）不再自由选择他们的季节性迁移路线。他们的行动空间被政府严格限制，政府希望看到他们定居下来，并为此目的在他们的道路上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他们被迫带着他们的水牛沿着现在挤满卡车和旅游车辆的公路行走，这些车辆的噪音和灯光可能会吓到动物。道路是危险的。沿着它们，有权势的人驾驶着他们的机动车辆。对于范古贾尔人来说，用脚和蹄子行走道路是一种政治抵抗的形式。对于纳米比亚的阿克霍·海//姆来说，在独立之前，当该国由南非管理时，任何被看到穿越道路的人，或者其足迹作为证据留下的人，都有被枪杀的风险。正如维德洛克（Widlok）在第4章中所解释的那样，南非军队在该地区切割了一个道路网格，以保护白人定居者占领的土地免受独立运动SWAPO战士的渗透。这些道路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它们允许快速部署部队进入该地区；另一方面，它们作为丛林中的空地，会暴露任何试图穿越的人，从而阻止他们这样做。它们像所有军事道路一样，是占领的线路。它们横跨土著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穿行的居住线路，既为殖民力量开辟了土地，引导人员进入该地区并从中输出资源，同时也对居民关闭了土地，对他们来说，这些道路与其说是通道，不如说是边界。简而言之，这些道路既是将居民拒之门外的方式，也是将占领者带入的方式。

#### 收集生活

在一个人口密集的相遇区域，公共空间从一个几何上受限的区域和结构的静态阵列转变为更像是一个移动中的人类的漩涡。对于被周围人群的潮水包围的个体行人来说，它呈现出一种迷宫的特征。令人惊奇的是，人们如何能够在不迷失方向的情况下找到穿过迷宫的路。雷·卢卡斯（Ray Lucas）去了东京，这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以找出答案，我们可以加入他，尝试在巨大的新宿地铁换乘站中导航。在高峰和非高峰时段逆流而行后，卢卡斯从身体中心的角度回忆了自己的动作，最初通过将他的行走与舞蹈进行比较。这使他能够通过标准化的舞蹈符号记录这些身体动作。记录揭示了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然后他可以使用建筑绘图的惯例重新描述这些主题。每个主题都采取走廊的形式，其线性轴对应于时间的流逝。通过这种方式，卢卡斯能够重建个体地铁行人在应对人群移动、广告和标志的干扰以及他们路径上的许多障碍时的实际建筑体验。他向我们展示了，对于地铁居民来说，行走本身就是一种建筑实践，它生成了自己的形式，从中出现了迷宫的整体。这些形式与任何官方计划或车站地图上显示的内容都不对应，它们是人们真正移动的形式，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城市中穿梭。

正是在这种迷宫般的形式中，城市也出现了，并吸引了漫游者（flaneur），这在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诗歌中得到了极大的赞美，随后在哲学家和评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作中也得到了赞美。漫游者用他的脚在城市的小巷中留下印象，他在其转瞬即逝的细节中找到了无尽的魅力。正如本雅明所观察到的，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侦探。他的眼睛和耳朵对任何偶然但揭示性的事件都保持开放和警觉，他对周围无数生活的每一个小线索的兴趣类似于小学生在去学校的路上。正如柯蒂斯（Curtis）在第10章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城市儿童的无监督探索与他们被组织在城市街道上从点到点的鳄鱼队形行进的经验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同样，漫游者与游行中的行军者完全相反，后者在行进时看不到也听不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因此，与埃登索（Edensor）在第9章中描述的现代城市中行人受监管、标志和监控的流通相比，拉瓦迪尼奥（Lavadinho）和温金（Winkin）在第11章中描述了城市居民在融入自己的小地方——一个花园、一条长椅或一座小溪上的桥——时所感受到的喜悦，他们可能会在那里停留片刻，思考、梦想、回忆，并可能被意外所震惊。这些地方不是目的地或特别感兴趣的地点，需要单独访问。它们只是人们日常步行回家或上班时所经过的路径上的休息场所：停下来盘点的地方。

作为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事件的收集者和回忆者，漫游者可以与另一个行人角色相提并论，我们在第13章中由海登·洛里默（Hayden Lorimer）和卡特琳·伦德（Katrin Lund）介绍。这个角色是“芒罗收集者”（Munro-bagger）。但芒罗收集者收集的东西不是小或短暂的。它们是山脉——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苏格兰海拔至少三千英尺的山峰。每座被攀登的山峰都是另一个被收集的芒罗，真正的爱好者的目标是收集所有的芒罗。像漫游者一样，芒罗主义者用他的脚而不是手收集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四处走动。山脉可以以任何顺序收集，在各种天气条件下，产生一条轨迹，如果将其绘制出来，它将像漫游者的轨迹一样随意、迷宫般且依赖于环境，如果重新讲述，它将充满看似琐碎和偶然的内容。然而，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因为芒罗主义者如果不是有条不紊的，就什么都不是。尽管他们的野心更多地受到国家而非全球理想的驱动，但他们与维德洛克描述的探访者相似，因为他们所寻求的山峰是由一个任意的标准挑选出来的，但这个标准仍然带有科学测量的印记：这里是海拔而不是纬度和经度。收集一个芒罗类似于注册一个交汇点，而收集芒罗则提供了苏格兰高地的“有组织的采样”，这与收集交汇点应该提供的整个地球世界的采样并无不同。###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 来与去

在前几页中，我们压缩了许多关于行走的生活，这些生活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以更长的篇幅展开。从婴儿的第一步开始，我们上学并与同学一起行走，聆听长辈的故事，跟随他们的足迹，留下我们的脚印，穿越废墟，在雨林中滑行，参加宗教游行，放牧绵羊、山羊和水牛，穿越沙漠，攀登高山，漫步城市街道，挤过高峰时段的拥挤人群，如今——年长、更智慧，或许脚步有些疲惫——我们正在回家。这并不是说有一个终点线。正如没有一个明确的点标志着我们开始行走一样，回家时也没有一个点标志着我们停下来。相反，与出发时几乎完全相反，步伐逐渐缩短为蹒跚，随着身体失去前进的动力，每一步之间的连续性不再确定。每一步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动作。事实上，如果出发简要地重演了婴儿时期行走的发展，那么回家则预示着晚年行走的衰退。除非发生意外，老年人并不会突然停止行走。然而，随着肌肉的萎缩和身体重心的上升，老年通常会带来力量和稳定性的下降。随着每一步变得更加试探性，必须临时采取辅助手段来移动，通常包括使用拐杖、支架和其他人的支持。时间变慢，注意力从地平线转移到越来越近的事物上。逐渐且不知不觉地，步行运动进入了“蹒跚”、“摇晃”甚至——在现代西方社会对老年的公然婴儿化中——“蹒跚学步”等术语所描述的灰色区域。

然而，变老是一个终身的过程，人们必须不断调整他们的行走模式和风格，以适应他们自己发展中的身体以及与他们一起行走的人（包括幼儿或老年人）的身体所经历的变化。这些调整并不仅限于幼儿期和老年期。它们一直在进行。可以说，人们必须不断地回到起点，在途中学习和重新学习行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身体能力和环境条件。因为人生的漫长行走并不是从起点到终点，或从摇篮到坟墓的单向进程。它并不从A到B。由于没有明显的起点或终点，它更像是围绕A、B、C、D、E和无数其他地方的迂回运动。在这样的运动中，离开任何地方都是返回它的过程的一部分。远非从过去无情地迈向未来的单向行军，它是一种通过拾起并继续前行早期生活的足迹来保持自身运动的运动。由于跟随足迹就是记住它的走向，因此在当下前行本身就是对过去的回忆。因此，正如Lye提醒我们的（第2章），每一次向前迈进都会让人回到旧时的常去之地和小径，回到过去和历史。

在某种程度上，向前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回归，步行者能够解决Widlok在第4章中所谓的“来即是去”的困境，即转向某个地方必然意味着离开另一个地方。Widlok指出，这个困境不仅关乎步行者，也关乎其他人，因为它意味着与那些留在转向之地的人的关系的放弃，以及与那些在前往之地的人的关系的建立。鉴于没有人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这个困境永远无法完全解决。然而，通过在每一个地方留下一个持续存在的象征，承诺最终会回归，一个人可以同时背对他人并朝向他们前进。正如Widlok指出的，在迂回运动中，“出去”和“回来”之间没有区别——没有明显的分离点。那些生活在这种运动中的人，包括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既不是来也不是去，而是永远“来去”。例如，在他们居住的地区，Gooch（第5章）描述的Van Gujjars被称为“来去之人”（ana-jana lok），因为他们往返于夏季和冬季牧场之间，并在每个迁徙轨道的两端，往返于营地与动物放牧的地点之间。这些后者的运动与主要的季节性迁徙相比，就像一根打结的绳子的松散、磨损的末端。在森林中的冬季月份，水牛在夜间以从树上砍下的树枝的叶子为食，从离营地最远的树开始，随着季节的推移逐渐靠近。每天晚上和早晨，动物们在营地与砍伐的树木之间来回走动，由人类的声音引导。正如Gooch所示，人类和水牛脚的来去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小径网络，从营地扇形展开进入森林。

对于Batek人来说，营地生活的来去——用Lye的话说，“一个不断重复的行走过程，这里、那里和到处”——在微观上体现了一个更广泛的运动模式。因此，在他们的觅食探险中，人们会直接前往离营地最远的点，然后沿着无数的迂回路线返回，寻找并收获森林的丰富资源。正如Lye解释的那样，来和去都结合在Batek术语lew中，这个词既意味着“离开”也意味着“到达”。然而，Batek人在穿越森林的错综复杂中找到道路的信心中夹杂着不确定性。即使沿着一条小径前进，每一步都是进入未知的一步。就像在迷宫中一样，小径可能会欺骗人，走到死胡同，或让人迷路。一个人可能会离开而无法到达。因此，Batek人并非不怕森林。对他们来说，就像对所有人一样，恐惧和信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偶尔人们确实会迷路，就像他们有时会生病一样，特别是如果他们过于自信，没有遵守适当的预防措施或没有像应该的那样仔细观察他们要去的地方。在第8章中，Vergunst描述了与同伴在苏格兰东北部山区行走时迷路的感觉。那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经历。生活似乎比平常更加脆弱，脚下的地面也不那么坚实。迷路就像睡着了一样：相当于暂时失去意识，你在那一刻无法意识到它。当任何意识出现时，那一刻早已过去。如果你永远不醒来呢？如果你永远找不到回到生活之路呢？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们最终都会死去。当我们以不同程度的信心走过人生时，我们带着关心和忧虑，知道最终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会迷路，而是何时。但即使我们哀悼那些我们失去的人，他们也会在那些跟随他们足迹的人的记忆中继续存在。当一段旅程结束时，其他旅程开始，生活继续。

#### 第2章

在走得太远之前：与马来西亚彭亨州森林中的Batek狩猎采集者一起行走

Lye Tuck-Po

本章探讨了马来西亚Batek人行走实践中的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他们是居住在森林中的狩猎采集者，至少在我进行所有研究的彭亨州，他们大多是流动的。所谓“流动”，我指的是Batek人总是在移动，无论是在一天的活动过程中从营地到森林再返回，还是在他们的传统领地内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或者从森林到外部，寻找购买的商品、工作机会或当地村庄和小镇的刺激（Lye 1997; 2004; 2005）。即使在一个定居的聚落中，他们也会像在森林营地中一样移动睡觉的地方和房屋（Lye 1997, 390-428）。如果说有人可以被称为有行走生活的人，那就是他们。

这个矛盾是这样的。一方面，Batek人对他们在森林中找到道路的能力充满信心，甚至感到自豪。他们以那些在家庭氛围中感到舒适自在的人的自信行走。另一方面，听Batek人谈论他们的情感时，最常表达的是恐惧（?əŋtəŋ）——对森林中的特定危险，以及对特定类型的行走经历——给人的印象是恐惧无处不在，甚至在他们内心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如何调和这些恐惧和自信的表达？恐惧是一种威慑吗？如果它确实阻止了Batek人在森林中行走，那么它的作用确实非常微妙！行走是与森林互动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它也引发了对森林危险的意识。当行走将身体向前推进时，恐惧将其拉回，正是这种在相反运动方向之间的拉扯，构成了狩猎和采集实践的特征。

我提出的问题暗示了身体与心灵、知道与恐惧、自我与环境、来与去之间的分析性分离。然而，我的民族志表明，这是一种错误的分离，或者至少这些二分法需要修正。尽管如此，我将暂时坚持它，以澄清在雨林中行走的意义以及对这些狩猎采集者意味着什么。像许多土著民族一样，Batek人是优秀的民族学家（比较Benjamin 1966年关于Temiar的研究），因此，按照他们强调观点的习惯方式，我将使用我自己的经验进行说明和比较。

#### 与森林同步

为了避免给人孤立和偏远的印象，我首先要指出，Batek人主要是低地民族，而马来西亚半岛剩余的大部分低地森林是分散的，并被道路包围。根据我的经验，Batek营地总是在马来村庄的步行距离内，可以在那里购买物资和找到工作机会。Batek的行走实践包括访问这些村庄，Batek的小径通常与伐木和通道道路、村庄小径和铺面道路相连（Lye 2005）。最大的连续Batek森林位于国家公园Taman Negara（4,343平方公里）内——其中大部分横跨他们的传统领地——在那里，Batek和游客的小径经常交叉。尽管承认景观分散的影响，但在本章中，我最关心的是森林中发生的事情，这是Batek人最了解的。

大约120年前，Miklucho-Maclay对吉兰丹的Batek人作了如下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准确的：

知道他要去的方向并保持视线，他试图找到树林中较亮的地方。在不折断它们的情况下，他用手拨开无法避免的年轻树木；他弯腰或爬过较大的树木。他永远不会撕掉或砍掉挡路的藤蔓，他更喜欢用手抓住它并爬过去；尽管不断弯腰、爬行、挑选路线和曲折前进，他仍然以极快的速度前进（Miklucho-Maclay 1878, 212-13）。

行走仍然是热带森林中的主要移动方式。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涉及什么——以及要求什么。（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热带森林中的行走是否以及如何与其他类型的行走不同，但我没有资格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一种回应是将行走实践视为对气候、环境和地理限制的一系列文化调整。然而，这种方法暗示需要“文化”来克服森林的“自然”，并可能将森林视为“古老”、“原始”或“未受人类触及”的丛林，将人类与它的互动视为必然破坏生态和摧毁“荒野”的干扰（关于这种模式的问题，参见例如Botkin 1990; Cronon 1996; Dove, Sajise, and Doolittle 2005; Ellen and Fukui 1996）。当前的教条强调，当地社区有着悠久的操纵自然植被的历史（Latinis 1999; Yen 1989）：这些干扰通常是维持森林覆盖的组成部分（Ellen 1998; Fairhead and Leach 1996; Rambo 1979）。例如，Batek人监控并干预他们喜欢的食物来源（如野生山药和季节性水果）的生命过程，在再生和恢复后返回收获，并通过跟随彼此在景观中的运动来跟踪供应的全面可用性（Lye 2004）。他们改变环境，提高其生产力，并“回顾”评估他们对生物种群的捕食效果。另一种干扰，往往被更戏剧性的实例所掩盖，但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Tilley 1994），是通过数千年来的人类运动带来的：在森林中创造小径。我将从这里开始。

Batek的halbəw是一个核心文化象征。没有它，行走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沿着既定的路线还是偏离路线（例如作为捷径），人们都遵循halbəw：它既是路径也是路线，既是遵循的方式也是运动的方式。路径和运动的概念在其他方面密切相关（Lye 2004, 59）。例如，同一条路径在上坡时会成为（halbəw）cəniwəh（源自动词cwəh“上升”），在下坡时会成为（halbəw）pənisar（源自sar“下降”）。动词中的插入将它们变成名词：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运动创造了路径。由此，路径不仅仅是从这里到那里的手段，行走也不仅仅是覆盖距离。

让我们考虑一个最直接的Batek行走例子：从营地（hayã?）到森林（həp）。Cip ba-həp（字面意思是“去森林”）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比喻之一；这是人们通常在早上醒来时预期要做的事情。但这样一次行走的前奏可能是最曲折的（对不耐烦的人来说是折磨）。

1995年12月30日，Taŋuy / Tələm

我在棚屋里看着早晨的忙碌。今天早上，?eyCənceŋ的hayã?是几个男人的焦点。可以听到一些讨论。?eyNon走了出去。?eyGk走了进来。Kayə?和Bəhi?等人过来了。他们走了进来。最后，小组离开了：?eyCənceŋ, ?eyN0n, ?eyPayol, Bəhi?。

我去了na?Non的家。女人们催促我和她们一起去村庄。我不情愿。她们说她们害怕gob ?o? ŋaw（疯狂的马来女人），而我很勇敢。最后我同意并去拿我的东西。Na?Gk（我当时的主人）已经离开，决定和na?Alor一起去挖东西。?eyGk也离开了。当我准备好出来时，na?Non家的小组已经离开——去了Taŋuy（相邻的营地）等待。我跟着。10:20到达那里。

营地里挤满了人。?eyGk和?eyKadoy在摆弄两台链锯。?eyPaliy坐在一旁。Na?Gk和na?Alor以及她们的孩子在一个角落。kəradah（单身女性）在另一个角落。我坐在na?Gk的旧棚屋里。我仍然不知道谁应该去哪里，尽管我以为只有na?Non和na?Payol会去商店。男人们要去“təbεs te? gob”（清理马来田地）。

十分钟后，我们出发去商店。Na?Non, na?Payol, Ciwat, 孩子们。Na?Kadoy本应和我们一起来，但当我们叫她时，她说她不来了。我们走到第一个转弯处时，听到后面有更多的叫声。kəradah Non, Yip, 和Gol加入了我们。

只有在我们从旅行回来后，来去才变得清晰。

这个场景的两个特征与我的讨论相关。第一个在于“来去”：一个不断重复的行走过程，在营地中到处走动，与营地伙伴讨论计划和轨迹，并经常——通常是自发地——修改它们。这个场景确实是Batek社会中更广泛运动的缩影。每一个活动的加入意味着不加入另一个活动，人们在评估他们的选择和愿望时可能会变得非常激动（Lye 2004; Widlok本卷）。第二个特征在于“即兴创作”（Rosaldo 1993, 109-126），事件通过它展开；它们没有正式编程和调度的确定性。即兴创作是行走前的背景，它影响行走的背景，因为对话继续，对留在后面的人的不满在小径的隐私中表达。即兴创作也沿着小径继续：有些人可能会掉队，有些人可能会突然离开去尝试其他追求，小组的预期收获可能不会实现，其他东西可能会被看到（或听到），新的收获机会可能会出现。

1995年9月27日，Tom Tabεn，Taman Negara国家公园

水果采集

10:04am 离开营地。沿着游客小径前往Lata Berkoh。我设法在狭窄的桥上过了小溪，尽管有些帮助。小径沿着Tahan河上游，偶尔我们走在河岸上。爬上一个相当陡峭的山坡，然后平缓下来，再爬下一个山坡。我们超越了游客——两对男人。我们享用了之前收获的payit树（Nephelium spp.）的剩余部分，然后绕了一圈，走过一个位于Tahan河附近悬崖上的旧营地。这里的小径开阔了——显然是一个过去常用的小径。小径在河流尽头再次与游客小径交汇（使用小径的游客必须在那里过河）。我们穿过游客小径到另一边，走了几分钟到达payit树。当她们开始tutoh（砍下树枝）时，两个女人寻找另一棵树，据说“人们”说那里有，但没有运气。两个女人爬上一棵较小的树——扔下果实。

10:11 停下来等其他人赶上。听到后面有游客的声音。

尽管我勤奋地记录了这些片段的时间，但我显然太忙于活动（或太饱食水果）而无法写太多。我现在想知道，例如，在中午到下午2点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在做什么。正如我在另一份田野笔记的结尾所写，“像往常一样，我对在森林中度过时间如此容易感到印象深刻。”我开始在我们有目的地走向第一个计划中的停留点时，草草记下小径的特征；然后，随着一天的推移，方向和目的地变得混乱，因为我们的探索提出了新的选择，新的活动被加入到我们的计划中（我记得，最初的意图声明是“让我们去找payit水果”）。时间，我用作活动标记的时间，正在流逝。这不是一个适合清晰写作的环境！

这段笔记说明了森林探险通常如何进行：首先使用一系列捷径走到最远的点，然后开始搜索和收获——这需要绕道和转向——返回营地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身体表现。一路上，我们（从我描述的一些明显例子中）观察、监控、记忆、倾听、触摸、蹲下和攀爬（最后一个没有我的参与），除了踩在地面上、涉水过河、推开植被、砍下果实累累的树枝、吃果实、导航路线、定位营地、Tahan河和果树群，当然，还有谈论和讨论水果收获。我们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向前看（birəy），但我们也扫描树顶（bilay，“向上看”），并侧视和回头看（kihley）寻找果实和与之相关的动物的迹象。至少我们中的一个人，准备好吹管的Heŋ，也在倾听和寻找猎物的叫声和踪迹。

一些小径的部分，特别是在茂密的森林中，不容易记住，整个路线可能不应该由新手独自完成。即使是有经验的导航员也曾迷路。然而，一旦完成这样的旅行，经验就会融入个人对森林景观的知识中，并通过“地形八卦”（Widlok 1997）融入集体的记忆。回想我的笔记中寻找第二棵payit树的徒劳。关于那棵树的信息来自“人们”：更确切地说，“gən kədəh”（“他们说”）它在那里。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细节是错误的。许多探险都是由这样的八卦引发的。谈话和行走是不可分割的，这让我回到了最初的观点。如果行走创造了路径，如果行走本身是一种社会行为，那么没有使用它的人的故事，路径还能有任何意义吗？每当我请Batek人谈论路径的生态和分类时，结果并不十分有效。然而，稍加耐心，关于运动和旅行的故事就会滚滚而来。路径是社会现象，它们与社会事件相关而被记住。

1995年9月15日，Tərŋin

Ta?Raŋləs在我旁边喋喋不休。天很黑，很晚，我非常想睡觉。但老人继续喋喋不休。有一次我惊醒，听到他说他刚从某个地方旅行回来，去看了吉兰丹附近的一个孩子——他的孙子。孩子生病了。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我走啊走啊走啊，我想。我想啊想啊想啊，我走啊走啊走啊，我想。我想……我没有“抓住”他如此专注的是什么。那个晚上谈话的剩余印象是行走、思考和行走的节奏性结合，地点、运动和思想的结合。

我现在想转向一些语言讨论。尽管我上面提到的许多身体动作都有独特的动词来识别，但整个表现可以标记为cip bahəp（去森林）。动词cip，反过来，既意味着“行走”也意味着“去### 第三章

### 行走的故事；留下的足迹

\*\*艾丽斯·莱加特（Allice Legat）\*\*

1993年至2001年间，我与多格里布地区长老委员会（Dogrib Regional Elders’ Committee）合作，参与了三个为期多年的研究项目，旨在记录特利乔人（Tłı̨chǫ）关于治理、驯鹿和地点的知识。特利乔人是加拿大西北部德内人（Dene，或称阿萨巴斯卡语系族群）的一部分，至今仍占据并使用加拿大西北地区大奴湖（Great Slave Lake）与大熊湖（Great Bear Lake）之间的区域。在这些项目中，长老及其领导层讨论和行动的一个持续主题是讲述故事、行走路径以及前往过去事件发生地点的重要性。尽管这些项目的目的是为资源管理和自治记录特利乔人的知识，但越来越明显的是，长老和领导层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故事“思考”并成为有知识的人。自2002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理解这一过程，试图弄清对特利乔人来说，成为有知识的人意味着什么。在本章中，我将从行走故事和留下足迹的角度探讨这一过程。具体来说，我将把行走视为将叙事与个人知识获取联系起来的体验。行走因此验证了过去在当下的现实性，并在此过程中不断重建地点、故事以及所有使用该地点的生物之间的关系。通过行走，一个人可以与一个地点建立亲密关系，创造一种在先行者足迹的引导下沿着路径行走并成长的情境。

许多学者已经探讨了口头叙事、经验和地点之间的关系。与德内人（包括特利乔人）合作的人类学家普遍认为，北方德内叙事包含了深厚的时间知识（Cruikshank 1981; 2001; Hanks 1996），而有知识是基于通过工作和倾听更有技能的人所获得的经验（Cruikshank 1998; 2001, 390; Goulet 1998）。德内人自己也认为，那些广泛旅行的人受到尊重，因为旅行是学习和理解德内宇宙观的关键（Andrews et al. 1998, 312; Brody 1981; Ridington 1990）。此外，德内人尊重那些能够通过梦境和愿景等方式自学的人（Goulet 1998; Watson and Goulet 1992）。

然而，自学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与他人一起的活动中进行的。古莱（Goulet 1998）展示了学习如何在德内社区中扎根。关于拉普兰的萨米人，英戈尔德（Ingold）和库尔蒂拉（Kurttila 2000, 192）认为，学习涉及“在人们与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互动中生成和再生知识”。对特利乔人来说，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存在，这意味着学习始终是情境化和有引导的，即使周围没有其他人。我称之为“引导式学习”的过程，对特利乔人来说，包括通过听故事接收信息，并在特定地点执行任务时行走路径。因此，信息并不是从故事中提取的内容，而是故事本身，即事件和发生的过程如何被关联和整合在一起。这些故事讲述了与政治和社会努力相关的地点。例如，戈特索卡蒂（Gots’ǫkàtì）是1829年阿凯乔（Akaitcho，其后裔是耶洛奈夫-奇佩维扬德内人）和埃德佐（Edzo，其后裔是特利乔德内人）同意和平共处的地方（Helm 1981, 296）。

因此，地点不仅仅是人们访问时感到愉悦的空间。相反，与地点的关系从孩子们第一次听到叙事时就开始了。大多数故事在前往命名地点并直接体验之前已经被多次听过。通过访问、行走和在某个地点执行任务，个人既带走了一些地点的东西，也留下了一部分自己。在此过程中，个人将他人的叙事添加到自己的叙事中，同时深化了他们的感知层次（Casey 1996, 18）。巴索（Basso 1984）强调，地点被西阿帕奇人用作获取故事、历史和土地知识的索引。地名可能对那些了解地点和相关故事的人传达意义（Cruikshank 1990），但这些名称只能反映任何个人基于经验和与社区其他成员互动所能理解的内容（Hallowell 1967, 193）。

安德鲁斯（Andrews）和佐伊（Zoe 1997, 172）解释说，对特利乔人来说，故事存在于路径沿线的地点，地名是包含知识的故事的“记忆钩”。此外，“地点代表了通过旅行和讲故事实现的物理文化过程的体现”（Andrews et al. 1998, 312）。基于他们的讨论，我探讨了几种情况下，不同年龄的特利乔人如何跟随他们先辈的足迹。通过解开故事与通过在地点获得的个人知识之间的关系，我旨在表明，在听故事和行走之间的时期标志着学习的中间阶段，在此期间，听过“谈话”的人尚未知道叙事的“真相”或现实。

### 分享叙事

在与尊重土地相关的仪式中，人们通常将土地比作父母，“因为它提供了一切”，包括“知道某事”的能力。因此，土地是一个具有力量的活体，如果要保持和谐，就必须对其表示尊重。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是“支付土地”，这通常包括留下一个被认为有用的物品。当旅行者进入新的水域时，他们会这样做（Andrews et al. 1998, 307）。他们还会支付那些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地点。我从未见过任何特利乔旅行者经过这些地方而不停下来表示尊重。这通常包括绕行地点以确定一切是否如常，并在附近有墓地时整理墓地。曾经访问过该地点的个人会向同行者讲述该地点的故事，并在继续旅程之前享受“野餐”——通常包括通过将喜爱的食物放入火中来喂养先辈。这一过程使每个人都能更好地了解地点和故事。这些行动在当下验证了故事，同时保持了与仍然依附于特利乔地点的先辈的关系。我曾看到特利乔长老在走向奇佩维扬圣地时支付土地，那里有一个愿意帮助需要治愈的人的妇女的灵魂居住在瀑布中。尽管人们会在瀑布留下尖锐的工具，如锥子、针和刀，但我观察到的特利乔长老用云杉树枝支付了通往瀑布的小径。

从这样的旅行返回后，以及在访问墓地和其他圣地时，每个人都会通过故事分享他们的经历。长老们通常会通过讲述故事来澄清、增强或补充这些经历。听众在走向这些地点时成长和变化，通过他们的思想行走他人的足迹，再次被吸引到小径上。正如巴索（Basso 1996, 31）所解释的那样，许多足迹或痕迹以地名、故事和歌曲的形式出现，讲述了过去事件发生的地方。同样，克鲁克香克（Cruikshank 1998）和萨里斯（Sarris 1993）指出了讲故事者叙述方式与听众倾听和理解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是人们学习如何思考的关键。

对特利乔人来说，先辈的足迹嵌入在继续被使用和行走的地点和路径中。因此，他们用来思考的故事充满了对路径和地点的详细而准确的描述。这些故事构成了构建个人对现实感知的基础。

成年人不断讲述故事，包括对年幼的孩子，以便他们能够从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成长，最终行走路径和地点，亲身体验这些故事。里丁顿（Ridington 2002, 117）同样指出，对丹尼-扎阿人（Dane-zaa）来说，孩子们通过共享的叙事传统为他们的经历做好准备。因此，特利乔人永远在倾听故事，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随后通过经验得到验证。在讲述故事时，讲述者通过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事件来扩展原始故事。一旦获得个人知识，一个人就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并最终为未来留下自己的足迹。正如里丁顿所说，对丹尼-扎阿人来说，“每一次讲述都是一种解释性的再创造，而不是背诵”（2002, 11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特利乔人认为吹嘘自己所知是无知的表现。因此，他们讲述的经历故事通常集中在观察到和遇到的事情以及同行者身上。是否知识渊博是由他人来评论的。这通常基于一个人的叙述技巧，但也基于他们的生产能力：例如，驯鹿狩猎的成功、影响政府官员态度的能力、鱼干架上的鱼的出现、缝制漂亮衣服的技巧以及从地区和联邦政府获得资金的能力。

特利乔长老鼓励个人从地点中学习，并在面对新情况时使用“故事来思考”。他们用故事来构建年轻人感知其经验的背景。正如七十多岁的特利乔长老罗米·韦特拉德（Romie Wetrade）所说：

“至于我自己，我不懂英语。一点也不懂。我不知道如何阅读。一点也不懂。我不知道如何阅读白人的文字……即便如此，我的年迈父母抚养了我，我过着美好的生活，因为我听了他们的故事。我的先辈的谈话就像保存一本书。我记得它……我通过依靠先辈的知识活到了这个年纪。他们的知识超越了书本……我的先辈所拥有的知识让我感觉好像坐在他们旁边。如果我想一想，我正坐在他们所有的知识之下。”（罗米·韦特拉德，TGP-93/03/30-1/1）

同样，八十多岁的长老安德鲁·冈（Andrew Gon）解释了他的先辈如何利用过去的知识在土地上行走以生存。他们必须了解三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因为他们跟随驯鹿从北方森林到荒原。此外，他们必须知道在哪里扎营以确保在驯鹿迁移到其他地方时有良好的捕鱼条件，并且在资源有限的年份，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的亲戚可能在哪里扎营——包括那些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至少这意味着要知道允许他们通过复杂河流系统找到路径的叙事，以及如何在荒原上旅行，那里必须穿越大湖和大片土地，而风不断吹拂。正如安德鲁所说：“我们的先辈经历了艰难时期，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跟随他们的足迹，利用他们的知识来生存。”（安德鲁·冈，TGP-94/02/17-1/1）

在这些和其他陈述中，“他们的足迹”和“他们的知识”是可以互换的。“知道某事”意味着能够采取某种行动。罗米和安德鲁都在解释听故事对未来### 第四章

#### 行走的困境：比较视角

托马斯·维德洛克（Thomas Widlok）

##### 引言

行走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中哲学反思的重要主题，近年来也成为了文化历史研究的热点。最近的文化历史研究涵盖了从行走与特定写作类型的关系，到军事史、时尚、艺术和建筑，再到将行走视为抗议运动的讨论（参见 Amato 2004；Jarvis 1997；Konig 1996；Solnit 2000；Wallace 1993）。由于涉及领域广泛，文化历史学家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世界，而将非西方案例留给人类学家去记录（Amato 2004, 15）。然而，尽管社会人类学关注文化差异，但迄今为止，这一学科对人类普遍属性——即直立行走的能力——的讨论却相对较少（例如，Keesing 1981, 13-14）。直到近年来对身体技能演化和历史的兴趣兴起，行走才重新回到人类学的研究议程中（Ingold 2000；2004），这不仅推动了对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中行走实践的比较研究需求，也促使人们反思行走在人类学探究中的作用。本章旨在通过比较两种行走模式——一种来自西方，另一种来自非西方，但都在同一环境中实践——来推进这两个目标。

##### 两种行走模式

我打算探讨的这两种模式最初可能看起来有许多共同点，因为它们都涉及丛林行走者。第一种模式的实践者对人类学家来说相当熟悉。他们曾因其在丛林中的行走而被赋予一个名字：南部非洲的“布须曼人”（Bushmen）。关于第二种模式的实践者，则需要更多的介绍。他们的文化背景无疑是西方的，但在这一背景下，他们的独特关注点使他们不仅成为亚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亚文化中的亚文化。他们是行走者、GPS技术的使用者，同时也是一个互联网社区的成员。由于缺乏更好的词汇，我将他们称为“交汇点探索者”（confluencers）。交汇点是指地球上经度和纬度整数度相交的任何点。交汇点探索者的目标，是手持GPS设备，访问并记录这些点。交汇点运动的历史记录在其美国创始人亚历克斯·贾瑞特（Alex Jarrett）的互联网主页上，他于1996年开始这些访问，将其记录上传至万维网，并创建了www.confluence.org，一个日益受欢迎且成员不断增长的互联网社区。在其主页上，交汇点项目的使命总结如下：

> 该项目的目标是访问世界上每个经度和纬度整数度相交点，并在每个地点拍摄照片。这些照片以及描述到达该地点的冒险经历的叙述随后被发布在该网站上。这创造了一个有组织的世界样本（FAQ on www.confluence.org, 2005年8月3日）。

我对交汇点探索者的研究基于流动的参与观察。我在www.confluence.org上注册为会员，阅读了其他会员对交汇点的访问记录，下载了“成功”访问和提交报告的说明，访问了纳米比亚的三个交汇点，记录并提交了照片和故事。我和一位语言学同事成为了交汇点探索者。我们兴奋地发现了一种“有用”的GPS用途，为越野驾驶和步行进入丛林以到达交汇点找到了借口。这似乎是一个相当直接的案例，展示了男性如何通过技术（GPS和越野车）和探索荒野来娱乐（见图4.1）。这一印象得到了项目描述中全男性声音的支持，他们谈论“交汇点狩猎”、准备交汇点访问的刺激、技术精确性和收藏精神。我们团队中的女性同事以及一位因研究许可在埃托沙公园（Etosha Park）工作的女性同事，都无法理解这些交汇点访问的意义。www.confluence.org上注册的大多数会员是男性，区域协调员中除一人外也全是男性。那么，这种以男性为主的活动是否也基于一种沙文主义的潜流，延续了早期探险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项目？在世界地图上没有空白区域的情况下，交汇点运动提供了享受“成为第一个”、“克服重重障碍”并展示这一壮举的机会（通过万维网）。交汇点项目主页（www.confluence.org）以一组生态图像为标题，展示了在4x4车辆前的徒步异域人群，以及站在美国国旗旁的探索者姿态的交汇点探索者。

然而，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confluence.org的使命声明不仅承诺首次访问，还承诺定期重访交汇点，以获得环境变化的生态信息记录：

> 另一个目标是记录这些地点随时间的变化。尽管我们最初希望访问尽可能多的不同地点，但如果你在该地区，请不要犹豫重访一个交汇点（FAQ on www.confluence.org, 2005年8月3日）。

确实，记录中的首次访问远多于第二次访问，考虑到许多交汇点的偏远性和更容易重访的机会，这一现象令人意外。与访问相关的故事通常是探索性的叙述，重点在于到达地点的困难，尤其是在没有道路且必须步行的情况下。因此，主要动机似乎是个人挑战和满足感，类似于其他“运动”活动。其次，这些地点的占用并非永久性的。正如用枪射击野生动物已被拍摄照片取代（至少对大多数远行游客来说），占领土地也被GPS读数（以及照片）取代——并从“成为第一个”中获得有限的荣耀。在我们的案例中，我们通过带一位当地人到交汇点，增加了一种反思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颠覆性）的元素。由于我们参与了一个语言记录项目，我们的想法是引出对交汇点周围景观的语言描述，揭示本土对土地的感知方式，作为对基于网格的欧洲方法的替代，并通过将信息发布在网络上，宣传被殖民剥夺土地的当地人的权利。这些目标仅部分实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将“布须曼人”与交汇点项目对照，引发了比最初设想的更为全面的比较。

尽管交汇点探索者和当地居民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们的实践之间存在类比，指向一种更普遍的潜在动态。这种动态的一个要素在于一个困境：转向一个地方或一个人意味着背离另一个地方或人。另一个要素是我所称的“路径困境”。这更具体地指在荒野中行走，体现在一个人开辟的路径可能对其他人来说意味着关闭。我认为，这些困境在本文探讨的两个案例中都很明显，并且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也对人类学家进入和离开田野的旅程产生了影响。与此比较论点相切的是，我认为行走与骑行（或驾驶）之间的区别不如“来”与“去”以及“开辟”与“关闭”路径之间的区别重要，后者不仅适用于行走，也适用于其他移动方式。

##### 来即是去

南部非洲的所谓“布须曼人”及其流动模式在人类学中已有详细记录（例如，Barnard 1991），因此简要概述民族志即可。我的田野研究主要在纳米比亚北部的阿科埃·海//姆人（Akhoe Hai//om）中进行。与许多其他桑人（San）群体一样，他们在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或多或少地定期移动，但这些土地已被其他群体占用（Barnard and Widlok 1996）。如今，大多数阿科埃·海//姆人有一个半永久性的居所，他们从这里出发访问其他地方，这些访问可能是一日游、短期停留，也可能是实际上移动家园的行为（通常可以选择返回或继续移动）。

在这种模式中，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访问和移动不仅是为了到达某个地方，获取某种资源或拜访某个亲戚，而且至少同样频繁地是为了离开。社会动荡和任何形式的冲突，包括试图避免冲突，都是人们试图离开的常见动机。基于生态范式的流动性研究倾向于将资源枯竭、污垢、疾病或死亡的发生视为促使人们想要离开的因素（Kelly 1995）。然而，我的研究表明，社会原因常常隐藏在表面上的生态原因背后。在讨论实际或可能的移动原因时，人们通常会提到污垢或资源枯竭等问题，以避免触及更敏感的人际关系问题。

此外，今天可能比过去更明显的是，必须考虑相互冲突的拉力和推力因素。离开去享受其他地方发现的某种资源（无论是季节性野果还是政府服务，如教育或食品分发）可能意味着与原本希望在一起的人分离，并离开一个因其社会和谐或其他各种经济和社会原因而喜欢的地方。这种移动住所或居住地的现象也适用于在定居点内移动小屋，甚至适用于对话中身体位置和姿势的微观变化。它还涉及非人类伙伴，例如在狩猎背景下，必须决定跟随一只动物的踪迹而不是另一只。这种“去”或“转向”某处意味着“离开”或“背离”另一处的困境，在各种情境中从微观到宏观的连续体上都有体现。

这使人们对许多欧洲文化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产生了怀疑，即行走（如狩猎或捕鱼）已从一种必要性转变为一种选择（Amato 2004, 255）。即使在骑行不可行的情况下，停留或不行走仍然至少是一种临时选择。然而，这并不能逃脱“到达”意味着“离开”的基本困境。因此，对历史研究中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的第一个修正在于，狩猎采集社会（以及我认为大多数其他情境）中的行走从来不仅仅是一种必要性。人们选择行走或不行走，通常是为了保持或恢复内心的平静。由于行走与停留的选择形成对比，行走行为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行走的体力成本与仅仅关注或转向某人或某地的行为相比，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后者同样具有物理性。此外，不去某地也可能因错失机会而产生成本，并且当行走离开是先前机会的结果时，也存在一定的阈值。在我的民族志工作中，我发现流动性通常在“回归者”到达并被接纳后增加。先前回归的机会包括其他人的到来、季节性水果的到来或降雨的到来。

现在回到“交汇点探索者”：他们强调寻找和到达一个地方的困难，这与狩猎采集者在其家乡地区轻松定位和移动的明显能力形成鲜明对比。“布须曼人”似乎更倾向于与生活在受限环境中的工人阶级（Rose 2001）以及其他熟悉自己习惯方式的人（Ingold 2000, 219）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地图使用者和探索新路线的人（Gell 1985）站在一起。当狩猎采集者远离冲突关系并走向和谐关系时，探险者也行走“以遇见友好的人群并逃离敌对的人群”（Amato 2004, 135）。然而，与当地人不同，探险者的目标是从熟悉的地方走向陌生的地方。在这方面，交汇点探索者也不例外。正如我上面提到的，交汇点探索者与探险者共享一些殖民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即占领空间、“成为第一个”并驯服荒野。

甚至可以说，尽管交汇点探索者表达了他们的目标，但他们追求的是超越殖民项目的空间最终占有。殖民探险家和定居者寻求的是矿产资源、象牙或良好的牧场。在纳米比亚北部，他们利用了海//姆人的狩猎技能以及他们对铁矿床的了解。他们通过提供礼物将当地领导人拉入交易，并最终接管了他们的土地（参见 Gordon 1992；Widlok 1999）。然而，交汇点探索者发明了自己的资源（交汇点），当地人对这些资源知之甚少且不太关心。他们的意图不像矿业公司那样具有商业性和剥削性，但他们仍然将当地关注点置于经度和纬度的同质化网格之下，以最短的路线前进，很少考虑当地条件。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转折，交汇点探索者将自己的文化发明自然化。正如一位交汇点探索者所说：###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 第四章

\*\*态度与路径选择\*\*

汇流者（confluencers）通常选择最短的路线，很少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有趣的是，汇流者将自己的文化发明自然化了。正如一位汇流者所说：

“汇流点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从严格秩序中涌现的随机性。这远远超出了对无形人造边界的愚蠢追求。汇流点的网格结构是对我们文化强加给我们的秩序的公然反抗，这种秩序对那些离开常规道路、放弃经过美化的景观和那些为唤起空洞记忆而设计的停留点的游客表示不满。”（Tim Vasques，引自www.confluence.org，2005年8月3日）

汇流者与自然科学家共享这种自然化的方法。例如，植物学家为了确定物种的“自然”分布，通常会对在地面上发现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并将这些样本叠加在地图般的网格上。动物学家和其他自然科学家也使用相同的策略。

汇流项目旨在记录自然变化，使用全球经纬度网格作为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任意性”和“随机样本”等概念的文化特殊性被自然化所掩盖。实际上，汇流者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显著地点，而当地人对这些地点的反应证明了这种显著性的虚假性——他们摇头表示，这些汇流者费尽力气到达的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然而，在选择自己的地点时，汇流者陷入了与移动的狩猎采集者相同的权衡中。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汇流点上，而忽略了当地人可能识别的显著地点，这些地点恰好位于汇流点之间。当我们试图将汇流点的概念用于宣传Akhoe Hai//om人的命运时，这一点尤为明显。有一个叫Sanab的地方，在Akhoe Hai//om人争取土地权利的斗争中变得非常重要（见Widlok 2003）。附近的芒果树丛产出传统的主食水果；如今，这里有一个政府建立的水泵，曾经遭受非法围栏和农业牧民的重新安置，也是国家土地部长与当地头人和非政府组织代表进行谈判的地方。这个地方确实非常显著，如果当地人讲述他们与土地的联系，这将是一个完美的汇流报告地点。不幸的是，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汇流点，实际上它位于两个汇流点之间，因此甚至不能被视为附近的地点。

像Sanab这样具有有趣且相关的本地故事的显著地点，实际上被汇流点的全球网格所忽略。至少汇流项目允许汇流者在汇流点附近拍摄照片并记录显著特征。在访问了纳米比亚北部的三个汇流点后，我发现这些地方都位于定居点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方的附近都能找到围栏、牲畜和人的三重组合。我认为这在今天的纳米比亚是普遍存在的，其特征是公共土地的围栏和私有化、过度放牧，以及至少在该国部分地区相对于土地承载能力的过度人口。在汇流项目中记录这种三重组合是可能的，但这取决于汇流者的背景，特别是他们在该地区花费的时间。因此，“汇流访问”不仅选择了一些地点而忽略了其他地点，还选择了一个特定的时间（“访问”）而忽略了其他时间（尤其是“生活在那里”的时间）。尽管汇流者被鼓励在其他季节进行重访，但他们永远无法达到当地人对一个地方或区域所拥有的时间深度。当我们让当地人参与汇流访问时，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图4.1）。他们会对一个地方赋予非常不同的时间显著性，从过去他们经过该地区的故事，到对未来的期望（想知道这个地方的主人何时会出现）或对潜在时间点的思考（想知道如果他们被给予这片土地生活，他们会做什么）。这里的重点不是贬低汇流者，而是简单地表明，通过选择一个地点和时间进行访问，他们远离了其他地点，不仅是他们开始旅程的荒野之外的地点，还有对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来说重要的其他替代地点和时间。这种权衡是不可避免的，而人类学上有趣的问题是，这两个相关群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图4.1\*\* Christian Rapold、Abakub //Gam//gaeb和Thomas Widlok在18/18汇流点记录当地关于土地的故事

Akhoe Hai//om人，像其他处于类似情况的人一样，有多种方法处理上述“来即是去”的困境。例如，他们可能会留下一间小屋或部分财产作为物质占位符，承诺他们会回到即将离开的地方。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强调任何可能通过他人给出或发送的口头承诺。同样，频繁的来回移动表明他们对多个地方的承诺，并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这种困境。对话分析表明，通过语言、手势或目光，当一个人暂时转身离开时，事情可能会被搁置，准备回到对话伙伴或保持对多个人或情况的关注。通过这些方式，困境可以通过时间的延伸来解决，使得在两个地方的同时存在和双向移动成为可能。

相比之下，汇流者似乎以相反的方式解决了这种权衡，将其转化为偶然性和非承诺的问题。如果汇流点恰好是灌木丛中的一个毫无特色的地方，那就这样吧：这不是汇流者的责任，而是很久以前建立网格的人“决定”的。如果访问的时间恰好是在一场毁灭性的大火之后，那就这样吧：其他人将有机会在另一个时间点重新访问。这使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比较维度。“San”人在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强调他们的自主性。然而，如上所述，他们利用信使和占位符来表达他们对地方的承诺，并依靠对话者的记忆，他们曾承诺访问（或返回）或威胁离开。汇流者也强调他们到达一个地方的个人壮举。他们还在网页上注册他们的访问计划，并标记访问和在线提交文档之间的过渡期。因此，他们严重依赖他人。他们依赖他人维护主页，从而维护他们访问的公共记忆。他们还依赖他人尊重游戏规则，访问其他汇流点（并重新访问他们的汇流点），以使时间和地点的随机选择策略有价值。换句话说，转向一个地方意味着远离另一个地方的困境不仅涉及在个人决策情境中的孤立个体，还涉及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早先做出自己移动的人，他们将在后期做出更多移动，部分是为了回应个体的行为。因此，潜在的困境被扩展到第三方，形成了自己的困境，即路径困境。

\*\*开辟一条路径就是关闭一条路径\*\*

查阅纳米比亚北部的地图，就像在非洲其他地区一样，人们很快意识到经纬度的地图网格并不是一个抽象和“无辜”的惯例，而是影响了殖民力量如何组织空间、划定土地并分割土地。当地的边界要么不被知晓或理解，要么在殖民空间秩序中被故意忽视。纳米比亚与安哥拉的北部边界的大部分平行于南纬17度，将Kwanyama Owambo的定居区分开。当南非在纳米比亚独立前管理该国并试图引入种族隔离家园政策时，东经18度被用作Owambo和Kavango“部落”之间的边界，没有为实际居住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Hai//om和其他“San”人留下空间。今天，仍然有一条道路（和围栏）标志着这一度，就像网格仍然在地面上可见，将“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以及农场、国家公园等之间的边界分开。一旦在地图上建造了诸如道路和围栏等标记，它们就会获得自己的力量，产生新的分割，这些分割与这些“给定”特征相关。例如，南非军队使用“Owamboland”作为缓冲区，以防止武装独立运动SWAPO渗透到白人定居者占领的土地，创建了一个“切割线”网格，不仅作为快速移动部队的道路系统，还作为精心保护的线性清理区域，如果有人穿过沙子留下痕迹，就会显示出来。任何在灌木丛中行走的人都是可疑的，可能会被射杀。军队使用的策略有着悠久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公地的围栏，通过建立道路不仅是为了让人们前进，也是为了将他们排除在外——排除在道路之间的土地之外。在使用中，这些道路继续同时开放和关闭土地。

纳米比亚独立后不久，部署到纳米比亚这一地区的澳大利亚联合国部队引入了重型机械，在东北“Owamboland”的森林中切割出一系列小径，向新定居者、重新安置和“发展”开放土地，并使任何人更难隐藏和逃避土地的围栏和“增值”。在纳米比亚，今天的农民非常重视道路的维护，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移动便利，也是为了确保农场工人使用这些道路，而不是穿过土地使用小径或捷径。任何被发现穿过私人农场的人都会被怀疑屠宰或偷窃牲畜、引入疾病和非法使用土地。最近，一位年轻的Akhoe Hai//om男子回答我关于为什么他想参加识字班的问题时说，能够阅读很重要，因为否则很容易因为未能遵守“禁止侵入”标志而被射杀。道路建设者不仅希望将人们排除在他们的土地之外，还希望更普遍地控制对地方的访问。如果一条道路通向一个地方——例如一个农场住宅——那么任何使用这条道路的人最好是被邀请或受到该地方主人的欢迎。首先开辟一条道路并不一定等同于开放空间，它也可能是关闭空间的一种手段。汇流者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他们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关于如何到达汇流点的详细描述可以为未来的访问开放这个地方。同时，它们减少了其他人访问这个地方的吸引力，消除了那些想成为第一个到达汇流点的人的动机——这毕竟是推动汇流运动的最强动机之一。

这与Akhoe Hai//om人相比如何？他们既没有机会限制同胞的移动，也没有兴趣像汇流者那样竞争。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农民的限制性行为可能引发的潜在冲突和困境。通常，他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应该走道路或捷径，冒着被射杀的危险。然而，他们也陷入了上述的路径困境。觅食几乎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开辟小径，因为食物来源在小径旁边很快就会耗尽，通常值得冒险走得更远，例如到其他人尚未收获坚果的芒果树。另一方面，既定的路径不仅使行走更容易，省去了不断定向的麻烦，还通向具有季节性可靠性的资源，如水源、白蚁丘或树丛。这些路径不是故意切割的，而是作为定期使用的结果出现的。此外，至少在范古贾尔人（Van Gujjars）和他们的水牛，在季节性迁徙中缓慢地穿过山地环境，这种行走方式深深植根于他们的生活纹理中。

\*\*迁徙之路\*\*

我将从一个发生在1992年印度中部喜马拉雅山脉高海拔狭窄道路上的故事开始。那年夏天，我和我的研究助手曼托（Manto）加入了范古贾尔人的夏季营地，靠近林线，以便参与他们的季节性迁徙。在出发前，我们必须承诺全程参与迁徙。卡西姆（Kaseem）拥有最大的牛群，因此成为非正式的领导者，他向我们解释说，当他们在冬季或夏季停留在一个地方时，他们可以以适当的方式照顾客人，但在迁徙的路上，生活会变得艰难而不稳定，旅程充满危险，任何加入的人都必须帮助将牛群安全带回低地。我们现在正跟随奶水牛、公牛和马匹，这些动物被用作驮畜，步行返回山麓森林和冬季营地；这是一次缓慢的步行，几乎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很少超过10到15公里。

在迁徙的第四天，我们凌晨2点就开始行动了。夜间行走的是一长串有序排列的动物和人，每群水牛后面跟着它们的牧人。仍然留在营地（parao，停留地）睡觉的是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将在早上晚些时候带着驮畜跟随。曼托和我与赛因·比比（Sain Bibi）一起走，她是那天早上唯一的水牛牧人。当我们夜间行走时，我们交谈着，赛因·比比，她的牛群在后面，讲述了我们经过的地方和牧人生活的不稳定性：那里曾经有一头水牛摔倒了；在那座山后面，她的嫂子萨基娜（Sakeena）的亲戚被政府安置在那里。他们失去了所有的水牛，现在他们非常贫穷；在这个边境村庄，森林守卫会设置路障作为牛群的检查站，要求钱、牛奶和黄油才能让他们通过。这引发了几次关于守卫威胁以及如何避免和抵抗的故事。但今晚的策略是早点行动，我们悄悄地穿过路障，穿过沉睡的边境村庄，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一切都很平静，直到黎明前，牛群中最年轻的新成员，一头小公牛，打破了平静。赛因·比比从山上的一个农民那里买了他，作为未来的驮畜，并给他取名为巴切鲁（Baccheru）。他现在第一次下山，对经过卡车的强光和噪音感到恐惧，沿着对他来说意味着家的方向跑回了路上。赛因·比比和曼托追赶他，而我则追赶着继续向低地前进的水牛。我突然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夜晚，负责七头水牛，这是一个家庭的唯一生计。努尔·贾马尔（Noor Jamal）在路的拐弯处消失了，卡西姆和其他人远远地走在前面。因为我不能让水牛停下来等待，我不得不跟着，疯狂地挥舞着牧人手中的棍子，希望它们走得更快，以便赶上努尔·贾马尔。我不知道我们要走哪条路，我担心我可能会错过一些离开道路的小径。路的一边是山丘，另一边是陡峭的斜坡，通向下面湍急的河流。尽管月亮几乎圆了，但天气多云，相当黑暗。没有灯光，也没有房屋。大约15分钟的完全迷失方向后，我赶上了努尔·贾马尔牛群的尾部，可以恢复缓慢、随意的迁徙步伐。五分钟后，我松了一口气，看到赛因·比比和曼托带着小牛回来了。赛因·比比踩到了一些粪便，滑倒了，受了伤，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Gooch 1998a, 239）。

\*\*编织季节性迁徙的纹理\*\*

当我焦虑不安，感到迷失，不耐烦地跟在水牛后面走在黑暗的山路上时，赛因·比比的故事是关于追赶小牛时摔倒受伤的。这是一个暂时打乱了迁徙节奏的事件，但仍然完全嵌入在行走的日常情境中。这个故事可以在下次经过这条路时被记住并重述（Vergunst，本卷）。赛因·比比并不担心她的牛群。我的经历对她来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件，与迁徙的流动无关，她无法理解。怎么可能在下山的路上跟在水牛后面迷路呢？根据她的说法，老水牛知道下山的路。它们走在前面，人们跟在后面。因此，范古贾尔人将他们的水牛视为行走中的行动者，而不是被移动的对象。赛因·比比说，当秋天回到低地时，水牛会变得不安。它们开始向下移动，必须被赶回来，直到人们准备好跟随它们。根据她的说法，老水牛感觉到空气中的变化，知道是时候回去了。在它们身后，它们将留下一片云杉林和高山牧场的景观，这些地方很快就会变冷并被雪覆盖，而在行走的另一端等待着的是季风过后覆盖着新绿叶的山麓森林。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范古贾尔人的迁徙。所以即使我能在山路上跟在牛群后面移动，除了知道我大致朝着“下”的方向前进外，我完全迷失了方向，而如果我信任水牛，我应该知道它们并没有迷失方向。

然而，当我试图在牛群后面找到立足点时，我带来的视角不仅是人类学家的视角，还有对牧人生活的实际理解。但这是与另一种动物和不同的山地环境相关的，因为我在1970年代曾在瑞典北部的山区作为山羊牧人生活了几年。夏天，我通常在我们农舍周围的树林里放牧大约三十只山羊。山羊是浏览者而不是食草者，吃了一会儿后会变得不安，这时——感觉到羊群中的这种情绪——我会采取主动，呼唤它们，并和它们一起移动到一个新的地方，它们会跟上并跟随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移动，曲折地穿过景观，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也不会留下太多痕迹。习惯了迅速、聪明但相当无政府主义和反复无常的山羊，我对水牛的极度缓慢感到非常困难。水牛移动，范古贾尔人跟随，当我跟随范古贾尔人时，我体验到了从前引导迅速的山羊，脚引导蹄子，与从后面跟随缓慢的水牛，脚跟随蹄子之间的区别。这产生了非常不同的穿越景观的感知，以及不同的寻找路线、留下痕迹和创造地方的方式。

独自与水牛在一起，感到担忧和迷失方向，我试图把它们当作山羊，指挥它们并让它们走得更快。但我很快意识到这是没有用的。范古贾尔人的水牛不能被催促；它们以自己的速度行走。如果它们闯入农民的田地吃一口诱人的食物，它们可以被转向新的方向，但它们不能被引导，也不会跟随。你可以带山羊散步，但水牛会带你走。与山羊和绵羊一起移动的牧人，如邻近的加迪斯（Gaddis）或博提亚（Bhotiya），在迁徙期间更加灵活，可以使用替代路线避开危险情况和威胁性的人。但范古贾尔人在穿越山区的行走中，被困在他们沉重的水牛后面。他们必须沿着主要和众所周知的路线行走，这些路线从殖民时期的马道变成了今天危险的机动车道。这使他们在开阔的景观中感到脆弱和暴露。水牛放牧的缓慢以及存在的焦虑在范古贾尔诗人努尔·艾哈迈德（Noor Ahmed）的这首短歌中得到了热情的体现：

哦，水牛，你慢慢地走

爬得那么高。

如果我们失去你，很容易哭泣。

范古贾尔人只有在旅程结束时最终回到山麓或靠近林线的森林覆盖下时，才会感到安全。

范古贾尔牧人生活的空间延伸覆盖了整个地区，但对个别群体来说，它包括一条穿越农业居民区的细线，两端是范古贾尔人和他们的水牛居住的森林地区。下面是德什（desh），低地的森林覆盖的山麓，他们在冬季居住在那里。这是“家”的最强含义的地方，因为他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最长。上面是帕哈尔（parhar），山区，他们在夏季去那里放牧牛群，在高山牧场（bukiyals）上，并逃离低地的酷热。这是一个相对休闲的时期，因为这是牧人周期中唯一一个动物可以自己找到草料的阶段。连接山麓和山区的是拉什塔（rastha），或迁徙路径，边缘有一些停留地（parao）。范古贾尔人通过在水牛后面行走，在他们的环境中创造了模式。他们的世界，包括山丘、山脉、森林和牧场，可以被视为一个由“路径矩阵”连接的区域，其中地方被创造为“更广泛的来去网络中的节点”（Ingold 2000, 227）。在这个区域内，范古贾尔人被称为ana-jana lok，可以直接翻译为“来来去去的人”，那些来到地方并再次离开的人。我们可以想象，范古贾尔人跟随水牛的行走编织的纺织品由两个簇组成，悬挂在一条打结的线的两端。由于季节性迁徙的模式每年都是一样的，这形成了一个跟随季节变化的来回运动，并在夏季和冬季被长时间的中断打断。这类似于织布机上梭子的有节奏的上下跳动。有许多小的范古贾尔群体，像这里描述的那样，每个群体都在编织自己特定的线，他们一起用牧人生活的纹理填满整个地区。每当一个群体停止迁徙，这个纺织品中的一条线就会断裂。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来说，冬季和夏季分别在森林和草地上进行的日常行走和创造地方，构成了紧密编织的毛细血管网络，这些网络由季节性迁徙的动脉行走连接起来。

今天，这座桥梁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结构，跨越了动荡的水域，当范古贾尔人停止行走时，德什与布基亚尔之间的直接联系将不复存在。每当季节性迁徙停止，就像上面提到的萨基娜的亲戚那样，范古贾尔人使用表达beithna，坐下，而定居的人被视为“难以移动的石头”（Gooch 1998a, 220）。对于牧人来说，定居就是停止行走并坐下。对范古贾尔人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休息的承诺。告别运动也是告别水牛，行走中的伙伴，以及整个范古贾尔人的生活世界。

范古贾尔牧人生活的纹理是由牧人需求和行政规则的结合历史性地构建的。施莱（Schlee 1992, 110; Croll and Parkin 1992, 21）认为，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边境的加布拉骆驼牧人的运动在空间中产生了一种模式，沿途的各种地标通过线条连接起来。他声称，作为牧人，加布拉人占用空间的方式更像猎人和采集者，而不是农民或民族国家。后者将土地划分为领土边界内的有限表面区域，而牧人则从一个景观的相关特征移动到另一个，必要时转向并跟随替代路线，取决于可用的牧场。在过去，范古贾尔人也有更多的自由在景观的相关特征之间移动，如良好的牧场，并沿着最适合季节运动的路线移动。然而，在殖民时期，这种自由被国家严重限制，以控制水牛游牧。结果是，夏季和冬季牧场的森林区域被划分为个别户主的许可，以在有限区域内保留指定数量的动物。独立后，印度森林部门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因此，范古贾尔人的运动现在被限制在特定时期的特定迁徙路线上，他们的冬季和夏季放牧被限制在构成两端的森林的有限区域内。但尽管范古贾尔人的选择受到限制，他们仍然充分利用了他们剩下的行动自由（Gooch 1998a, 113）。

\*\*与动物一起移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范古贾尔人的水牛是行走中的行动者和伙伴，而不是被移动的对象。“我们的水牛是不同的”，范古贾尔人说。它们属于一种与人类共享生活世界的耐寒本土品种。它们能有效地将森林粗饲料转化为牛奶，并且可以在崎岖的地形中长时间行走。范古贾尔人不使用其他品种的外来公牛，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公牛会生出软弱无用的牛犊，无法行走。范古贾尔牧人生活的关键是特定动物与其人类守护者之间发展出的强烈个人关系，这从动物的对待方式中显而易见。还应注意的是，范古贾尔人是素食者，水牛被允许老死而不被屠宰。

范古贾尔人与动物一起移动的技能对于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谋生至关重要。对于农民来说，控制围栏后面的牛群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对于牧人来说，在开阔的乡村中与一群无拘无束的动物一起行走是至关重要的。在瑞典，我可以与我的山羊一起移动并同时引导它们，因为我在羊群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将本应领先的母山羊推到第二位。要做到这一点，并让它们信任我作为领导者，我必须在移动时通过山羊的眼睛感知世界。这是一个理解它们在吃和走中的运动节奏的问题，在移动时寻找好的停留地点，并在它们变得不耐烦并自行移动和转向之前几秒钟预见到情绪的变化。想象一个假设的情景，赛因·比比出现在我在瑞典的门前，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一个陌生的森林里，带着一群她不认识的山羊。她可能会把我的山羊当作水牛，跟在它们后面并用棍子驱赶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山羊会简单地散开，她不知道要跟随哪只山羊，她可能会诅咒这些愚蠢的动物，它们不能以有序的队形直线前进，似乎不知道它们要去哪里。因此，与一群动物一起行走需要在实际掌握中导航，这个世界由人类和动物共享。

正如这个例子所示，这种掌握位于生活世界中。我发现很难通过水牛的眼睛感知喜马拉雅山脉的世界，但这正是引导赛因·比比和其他范古贾尔人在季节性迁徙中行走的感知。成功的牧人生活需要牧人和他们放牧的动物之间有强烈的理解感，相当于一个共享的世界观，通过相关动物的感官感知世界。在向下迁徙时经过特定景观时，拉尔·桑（Lal San）定义了他所看到的完美古贾尔人地方：“这是古贾尔人的土地，好的草，树，附近有水，地主（zamindars）的田地很远。”因此，在评估景观及其内在可能性时，牧人可以被视为一种“半人马”，同时是人和野兽，移动并注意到与这种存在相关的特征。这里涉及的是一种直接参与的关系，共享同一个世界的存在（Ingold 1994, 19）。范古贾尔人成为水牛人（baas-lok）。经过几个世纪的共同移动，人和动物在一个共享的本体论中团结在一起（Gooch 1998a, 216）。

这反映在行走风格中，在人类身体与动物一起移动的技术中。当我试图通过缩短步伐来改变行走节奏，以免撞到前面水牛的屁股时，范古贾尔人做了相反的事情。当没有水牛时，他们大步行走，很难跟上他们。在放牧水牛时，他们保持大步，但以超慢动作进行。他们还经常中断行走，在路边停下来抽烟或聊天，让水牛走在前面，然后赶上它们。在我们行走的道路上，经常看到来自山区的女农民，弯着腰背着沉重的草、稻草或柴火，沿着他们的路径移动。与她们形成对比的是，范古贾尔人无论男女在迁徙期间都轻松行走，用他们的身体移动，用他们的动物驮运货物。国家行政当局提出的一个安置范古贾尔人的策略是提供购买重型消费品（如缝纫机）的廉价贷款。这背后的想法是，拥有这些笨重的负担会让他们远离游牧生活。一个徒步旅行的游牧者必须轻装简行。

当我享受与山羊一起穿过森林的行走并对水牛感到不耐烦时，赛因·比比则相反。尽管一些范古贾尔家庭保留了一小群山羊，但她没有，认为控制它们太费劲。当她作为唯一的女性在迁徙期间与家庭的水牛群一起行走时，这是她的有意识选择。她实际上更喜欢在清晨凉爽时跟随水牛的缓慢行走，而不是在白天变热时驮畜的更快速度。由于她没有需要早上额外睡眠的小孩子，她可以把公牛留给她的丈夫拉尔·桑，根据她的说法，“他非常喜欢它们，宁愿自己驮运大部分货物也不愿放在动物身上”。这也展示了范古贾尔人之间工作分担的灵活性。当我问“谁做什么？”时，答案通常是：“看情况”。当赛因·比比带着她的牛群落后并最后行走时，就像上面讨论的事件一样，这并不是因为作为女性牧人不被尊重，而是因为她想和我们交谈而不被打扰。其他时候，她走在中间，与其他牧人谈笑风生。

虽然出生在牧人生活圈中的水牛知道路并被跟随，但公牛和小马则不然。范古贾尔人的公牛，用作驮畜，主要是山区农民不想在冬季保留的多余动物。公牛最终获得了季节性迁徙的技能，在行走过程中可能与人们发展出亲密的友谊。但起初它们必须被引导以朝正确的方向移动。当它们学会人们对它们的期望时，这更像是动物和人并肩行走，而不是一个跟随另一个。小马也是如此，它们从不被骑乘。马和人一起行走。载有驮畜的商队被称为maal，与迁徙的另一部分，水牛（baas）区分开来。走在maal前面的人通常是一位年长、经验丰富的女性，她可以找到下山的路并处理途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危险情况。她旁边牵着驮畜，可以设定行走的速度和节奏。由于整个家庭从最年长的祖母到最小的孩子都参与迁徙行走，速度必须调整到最慢的移动者。

女性和男性分开行走，每个性别都有其责任以确保安全的迁徙，这导致了范古贾尔社区中女性的相对强势地位。maal比baas移动得快得多，允许女性和孩子在早上打包营地并轻松移动到下一个停留地之前多睡一会儿，在无人居住的景观中谈笑风生，但在穿过村庄时更加紧张。水牛在夜晚还很黑暗时早早出发，以便在中午炎热变得太强烈之前到达下一个停留地（和食物）。成年男性在年长男孩和有时女孩的帮助下与水牛一起行走。在夜间，他们必须随时准备匆忙出发，因为水牛可能会变得不安和饥饿并开始自行移动。通过身体参与季节性迁徙的行走，首先与maal，然后与水牛，范古贾尔儿童从地面和通过他们的脚体现了他们作为牧人生活所需的文化和技术技能。范古贾尔人会争辩说，水牛犊也是如此。

dera（营地），包括一个家庭，是范古贾尔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季节性迁徙期间，一小群dera一起迁徙。这些群体的结构可能每年都有所不同，因为它们由个人友谊和亲属关系维系在一起。群体必须相对较小，以便不限制流动性，并且仍然足够大以相互保护免受强盗和其他可能遇到的危险。卡西姆成为上述小迁徙群体的领导者，尽管每个人都坚持认为他们没有领导者，也不需要任何领导者。正如一位女性沙米（Shammi）所说，“我们去市场时不需要领导者。那么我们去山区时为什么需要领导者呢？”卡西姆是最年长的男性，他和他的妻子罗斯尼（Rosni）拥有最大的牛群，几乎有三十头水牛。卡西姆的老水牛领导迁徙，卡西姆自己紧随其后。在他后面是他的年轻儿子们，带着更难以管理的年轻动物群。我们在迁徙的日子里看到的是，男性希望在夜间和清晨移动，然后在下午晚些时候再次移动，在食物和休息后，而女性则更喜欢早早扎营，只在早上移动。结果通常是女性获胜。我们唯一在下午移动的时候是在冬季，dera（营地）以沿着rao（溪流）建造的小屋形式存在。dera象征着归属感和家园，当它固定时，你会去拜访某人的dera。在我第一次冬季田野调查期间，我一直以为dera就是小屋，因为人们会告诉我去某人的dera，而我看到的是溪流岸边的一座小屋。但当dera移动时，小屋被遗弃为空壳，我才意识到我错了。那时我了解到，小屋（称为chhan）是外部结构，而dera是内部：所有人、所有物品和所有动物。因为dera是游牧者的家，它随他或她迁移，因此包括所有移动的东西。Van Gujjars在特定地方扎根最深，最深的地方是dera被安置在山麓森林中的地方。由于这个地点每年都相同，每次沿着rao回到chhan的地点都是一次回家。或者至少应该是这样。实际上发生的是，在春季迁移的家庭离开后，森林守卫在他们的巡逻区（森林区域）拍卖小屋的材料，然后小屋被拆除。返回时，Gujjars必须从森林中收集新材料，建造一个全新的chhan来容纳返回的dera。正是在这样的“回家”之后，露营在露天与动物在一起时，我听到Gujjars谈论放弃。在这种时候，他们感到与森林疏远，因为它被他们感到无助的力量接管了。我现在转向这些力量。

屏障开放 - 屏障关闭：在模糊的景观中航行

上面我们跟随了Van Gujjars的生存行走。我强调了嵌入在他们日常牧业生活世界中的移动和场所营造的模式和节奏。但当他们在山路上航行并穿过森林时，一种强烈的焦虑感悄然袭来，阻碍了步伐，打断了节奏。喜马拉雅景观同时是一个家园、一个具身的生活世界，也是敌对和疏远的。对于Van Gujjars来说，穿越的地形成为一个模糊的景观，因为他们被困在自己的叙事中，这些叙事深深植根于景观的实际使用中，以及规范这种使用的权力话语中。牧业实践根据水牛的需求移动，但到处都受到权力话语设置的屏障的阻碍。由于国家将“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视为异常，而“固定在一个地方”视为常态，自殖民时代以来，当局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限制或结束游牧生活（Rao和Casimir 2003）。因此，行走的延续具有政治维度，是一种通过移动的脚和蹄进行的抵抗。但对于那些对世界的理解建立在每年通过森林和山丘进行季节性迁移的人来说，被迫生活在不断反抗定居常态的状态中是令人疲惫的。对于Van Gujjars来说，行走是由“身体和世界在情感中的同时模式化”塑造的生活世界的一个复杂部分，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当局在描述他们对游牧民族的政策时使用“断奶”这个词可能是症状性的。像Van Gujjars这样的人必须像孩子（或小牛）从母亲的乳汁中断奶一样，从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中断奶。

我断断续续地跟随Van Gujjars已有二十年（自1987年以来）。我的田野调查主要部分发生在1990年代初，从那时起，我成为了Van Gujjar世界中的ana-jana-wallah（来来往往的人）。1992年，我经历了许多Van Gujjars带着他们的畜群返回山麓时，如何直接撞上了关于喜马拉雅环境的主要话语之一：一种关于迁徙牧民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及其保护需求的话语。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源是Van Gujjars的jangal，即山麓的森林。那年返回低地时，屏障关闭，他们被拒绝进入冬季营地。这引发了Van Gujjars的动员，我在其他地方详细描述了这一点（Gooch, 1997; 1998a; 1998b; 2004）。在这里，我想与Widlok在本卷中关于人类学的“方式”及其开放和关闭的讨论建立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关于Van Gujjars的新话语开辟了道路，但像所有道路一样，它是部分的，并优先考虑某些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

1987年第一次沿着rao走到Van Gujjars的dera时，我遇到了一个大部分未知的民族志地点。我是“第一个”。1992年，我进行了我认为是我最后一次的田野调查。但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研究的整个生活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已经在那个世界中开辟了一条小径，但到目前为止只有Manto和我使用过它；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利用这个开口寻求帮助。没有其他人。Van Gujjars利用我们作为桥梁到达外部世界。获得进入后，我们可以带着Van Gujjar的信息走出去：我们不是破坏森林的人，我们是森林的一部分。这个开口被我朋友的一个当地NGO利用。该NGO与记者有很好的联系，很快，“与森林和谐共处的隐藏人”的故事就充满了光鲜的周日杂志。我失去了对研究结果的控制，因为我发现我的文本过着自己的生活，并出现在“自然保护排除当地人的争议”中。这在创造新话语中发挥了作用：“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当这一话语暂时占据上风时，屏障打开了，Van Gujjars几乎获得了森林的管理权（RLEK 1997）。然而，一段时间后，NGO对Van Gujjars失去了兴趣。现在屏障再次关闭，一些Van Gujjars群体正在被森林部门安置（Gooch 2004）。因此，我们看到变化的话语在景观中表现为屏障的关闭或开放，Van Gujjars被困在它们之间，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前进，或者是否必须变得像“无法移动的石头”。本章描述的Van Gujjars群体仍然在冬季留在森林中，夏季仍然步行到山上，但没有Sain Bibi，她在2005年秋天突然去世。虽然我来来去去，Manto（Praween Kaushal）留下来，仍然通过NGO SOPHIA与Van Gujjars合作，处理居住权、生计、土地权和森林教育等问题。rao现在完全开放了。

第6章

在景观上表演与做景观：

巡游实践、视觉和归属感

Kenneth R. Olwig

纵观历史，无论是作为猎人和采集者、农民还是牲畜牧民，人们都从土地上谋生，而不是从空间中谋生。农民在地球上种植庄稼，而不是在空间中，从田野中收获，而不是从空间中。他们的动物在牧场上吃草，而不是在空间中。旅行者穿过乡村，而不是穿过空间，当他们行走或站立时，他们将脚放在地面上，而不是在空间中。画家在景观中设置画架，而不是在空间中。

Tim Ingold

Tim Ingold在一篇题为《反对空间：地方、运动、知识》（Ingold即将出版）的文章的第一段中这样写道。我认为，两种不同的景观意义可以与这段话联系起来。第一种涉及地球、田野、牧场、乡村和地面的景观，第二种是空间的景观。这两种不同的景观意义与两种不同的观看方式有关。第一种涉及双眼视觉、运动和通过协调使用感官在执行各种任务中获得的知识（Ingold 1993）。第二种主要来自单眼视角，这种视角是固定的，远离身体。第一种模式产生了一种归属感，将景观生成为社区政治体中的居住和行动场所，而第二种模式构建了一种在等级社会空间中的占有感和舞台表演感。

在约翰逊博士的著名词典中，描绘了两种不同的景观意义，他给出了以下定义：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景色

一幅画，代表一个空间范围，其中有各种物体（Johnson 1755 [1968]：景观）。

在第一种情况下，景观中的土地具有一个政治体中人民的地方、地区或国家的意义，就像苏格兰是苏格兰人的土地，或日德兰是日德兰人的土地。它也是这样一个地方的景色。它是一个文化的地方，由共同的风俗和语言定义，而不是一个国家的空间，由地图、规则和法规定义——尽管两者可以重叠（Olwig 2002a；2005a）。这是人们通过他们的居住实践——他们的“做”景观——创造的地方和政治体。后缀-scape体现了这种创造性塑造和雕刻的意义（Olwig 1993）。然而，-scape也与后缀-ship同源，后者在“友谊”、“奖学金”或“展示、表现或体现某种品质或状态的东西”的意义上，赋予具体事物更抽象的品质，如“乡镇”或“团契”（Merriam-Webster 2000：-ship；另见Olwig 2004）。一个人可能有几个具体的朋友、学者或同伴，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由更抽象和定性的东西——友谊、奖学金和团契——所巩固的。因此，上面引用的Ingold段落中的农民有他们的各种耕地、牧场等，但画家作为艺术家，试图捕捉这些土地在画架前构成景观景色的更抽象的条件或品质。正如艺术史学家Michael Rosenthal指出的那样，在他的绘画中，Brueghel“不仅强调了地形的逻辑”，还“强调了所描绘的活动的逻辑”。它包含“一种解释的元素，有时……近乎图解”（Rosenthal 1982, 12）。因此，Brueghel的绘画不仅代表了一种景观景色，还代表了景观前景的塑造。

正如艺术史学家Arthur Wheelock所解释的那样，像Jan Vermeer这样的画家可以通过描绘“重叠形式而不是正交投影”来创造深度。最终结果是“在他最佳构图的微妙平衡和内部逻辑中，[Vermeer]设法为他的形象创造了一种空间感，而不强迫观察者从单一视角或在单一瞬间观看它们”（Wheelock 1977, 274, 282, 327）。然而，如果画家试图通过在网格化和正交的空间框架中描绘景观来捕捉景观的性质或特征，那么就会发生不同的情况，这确实会迫使观察者从抽象空间中的单一视角和在抽象时间中的特定瞬间观看场景（Olwig 2005b）。然后我们得到了约翰逊博士列出的第二种景观意义：“一幅画，代表一个空间范围，其中有各种物体”。在这种意义上，土地被简化为绘画的风景表面（对地球的肤浅研究），后缀-scape被简化为“景色：特定类型景色的图画表现‘城市景观’、‘水景’”（Merriam-Webster 2000：-scape）。与第一种景观意义相比，我认为这第二种意义代表了Ingold所称的“倒置逻辑”的一种版本，通过这种逻辑，“生活所沿的路径”被转化为“生活被封闭的边界”。他补充说，“生活被简化为占据世界但不严格居住其中的事物的内部属性”（Ingold即将出版）。这是一个相当抽象的陈述，但在我看来，这种倒置可以通过展示它如何与两种非常不同的归属感联系在一起而具体化，这取决于一个人是在景观上表演，还是在做景观。

在景观上表演与做景观

风景景观——第二种意义上的景观——被图像地感知为“一个空间范围，其中有各种物体”，实际上是地图的景观。透视绘画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制图技术（Edgerton 1975；Cosgrove 1988），因此也源自地籍财产图的技术。虽然地图往往具有垂直投影，直接向下聚焦，但投影角度的变化为风景视图创造了基础。“场景”一词也应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它源自舞台的透视布景，其“划分”的空间上表演动作。地图的空间，就像景观场景的空间一样，是一个范围，各种物体根据其坐标绘制。在这样的地图的二次空间中，生活被封闭在财产边界内。地图上划分的土地属于土地所有者，他从地图、景观绘画或像在景观绘画或舞台上观看世界的视角俯瞰土地。正是在这个舞台上，土地所有者创造了他的景观花园和他的“改良”农田，并在这个景观上表演劳动和娱乐，就像在剧院中一样。正如Yi-Fu Tuan所解释的：

风景和景观现在几乎是同义词。它们保留的细微意义差异反映了它们不同的起源。风景传统上与作为剧院的幻想世界联系在一起。“幕后”的表达揭示了场景的不真实性。我们没有被邀请“看景观的背后”，尽管景观花园可以像舞台布景一样被设计，并且与主人的生活联系很少，就像舞台道具与演员的生活联系很少一样。区别在于，景观在其原始意义上指的是现实世界，而不是艺术和虚构的世界。在其本土荷兰语中，“Tandschap”指定了诸如“农场或有围栏的田地的集合，有时是一个小领地或行政单位”之类的常见事物。只有当它在16世纪末移植到英国时，这个词才摆脱了其扎根于土地的根源，并获得了艺术的珍贵意义。景观开始意味着从一个特定立场看到的景色。然后是这种景色的艺术表现。景观也是官方肖像的背景；“姿势”的“场景”。因此，它完全融入了虚构的世界（Tuan 1974, 133）。

Tuan将景观的意义与荷兰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以风景画闻名，但正如约翰逊博士词典中的引文所暗示的那样，这种景观意义也是英语本土的，实际上可以在整个日耳曼语言中找到（Olwig 2002a）。这种“地方性”景观的农场、围栏田地和地区政治体（Mels 2005）与其说是一个风景表面，不如说是通过身体和感官的融合在居住中创造的编织材料。

感知景观和归属感

接近与上述两种景观形式可识别的不同归属感的最具启示性的方式之一是检查眼睛在塑造每种形式中的作用。在第一种意义上，景观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做来塑造，并通过使用两只眼睛来理解。这种理解模式在行走实践中最为明显。行走者通过双眼视觉和通过运动视差的效果体验接近环境的物质深度，这种效果是由近处物体与远处物体的模糊对比产生的。被触摸、闻到和听到的接近物质世界因此被编织进行走者的感官领域，引导他或她体验景观作为一个连续地方的拓扑领域。相比之下，从画家的固定中心点视角来看，行走者是一个占据抽象牛顿空间中固定位置的对象（Olwig 2005a）。在这种第二种意义上理解景观，观察者被定位在一个给定的位置，并使用一只眼睛的单一视角。因此，景观被渲染为“眼睛可以在一次视图中理解的一部分土地”（Merriam-Webster 2000：景观）。此外，眼睛在空间和时间中是固定的，正如另一个词典定义所表明的那样，景观是“可以从一个地方一次看到的一部分领土”（Merriam-Webster 1996：景观）。这些定义唤起了景观的风景概念，即“一幅代表自然风景（如田野、山丘、森林、水）的图画[风景画]”和“描绘这种风景的艺术”（Merriam-Webster 2000：景观）。当你闭上一只眼睛，用拇指眯着眼睛绘画时，你会将世界扁平化，以便更好地将其阻挡在画布上，同时将自己与深度感知依赖于双眼视觉的接近环境拉开距离。一旦景观被如此扁平化和拉开距离，它就可以被分解为位于单眼透视框架几何中的物体，从而重新创造一种深度错觉，这种错觉在你闭上一只眼睛时丢失了。

这两种非常不同的感知模式为关于“土地”的对比归属感创造了基础，因此也关于说苏格兰是苏格兰人的土地，或日德兰是日德兰人的土地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可以属于土地，或者土地可以属于你。在前一种意义上，归属感通过双眼睁开的运动培养；而后一种意义则通过测量员、透视画家或使用单镜头相机的游客的占有性单眼凝视培养。然而，它根植于地图的空间，覆盖在地球表面，并用边界柱打入土壤。当你购买一块财产时，这块通常为二次的有界不动产成为个人财产。Ingold的陈述，即“生活所沿的路径”，通过倒置过程，被转化为“生活被封闭的边界”，字面上适用于通过测量和制图将公地封闭的历史过程（Neeson 1993）。测量员和制图员是这种倒置的代理人，这种倒置服务于封闭者的利益——通常是国家与庄园主勾结，拥有他们专属的风景景观花园。今天，财产所有权已经变得普遍，大众传播和大众旅游教会世界欣赏风景景观作为一种商品，当你购买包价旅游、指南和单眼相机时，它就成为了你的（Urry 1990）。景观在很大程度上与风景同义，但更早的、倒置前的景观意义仍然潜伏在词典中，以诸如“c：特定活动领域”（Merriam-Webster 1996：景观）之类的定义形式出现，其中重要的是你做什么，而不是你看到什么或你如何被看到表演。

牧群动物和行人景观的做

历史上，我建议，通过运动对土地的归属感与猎人和采集者在熟悉的栖息地居民编织的惯常路径上追踪猎物和寻找可食用材料的活动一样古老，或者与新栖息地的探索一样古老。在狩猎中追踪一群动物与作为牧民放牧同一动物（如驯鹿）之间有一条细微的界限。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跟随各种牧群动物，我敢说，正是通过这种活动，我们许多最早的景观归属感得以起源。我自己对这个主题的推测来自于深入研究fee这个词的含义。以下是一个简短的词源：

中古英语，源自古英语feoh牛、财产、金钱；类似于古高地德语fihu牛，古挪威语fe牛、羊、金钱，哥特语faihu金钱、财富，拉丁语pecus牛，pecunia金钱，pectere梳理，希腊语pekein梳理，pokos羊毛，梵语paKu牛；基本含义：梳理、拔（羊毛）；过时：个人财产：货物、牲畜、金钱（Merriam-Webster 2000：fee）。

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在早期，与其说是牧场，不如说是放牧土地的牧群动物属于人们。当然，这与这样一个事实非常吻合，即许多牧场至今仍在使用基于共同使用权而不是个人财产的基础上。

人们通过放牧各种四足动物与土地建立联系的过程已被人类学家John Gray民族志地记录下来，他研究了苏格兰边境的牧羊实践。牧羊人的运动模式主要由羊从牧场到牧场的运动引导。牧羊人说，羊heft on或bond themselves to various places in the land（Gray 1999, 451）。它们通过熟悉感与特定的放牧地点建立联系，因此牧羊人可以期望它们在从草地到草地移动时遵循一个循环路线。然而，术语heft不仅适用于羊与土地建立联系的过程，还适用于这些羊形成一个称为heft的社会单位。此外，它还适用于与农场相连的山地牧场。因此，在使用中，该术语从动物与土地的建立联系，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扩展到农场作为人类社会机构与土地的建立联系（Gray 1999, 451）。因此，heft开始指代人们的归属感。它既意味着（对动物）“习惯于新牧场”，也意味着（对人）“定居、定居或建立在一个地方或职业中，居住”（S.N.D. 1960：heft）。拼写为haft，这个词也在英国其他地方找到。haft的词源主要意义是“使（羊）习惯于不同的牧场”，但它也有一个后来的意义，适用于人，“定居或建立，特别是在居住地”，如“我们现在很好地hafted在这里”（Merriam-Webster 2000：haft；另见O.E.D. 1971：haft）。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从羊与一个地方和彼此建立联系的过程到人类与地方和居住在那里的社区建立联系的比喻理解的转移。

词源学家认为，heft和haft都源自古挪威语（S.N.D. 1960：heft；Merriam-Webster 2000：haft）。这部分很有趣，因为它表明这些术语在英国的历史悠久。这也很有趣，因为它表明hefting/hafting的概念可能与古代习惯法原则有关。haft因此“可能源自斯堪的纳维亚；类似于古挪威语heftha通过占领权获得（土地），hef### 第7章

倾听时间的声音：与圣徒同行于安达卢西亚村庄

卡特琳·隆德（Katrín Lund）

#### 引言

在我于西班牙南部阿尔普哈拉（Alpujarra）山区的布比翁（Bubión）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我经常听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让我感到有趣，还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它有趣，部分是因为故事的内容，部分是因为讲述者总是带着极大的愉悦。而让我感到好奇的是，尽管这个故事本质上是虚构的，甚至带有神话色彩，但它却被认为发生在村庄老一辈居民的记忆中。这个故事与布比翁的守护神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有关，内容大致如下：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布比翁及其周边村庄处于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控制之下。这意味着所有与“民间天主教”相关的圣像和雕像都必须隐藏起来，以免被当局发现。由于当时局势紧张，人们在匆忙藏匿这些物品后，无法在内战结束后准确回忆起每件物品的藏匿地点。故事讲述了内战结束后，村民们开始寻找并恢复这些圣像和雕像。布比翁的邻村卡皮莱拉（Capileira）的村民在他们的教堂地下室中发现了圣塞巴斯蒂安的雕像。由于多年过去，他们误以为圣塞巴斯蒂安是他们的守护神，于是将雕像抬出，在村庄的街道上游行。然而，雕像的重量远超预期，以至于男人们几乎无法抬起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抬着雕像向村庄的中心广场行进，那里是通往布比翁的下山道路的起点。随着游行队伍接近广场，雕像的重量逐渐减轻，于是队伍继续沿着通往布比翁的道路行进。随着他们越来越接近布比翁，圣塞巴斯蒂安的雕像变得越来越轻，直到他们到达卡皮莱拉和布比翁的边界时，雕像的重量恢复正常。这时，卡皮莱拉的村民才意识到圣塞巴斯蒂安实际上属于布比翁。他们误以为他是他们的守护神，只是因为雕像是在他们教堂的地下室中发现的。于是，他们将圣塞巴斯蒂安交给了布比翁的村民，后者继续抬着圣像穿过村庄的街道，最终将其送回教堂。圣塞巴斯蒂安至今仍是布比翁的守护神，每年他的节日都会庆祝两次。届时，布比翁的村民会抬着他的雕像走出教堂，在村庄中游行。

尽管这个故事描述的事件仅追溯到内战结束时期，但由于我经常从那些并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那里听到它，故事中增添了一种永恒的神秘感。然而，当我向我的年长线人佩佩（Pepe）询问这个故事时，他却回答：“没有这个故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我经常听到的故事突然不存在了。“没有故事，”我说，“但人们告诉我……！”佩佩看着我，问道：“你是说关于圣塞巴斯蒂安的故事吗？”他复述了这个故事，以确保我们谈论的是同一个故事。然后他补充道：“这不是故事，这只是人们说的东西。”尽管如此，佩佩的复述不仅让我这个人类学家能够将其录下来，还证实了它的存在。他说这是“只是人们说的东西”，而这正是本章的重点。正如布鲁纳（Bruner）所主张的，“叙事认识到没有故事是‘一个’故事或‘那个’故事，而是一个由许多历史情境下的特定讲述构成的对话过程”（1984，57）。在分析叙事时，我们应强调过程而非最终结果（Jackson 2002，18）。讲故事的过程随着讲述而推进，它是关于与听众分享自己的经历，并将故事转化为听众自身经历的一部分（Benjamin 1970，87）。叙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此外，正如斯图尔特（Stewart）所言，“叙事首先是一种中介形式，‘意义’必须通过它传递。换句话说，故事是生产性的”（1996，29）。确实，要理解一个故事的意义和生产性，我们必须关注它是如何被讲述、传递、重述，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被分享的。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在圣塞巴斯蒂安游行过程中，步行叙事是如何被分享的，并反思其生产性和意义。

#### 背景中的地方

威廉·克里斯蒂安（William Christian）在其关于西班牙圣地和朝圣的著作中描述了圣像如何成为社会集体的象征。它们在景观中占据一个固定的点，通常是当地教堂或周边社区的礼拜堂。他将圣地描述为“人类群体、土地和影响群体事业成功的力量之间的交易点”（Christian 1972，44）。在他看来，对一个特定地方的守护神的共同承诺强化了群体的团结，因为那个地方是他们的共享空间。因此，每个群体通过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对立起来，确认了其作为“宇宙道德中心”的存在（Crain 1992）。克里斯蒂安的分析对于理解地中海地区的宗教活动和神圣空间至关重要，他的讨论为这一地区的节日研究提供了空间视角。

近年来，地中海仪式的研究深受杰里米·布瓦塞万（Jeremy Boissevain）的影响。布瓦塞万关注“传统”如何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变化中经历衰落和复兴的结合。他认为，这种变化在地中海地区表现为从前工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他的观察对西班牙具有重要意义，但也需要一些限定。

西班牙工业化的主要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时弗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解除了西班牙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边界限制。西班牙在二战后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其孤立状态成为越来越大的障碍。除了打开欧洲的大门，弗朗哥将军还开始在西班牙北部地区发展工业。来自西班牙南部，特别是安达卢西亚的人们，仍然依赖不稳定的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向北迁移到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工业中心，甚至远至德国和法国。这种迁移引发了布瓦塞万所称的“传统”衰落阶段，在此期间，农村地区和村庄被年轻有为的人们遗弃，他们离开去寻找更好的生活。然而，布比翁的村民告诉我，即使在那些艰难时期，守护神的重要性依然存在，他的节日仍然被庆祝，尽管比今天更低调。游行本身是庆祝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

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一场“传统”节日的复兴开始了，其特点是普遍对真实性的认识和重新评估。根据布瓦塞万的说法，这一运动从城市地区进入了他所称的“传统”景观，结果，地方节日根据新的兴趣被重新发明。他提出，复兴的条件是由游客、外籍人士以及那些移民到城市地区但回来与亲戚一起庆祝守护神节日的人们建立的。这些人被布瓦塞万称为“外来者类别，以前同质社区中的他者观众”（1992，9）。他的重点是在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空间边界如何被加强。

我同意芭芭拉·本德（Barbara Bender）的观点，这种空间视角倾向于“在根深蒂固的归属感和现代性的异化力量之间创造对立”（2001，8）。为了观察生活的实际状况，而不仅仅是关注人们如何成为外部引入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客体，我们需要引入时间的元素。一旦引入这一元素，并通过观察叙事及其分享方式，内部人与各种外部人之间的分类变得更加复杂和模糊。

尽管布比翁的居民无疑经历了布瓦塞万所描述的经济转型，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80年代初，阿尔普哈拉地区的复兴时期才开始。这种延迟可能是由于该地区的孤立性，它位于内华达山脉的山脚下。此时，来自北欧的人们已经大规模访问安达卢西亚的海岸线近二十年，许多人被诱导在那里定居。随着旅游业的繁荣，海岸线被视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迅速崛起的酒店和不断扩展的服务越来越像外籍人士逃离的地方。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落后”的西班牙寻求真实和简单生活的人来说，他们开始向内陆安达卢西亚进发，遇到了人口稀少的山区村庄。逐渐地，这一运动向更高的山区推进（见Lund 1998；2005），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达阿尔普哈拉。定居的外国人带来了好奇的客人和游客，以及发展该地区旅游业的前景。结果，许多从阿尔普哈拉迁移出去的人开始返回，因为现在有机会在他们离开的地方谋生。其他人也被吸引到该地区，包括来自西班牙城市的年轻人，他们寻找一个他们认为自己所属的真实过去。

在我1994年和1995年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期间，布比翁有200多名居民，其中约四分之一来自阿尔普哈拉以外。然而，在圣塞巴斯蒂安节日期间，许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移民的人带着家人回到村庄探亲。尽管参加节日的人们背景各异，但他们都有强烈的归属感。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和关系通过他们的存在嵌入到这个地方”（Lund 2008，7）。然而，归属的意义和方式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构成归属地的地方方面。莎拉·格林（Sarah Green）写道：“身份和地方是不断被争夺的领域，……两者都是通过排斥和他者化、生成差异的过程构成的”（2005，90）。因此，重要的是要记住，“一个人不仅在一个地方定位自己，也被其他人定位，这可以带来归属方式的动态变化”（Lund 2008，7）。一个人可能会被他人视为外部人或内部人。

尽管如此，这些类别的复杂性在于，一个人永远不会完全在内部或完全在外部，归属可以是在这两者之间的边缘创造个人空间。这允许根据上下文在内部和外部之间进行不同方向的移动。此外，这种包容、排斥和他者化的过程不仅仅定义了内部人和外部人。相反，它创造了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反思他们如何归属以及如何与其他部分内部人和部分外部人相关的情况。个人传记与现在接触——这些传记中嵌入了布瓦塞万记录的转型和变化、衰落和复兴的历史。这段历史并没有削弱表演的真实性；相反，它是仪式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德克斯（Dirks）指出的，“事件的真实性[是]在其表演中铭刻的，而不是在某种时间和习俗认可的仪式版本中”（1994，499）。因此，为了理解通过与守护神同行所产生的意义，人们需要通过参与步行来将自己置于仪式中。对于表演的参与者来说，真实性是看不见的，而是铭刻在同步运动的声波节奏中。故事是一种讲述形式，人们通过倾听来理解。

#### 同步步行

最近关于纪念仪式和朝圣的研究（Connerton 1989；Coleman和Eade 2004；Solnit 2000）讨论了协调运动在相同方向上的重要性，作为生命旅程的隐喻，一种“将时间和地点编织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的动力学体验（Solnit 2000，216）。正如几位作者所展示的（Solnit 2000；Ingold 2000；2004；2007，90-91；Jackson 1983；1998），路径和路线“在时间中展开，就像一个人沿着它们移动时故事展开一样”（Solnit 2000，72）。步行可以被视为一种叙事过程，它将时间和空间编织在一起，因为故事在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属于哪里的观念”（Jackson 1998，177）。

在游行的情况下，与守护神同步行走的运动不仅表达了谁属于哪里，还表达了他们如何到达那里，将人们团结在对同一地方的归属感中。游行将一系列原本分散的叙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和谐的表现，通过这种表现，参与者至少暂时“成为他们所展示的”（Myerhoff 1982，106）。然而，尽管游行中的运动在节奏、步伐和方向上是一致的，但特定的叙事仍然通过人们参与的各种方式显现出来。为了讲述授权归属观念的故事，参与者需要同时能够协商他们的个人叙事。因此，授权的故事是个人版本的融合。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现在将自己的叙事融入这种融合中。

#### 结论

步行可以说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我的讨论集中在布比翁圣塞巴斯蒂安游行过程中步行的生产性上。游行的结构，以其同步的节奏和方向性，编织了一个归属的故事，并将时间的声音编织在一起。我的论点是，这种讲述方式是一种特定的形式，授权人们分享他们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然而，正如布鲁纳所写，“故事的全部力量只有在经历中才能感受到”（1984，73），因此要感受这种力量，人们需要随着游行队伍一起行走。在行走故事的过程中，情节的动态体现在参与者如何提出自己的传记并将其融合在一起，以协助讲述授权的故事。人们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游行。有些人走在前面，有些人走在中间，有些人走在后面。有些人选择站在游行路线上，默默地观看，甚至流泪。有些人在游行经过时加入，而有些人选择不加入。还有一些人选择在节日期间离开村庄，根本不参加游行。这些人通常是外籍人士，他们声称随着每年参加节日的人数增加，节日的真实性已经丧失。然而，这种参与和承诺的多样性仍然有助于形成一种地方感，正如它所经历和分享的那样。

正如基思·巴索（Keith Basso）所写，“人们如何对待他们的地方，与他们如何对待自己作为社会成员和地球居民密切相关，尽管这两者在原则上可以分开，但在实践中是结合在一起的”（1996，7）。在本章中，我展示了这种结合可以通过步行叙述归属地来实现。叙事创造了杰克逊（2005，356）所称的“潜在空间”，位于个人和环境之间。这是一个“每个个体在无意识中协商自己特定妥协的空间，介于给定的事物和他们有效带入存在的事物之间”（同上）。因此，尽管叙事可能表达了流离失所，但它们也如德塞托（de Certeau）所言，“通过它们描述的流离失所来组织地方”（1984，116）。因此，以这里描述的各种方式参与游行，将个人叙事和经历结合在一起，将每个特定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并在一个人所属的地方产生一种联系和连续性的感觉。

### 第8章

日常生活中的旅行与关怀

乔·李·维冈斯特（Jo Lee Vergunst）

一条路有时容易走，有时则不然。在登山者和徒步旅行者中，经常听到关于意外事故的故事，比如受伤、迷路、丢失或遗忘装备，或者恶劣天气。以下是我在苏格兰东北部山区徒步时听到的一个故事：

几年前，我在徒步旅行时，我们登上了克拉赫纳本山（Clachnaben）。在下山时，我在一小片页岩上滑倒，摔断了脚踝。我不得不一路跳下山。实际上并不疼，但非常非常累。我很幸运，骨折很小，是螺旋形骨折，所以它自己支撑住了。但我无法承受任何重量。

另一个故事是在同一地区的结冰小径上徒步时听到的：###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 第一章：行走中的意外与日常

尽管骨折非常轻微，但它是一种螺旋骨折，因此它能够自我支撑。然而，我无法在上面施加任何重量。

另一位行走者在同一地区的结冰小径上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在坎泰尔（Kintail）有一座名为莱斯本（Laith Beinn）的芒罗山（Munro），意为“灰山”。我们前往格洛马赫瀑布（Falls of Glomach），并决定在回程时攀登它。在指南书中，关于这座山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这是一座你可以在回程时轻松攀登的山。”真是见鬼了。我们遇到了暴风雪，天气稍有好转后，我带领大家攀登最后的斜坡，因为那天我是唯一一个带了冰爪的人。其他几个人带了冰斧，而我带了冰爪。我一步步地切割台阶，直到山顶。然而，在指南书中，这座山只占了一小段，甚至只有几句话！

《触摸虚空》（Touching the Void）一书和电影的成功及其媒体关注度，反映了人们对“事情出错”的某种迷恋。这本书讲述了在冰川中发生的一场身体和社会灾难性的坠落故事（Simpson 1998）。理查德·斯托勒（Richard Storer）的畅销书《山间行走的乐趣》（The Joy of Hillwalking）同样专门用一章来讨论“山间行走事故”。正如他所写：“坠落的时间越长，疼痛越剧烈，流出的血越多，这个故事就越令人津津乐道”（Storer 2004, 117）。所有这些传记性叙述都传达了一种强烈的体验感，即当旅程中“真正发生了什么”时的那种感受。在上述第一个轶事中，行走者因一个小小的动作或错位而受伤，尽管伤势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严重——靴子与页岩之间的滑动导致了行走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第二个故事中，指南书中看似微不足道的芒罗山在恶劣天气中变得极具挑战性。尽管这些故事通常以幽默或娱乐的方式讲述，符合山间行走的轻松社交氛围，但它们也揭示了行走者在不同环境中最常感受到的意义：行走本身的现实性，身体在世界的纯粹存在。正是脚下的实际条件和周围环境构成了行走的体验。

本章的一个目标是将这些“接地气”的体验加入到指南书式的行走描述中，并通过民族志的方式探索在苏格兰东北部城市和乡村中行走的方式。我将讨论基于行走中可能发生的一些意外——特别是绊倒、滑倒和迷路。其次，通过关注环境的质感，我旨在概念化行走者与环境的关系，揭示行走中的移动性和相互嵌入性。最后，贯穿这些主题的是“日常性”作为一种感知和认识环境的方式，我将以对日常情感性的质疑作为结尾。

#### 浪漫化行走的接地气

19世纪初欧洲文学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标志着一种对环境特别敏感的开始。这种敏感主要依赖于身处某个地方的经验，并利用这种经验来反思自我和环境。正如华莱士（Wallace 1993）、贝特（Bate 1991）和罗宾逊（Robinson 1989）所描述的那样，行走是这种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这种经验得以发生的途径。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被安妮·华莱士（Anne Wallace）与一种“漫步”文学流派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流派的支持者认为，“行走这一身体行为的自然、原始特性恢复了我们感知的自然比例，重新将我们与物质世界及其内在的道德秩序联系起来”（Wallace 1993, 13）。

然而，在讨论华兹华斯的诗歌时，文学评论家通常并不关注行走本身。行走者的思想或情感会发生一些变化，与人相遇、看到景色、发现地方——但行走身体的动作和行走的节奏作为创造力和“事件性”的来源，往往被忽视。然而，华兹华斯本人对这些有有趣的见解，尤其是在评论行走的困难时——正如上文引用的行走者所描述的那样。《远足》（The Excursion）开篇的一段话说明了这一点：

我疲惫地走过一片光秃秃的广阔荒原，

脚步因湿滑的草皮而受阻；

我虚弱的手臂也无法驱散

聚集在我脸上的昆虫群，

它们随着我的步伐一直陪伴着我。

（I. 24-5）

#### 日常生活中的绊倒与小心

这是对叙述者脚步及其发生环境的详细描述。这些段落（另一个例子在《远足》第二卷，323-28行）与华莱士讨论的更为人熟知的华兹华斯模式形成了对比。在后一种模式中，环境通常表现为天气与山丘、湖泊、田野等相互作用的一系列效果，整体上常被拟人化为“自然”，进而影响思想的发展。相比之下，在前一种模式中，身体的动作被强调。在华兹华斯的自传体作品《序曲》（The Prelude）中，童年旅行中划船的动作被描述为一段著名的段落，部分内容如下：

我将桨插入寂静的湖中，

当我划动时，我的船

像天鹅一样在水中起伏；

当从陡峭的悬崖后面，

直到那时还是地平线的边界，

一座巨大的悬崖，

仿佛带着自愿的力量，

昂起了头。

（I. 402-8）

当叙述者移动时，他周围的一切也在移动。没有宁静的自然景色可以远距离悠闲地欣赏，而是水、山和悬崖的全方位且令人恐惧的体验，几乎淹没了划船者。与作为景色的自然不同，这是一种与周围环境的近距离接触。在湿滑的草皮上艰难行走，或在水面上划船时，浪漫主义理想中的“自然比例”感觉和动作（暗示静态观看或相对轻松流畅的运动）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困难环境中尽力而为的日常感。这或许是华兹华斯的成就之一：他将自己的发展定位在特定的行动和经验领域中，展示了行走的物理特性及其对他个人传记的贡献。

贝特（Bate 1991）将华兹华斯的行走描述为激进的，部分原因在于他寻找与他人相遇的经历，这些经历往往构成了诗歌的基础；部分原因在于他将意义定位在特定的环境和地点，而不是更常被引用的社会结构（如阶级或性别）。相比之下，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通过独自行走、寻找荒野，并强制分离他所描述的“世俗”事务（如政治）与他的直接环境，找到了最多的意义（Thoreau 1862）。然而，他的行走并不完全是一种逃避，因为他认为在行走时，注意力应完全集中在周围环境中，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达到一种最真实和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自然之外的生活，即工作世界，是更难以捉摸的部分，尽管它可能会在行走中令人烦恼地挥之不去。

如今，我们通常将“行走”这个词具体化为英语中的一个名词，这在华兹华斯的作品中很少见，尽管《牛津英语词典》记录了该词最早的使用例子来自乔叟（Chaucer）于1386年的作品。“行走”作为一个事件，是由一个人在特定时间沿着特定路线行走构成的，描述它有助于将其与生活的实际方面区分开来。这意味着“行走”是为了休闲或锻炼而进行的，而一个人去行走时，已经赋予了它一种特殊的非工作状态。像华兹华斯和梭罗这样的作家采用了非工作行走的概念，并通过它探索了各种人格：一个与物理和道德秩序相连的自我，特别是通过自然的认同。

然而，华兹华斯对自己身体冒险的描述，以及本章开头讲述的行走意外故事，暗示了另一种解释。这表明，实际脚步的迈出（或未迈出）是行走如何发生的关键。这与从浪漫主义模式中提取的行走体验非常不同，后者也是指南书中的标准写作模式。在这些模式中，行走者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一种距离，需要通过行走者对环境的欣赏来弥合。我们能否将行走作为一种脚步动作和情感影响的来源调和起来？开始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是更详细地观察日常行走的实际发生方式，特别关注可能发生的一些滑倒、绊倒和错误。它们涉及一种不同的知识，一种“逐渐意识到”，我认为这是日常行走的特征。

#### 日常环境中的行走意外

“日常”行走通过“日常”环境需要一些解释。社会学对日常的讨论集中在社会非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上，特别是在工业化的西方，以及那些对显而易见的事物有隐藏影响的因素上。海默（Highmore 2002）区分了弗洛伊德式的分析——认为我们的隐秘欲望和恐惧需要不断被控制，以便日常能够正常运作（失败会导致弗洛伊德式的“失误”）——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其中生产力量在不知不觉中构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模式。海默写道，日常位于普遍与特殊之间，权力与抵抗之间。陶西格（Taussig 1992, 141）更具体地概述了日常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包括许多不是感觉而是感官的东西，一种体现的、某种程度上自动的‘知识’，它像外围视觉一样运作，而不是深思熟虑的沉思，一种图像化和感官化的知识，而不是概念化的。”因此，感官性而非研究渗透到日常中。我们远离浪漫主义作家的特殊或独特的“研究性”行走，以探索处理穿越环境的基本方式。陶西格在解读本雅明（Benjamin）时，将日常与“公众”和“大众”的普遍概念区分开来，认为尽管日常性可能有许多变体和版本，但仍有可能找到一些基于共同理解的团结。值得考虑的是，穿越环境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提供这种共同基础。这里的重点不在于隐藏的东西，如弗洛伊德或马克思主义的日常概念，而在于通过运动探索的东西。虽然环境会产生意外和意外，但我认为这些实际上可以构成“日常”的核心。

所有行走环境中都会发生意外。我对那些能告诉我们行走者与其直接环境之间关系的意外感兴趣，因为矛盾的是，它们涉及与陶西格的日常性概念非常接近的知识。在这些意外中，我想讨论绊倒和滑倒，然后是迷路。我首先抽象地讨论它们，以了解所涉及的一般过程。绊倒的核心是环境对行走者运动的干扰。当一个物体（从而成为障碍物）与一只脚接触时，发生在脚抬起阶段，此时脚应该在地面上方无障碍地移动。脚的节奏被突然打断，腿抬起并试图跨越障碍物。与此同时，另一只脚通常站在地面上，但如果被阻碍的脚无法移动，它可能会向前跳跃以进行反应和补偿。上半身的动量可能会使行走者向前倾斜，以至于无法通过任何一只脚恢复平衡，绊倒变成了向前跌倒。

观察绊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些动作的速度极快，仅需一瞬间即可发生。绊倒的人并不了解技术细节，或多或少地屈服于力量和冲击的相互作用。但可以进行调整。我在阿伯丁（Aberdeen）的街道上看到过绊倒发生在不平的人行道板上，行走者向前移动手臂以帮助恢复平衡，有时可能会小跑一两步以摆脱绊倒，有时会低头或回头看人行道。在山坡上穿过石南花迟早会导致绊倒，因为石南花丛高度不一，很难判断每一步需要将脚抬多高。在山坡上，绊倒通常发生在脚在地面上方移动时碰到某物——可能是岩石——并撞到站立腿的后部。从某种意义上说，行走的节奏被障碍物对脚运动的入侵所打断，但有趣的是身体的重新调整，使运动得以继续。行走者巧妙地重新平衡：迅速抬起一只脚，将另一只脚放在不同的位置，通过手臂和背部转移重量。绊倒只是众多调整中的一种。它构成了旅程中的一个插曲，而不是旅程之外的东西。

滑倒与绊倒在一些有趣的方面形成对比。绊倒是移动脚的打断，而滑倒则迫使通常静止的脚移动。行走通常依赖于站立脚对地面的牢固抓握，身体在其上方旋转，自由脚向前迈步。如果抓握力不足，站立脚会随着身体通过脚跟的动量向前移动，同时自由脚在躯干前方移动。第一个反应，就像绊倒一样，是试图用自由脚纠正情况，自由脚立即拍打地面，冲击脚掌。如果自由脚不够快以恢复稳定，或者无法获得抓握力并自己滑倒，站立脚会继续向前滑动。它要么在能够再次抓握时停止，要么在地面上方移动并导致行走者向后跌倒。这里有一种过度的运动：在我们依赖地面停止脚移动的步骤部分，脚反而继续滑行，脚的节奏性滚动运动变成了快速向前的加速。在滑倒中，环境对行走运动的干扰不够，这与绊倒中过度干扰的环境形成了对比。

图8.1 一位行走者在山坡上滑倒。他的右腿偏离了直线，但在手杖的帮助下恢复了平衡。

滑倒与绊倒之间的另一个对比在于人们对滑溜的意识和准备程度。绊倒和滑倒都是相当常见的行走事件，但在阿伯丁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中，滑倒更多地被反思并在行走时牢记。可能是因为绊倒是一种如此意外的事件，除了在行走时抬起脚的标准方式外，没有真正的避免程序。大多数绊倒也是非常小的不便，因为被绊倒的脚通常能够简单地抬起越过障碍物。另一方面，滑倒更容易导致完全失去平衡和跌倒。向后跌倒也更有可能损伤身体躯干，相比之下，绊倒的向前跌倒通常会导致腿和手臂受伤。

从与人们的对话和共享行走中可以看出，行走者对滑溜的意识。在城市中，这个话题可能会在谈论人行道和街道的物理构成和状况时出现，通常与鞋类有关。特别是阿伯丁市中心的许多人行道由花岗岩制成，这是一种坚硬但光滑的石头，在潮湿天气中会变得滑溜。行走者有时会根据滑溜的可能性更换鞋类，例如，更喜欢平底的模制橡胶和塑料鞋底，而不是高跟鞋或皮革“时尚”鞋。一位行走者在走向工作地点时对我说：“我今天穿了这双鞋（带小高跟的皮鞋），但下雨时，那里的人行道会变得很滑。”在城市中的雪和冰期间，常见的是穿着登山靴以防止滑溜和潮湿。这种靴子允许保持相当“正常”的步态：直背、腿的伸展和脚在步进时从地面抬起。其他人有时使用完全不同的行走风格，例如在雪中拖着脚走，脚抬得很低，双脚分开得很宽，走路时接近罗圈腿，或者迈很小的步子。在城市中穿越雪地时表现出的变化表明，环境条件的变化并不会产生统一的反应。相反，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穿越困难环境的方式。差异在脚与地面的接触中显而易见：短暂或持久、频繁或间隔、狭窄或分散。鞋类的多样性是行走者与环境关系的另一个维度，天气也是如此。滑倒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甚至可能比绊倒更多。

滑溜也与特定地点相关，正如上文介绍的一位行走者所解释的那样，与人行道有关。在阿伯丁接近一座湿木桥时，另一位行走者描述了她对滑倒的恐惧：“我讨厌走过这座桥。我太害怕会摔倒了。”她迈着小步，看着脚下的位置，并抓住桥边的栏杆。一些行走者面对鹅卵石或堤道街道时也有类似的恐惧，这些街道上不平但非常光滑的石头在平衡和行走所需的额外体力方面都会造成困难。在乡村和山区，小径通常会结冰，而其他地方可能只是潮湿，再次需要技能来安全地通过它们。有时行走者会故意在冰面上滑行，通过保持重心在脚上来防止滑倒，或者使用其他技术——拖着脚走、测试、用手臂平衡——这些技术在城市下雪时也会使用。但这并不是说滑倒不能像绊倒一样意外。我目睹了一位男子在开始过马路时滑倒并向后跌倒。有一个光滑且倾斜的路缘石（设计用于允许轮椅或婴儿车在人行道和道路之间通行），他的光滑鞋底无法获得抓握力。他匆忙起身离开现场（以及我临时尝试进行一些田野调查，或至少看看他是否没事）揭示了一种尴尬，这证明了个人在行走中应行使的控制，特别是在城市中。我们采取的预防措施和调整以避免意外当然从来都不是万无一失的。

图8.2 阿伯丁的花岗岩人行道

也许与直觉相反，这些动作符合陶西格对日常感官性的概念化，一种体现的“知识”，涉及特定的感知和行动方式。再次在他对本雅明的解读中，他将其总结为日常的触觉性知识（Taussig 1992, 143），通过与事物的接触而不是远距离的沉思构成。自由脚在绊倒中试图跨越障碍物，或在滑倒中拍打地面的方式，展示了行走中涉及的小技能，依赖于对环境的直接感觉，而不是对它的远距离和概念化研究。还有许多相关的技能，包括在行走前和行走过程中判断行走条件，并调整行走技术以适应它们。许多经常行走相同或相似路线的人，无论是为了“工作”还是“休闲”，都评论说他们的旅程在实践中呈现出看似无穷无尽的变化。有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天气条件和周围发生的不同事情，更不用说行走者每天的情绪和身体状况的变化（Lee and Ingold 2006）。环境每天都在重新探索和重新学习，无论是在路线上还是在每一步中。意外特别是指出环境真实面貌的例子。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再次思考行走者的周围环境实际上由什么组成。到目前为止，我强调的品质是突出或平坦、粘性、粗糙或光滑，根据脚的条件和眼睛的判断来感受。它们是质感。与表面不同，质感在人们移动时并不清楚地将上方与下方分开。它们是通过两种物质在运动中接触所产生的摩擦程度和种类来体验的。湿滑的人行道对光滑鞋底的鞋子来说是滑溜的，而干燥的沙滩允许赤脚沉入并滑过。在长途徒步中，疲惫的行走者更有可能被松动的岩石或树根绊倒。因此，环境或人的内在属性只有在成为质感相互作用的一部分时才重要，这种相互作用然后促进或阻碍各种运动。正如英戈尔德（Ingold）所展示的那样（2000, 241），这种运动的不断变化的、有质感的地面与西方导航和制图传统中通过想象的“鸟瞰图”——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不可能的同时无处不在的视角——投射的各向同性平面表面相去甚远。此外，质感暗示了一种触觉性，正如陶西格所建议的那样，可以产生特定的日常或非沉思形式的环境知识。

根据使用模式和社会网络，行走的地面本身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它可以通过定期使用而变得坑洼或光滑，或者由于缺乏使用而变得模糊不清。哈里森（Harrison 2004）描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塞皮克（Middle Sepik）地区杂草丛生的小径是如何成为曾经社会关系密切的村庄之间关系恶化的标志。他写道，允许一条小径荒废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积极遗忘，在一个倾向于遗忘而不是记忆的河流景观中。在前殖民时期，新的开辟小径会被故意留下杂草丛生，以掩盖它们的使用并防止敌人伏击。小径也在苏格兰东北部索引社会关系，尽管方式相当不同。例如，许多村庄和小镇正在开发新的休闲和通行小径，以符合最近的苏格兰户外通行立法。工作通常涉及活跃居民、土地所有者、地方政府和各种自然保护、通行和发展组织的合作。小径体现了它们生产的社会网络，包括必须处理合作工作和资金官僚机构的当地发展形式。在一个村庄，阿伯丁郡的塔###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 第九章

#### 穿越废墟的行走

蒂姆·埃登索（Tim Edensor）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穿越工业废墟行走的影响。过去三年中，我在英国各地进行了多次徒步旅行，穿越了不同年代和衰败状态的建筑和遗址，从老磨坊到仓库、铸造厂、车辆修理厂，以及许多无法确定先前用途的废弃场所。尽管在英国，撒切尔时代的去工业化是废墟景观最为丰富的时期，但许多城市地区仍然散布着工业废墟，尤其是在那些未能在新投资竞争中繁荣的城市。沿着铁路和运河，在旧工业区和被忽视的城市间隙地带，废墟继续崩塌和衰败。尽管这些场所常被贬低为令人沮丧的领域、浪费的空间和景观的污点，但它们支持着各种人类活动和非人类生命形式，同时也提供了与过度编码、主题化的城市更新空间不同的美学、身体和历史体验。因此，它们能够对这些看似无缝的再生过程提出质疑，并提供了反美学和替代记忆可能出现的空间。在这里，人们可能会体验到与物体和物质性的不同接触、奇特的感觉和难以言喻的印象。因此，我将重点探讨通过徒步穿越工业废墟或废弃场所如何为行走打开批判性思考的空间，并提供多样化的独特体验，使脚与世界的接触变得陌生化。

首先，我将关注工业废墟为即兴行走提供的可能性，以及线性通道的障碍和危险的存在如何同时使空间陌生化并激发行走的身体。其次，我将探讨穿越废墟时产生的感官特征，关注废墟的特殊可供性和不寻常的物质性，这些特征促使行走的身体进入不熟悉的状态。第三，我将讨论穿越废墟的行走如何涉及一种特定的环境观察方式，并探讨这种观察方式如何引发对行走和视觉特征的思考。最后，我将批判性地探讨行走与叙事之间被广泛讨论的隐喻关系，认为这种类比被过度夸大。穿越废墟的不可读、碎片化体验表明，行走通常并不适合权威性的表现。

#### 在规制的城市中行走

所有形式的行走——甚至其他移动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和推动，包括所穿越地形的物质特征，以及明确或微妙地强制规范移动模式的特定规制制度。针对各种城市空间秩序化的方案，我将对比废墟的无序空间，但首先我想探讨行走如何被特定的规制程序所限制——尽管从未完全限制。最明显的是，城市行人的活动、路线和数量越来越多地受到闭路电视摄像头的监控，这些摄像头覆盖了越来越大的城市空间（Fyfe 2004）。尽管监控屏幕的人无法持续观察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所有被监控的行人都可能受到审查。行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可能被观察，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移动并限制他们的行为，特别是如果他们聚集在人群中，从事“不社交”的活动（如“制造骚乱”或“闲逛”），或进行乞讨、街头表演或街头交易，他们可能会受到警察和保安的干预。对无家可归者居住空间或通道的剥夺产生了一种“永久移动”的状态，这种状态源于无家可归者的“无处可去”（Kawash 1998, 322-9）。这些控制模式“净化”了空间（Sibley 1988），并识别出在这些空间中被认为“不合适”的事物、人和行为（Cresswell 1996）。

这些秩序化制度伴随着行人内部对表演性规范的内化。这些规范规定了人们如何以及在何处行走，包括偏好的技术、举止风格和对周围环境的态度。在城市中漫步的人们被期望以适中的速度行走，并以线性方式前进。他们不应以过于意外或过于夸张的方式表达自己，也不应跳舞、跑步或表现出运动的愉悦感——“永远不要握紧拳头、热情的吻、轻佻的眨眼或坚定的步伐”（Boddy 1992, 123-4）。不仅偏离规范行走模式会遭到不满的目光和评论；这些模式还通过自我监控来培养，通过一种具身的自我意识来限制潜在的动作、手势和风格的范围。这种自我反思的态度可能特别适用于“后现代”城市，根据Csordas的说法，在这种城市中，身体已经成为“主要是外观、展示和印象管理的表演自我”（1994, 2）。在这里，行走被表现为一种编排的表演，身体通过风格化的动作和姿态传达意义，并被自我意识所包裹。

在西方城市中，游客、工人和购物者沿着有界的人行道和传送带遵循着偏好的、有标志的路线，这些路线构成了更大的循环系统的一部分。这种身体的传送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活动、风格、举止形式和移动方式的范围被限制。这种限制与西方以外不同规制城市的活力形成鲜明对比。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印度集市的特征（Edensor 2000b），在那里，更广泛的社会活动被允许，包括那些在西方背景下被认为是私人的活动，以及各种家庭、商业、社交、政治、消费导向和娱乐活动，这些活动可能同时发生，并且既不受软控制也不受更严格的规制。同样，在复杂的多方向、不同速度的移动矩阵中，穿越空间的人、车辆和动物的范围是规范混合的一部分，其活力使西方城市相比之下显得苍白。

当然，西方“后现代”城市也可能被构想为“迷宫般的、自由流动的和不可控的”，以及“包含和困住”的（Briginshaw 1997, 35）：一个不仅是恐惧和异化的空间，也是感官、幻想和情欲可能性的空间。但这些机会受到强大规范的制约，这些规范限制了表达性身体表演和更无阻碍地与物质世界接触，以及关于定位物体和有序空间不可侵犯的既定假设。根据这些假设和规范，外来者被识别，障碍被维持，财产观念被维护，单一用途的空间被创造。然而，尽管行走规范普遍存在，某些替代领域在“主导秩序之间的间隙空间”中出现（Stanley 1996, 37），构成了Levesque（2002）所描述的“模糊地带”：

一个没有精确边界的模糊空间……一个地方……在城市生产结构之外，一个内部的、无人居住的、非生产性的、通常危险的岛屿，同时处于城市系统的边缘和系统的基本部分……城市的反形象，既是批判的线索，也是超越的可能线索。

工业废墟属于这种模糊地带。

#### 废墟中行走的可能性

与规制城市中有意引导的移动相比，废墟的物理结构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邀请和限制了行走。在持续衰败的条件下，物质结构和路径不是按照秩序化方案分布的，而是根据偶然性出现的。这意味着，在废墟中的人们不是朝着物体和目标移动，而是倾向于偶然和即兴地行走，他们的多种动作、情绪、手势和节奏掩盖了行走作为单一实践的任何感觉。这种偶然的即兴创作特别明显，因为任何工业场地的历史组织都需要相反的东西，即根据生产线需求对空间进行层次化、顺序化的安排——这种严格的规制审查了身体的移动，将其置于严格的规制之下，并限制了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移动。

随着曾经精心维护的顺序路径的消失或堵塞，以及墙壁和门的倒塌，大型废墟通常类似于迷宫，其中路径的选择是任意的，并且有多种选择。决定遵循哪个方向是根据机会、直觉和一时兴起，而不是由物质结构、监控和内化的行走规范所强制。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开口——有时进入以前无法进入的空间——相反，看似显而易见的路径被一堆无法逾越的瓦砾堵塞，或者终止于垂直下降。因此，我们可能会根据多种几何形状漫游。与其遵循标志路线、地图或线性空间安排提供的指导，我们可能会反复覆盖相同的路线，上下楼梯，在屋顶或地下室行走，在倒塌的固定装置之间绘制一个愉快的障碍路线，依次探索与大型车间区域相邻的房间，在剩余的站立墙壁内外交叉行走，或根据各种其他临时程序。路径随着行走者被好奇心、潜在的移动通道、诱人的表面和坡度以及奇特的冲动所召唤而演变。

在我们喜欢的地方停下来，被奇特的景象或固定装置分散注意力，或被微空间吸引，这些微空间以难以解释的承诺吸引我们，废墟中的行走过程可能会呈现出一种走走停停的特征，一种断断续续的节奏，而不是重复的脉搏。同样，旅程由片段组成的观念被一条通往无处可去的路径中缺乏任何明显顺序所混淆，因为穿越废墟的行走的时间结构不受关于旅程应该持续多长时间的惯例的支配（例如，一英里在20分钟内以高于平均速度行走）。与其限制可用的移动范围，废墟的混乱可供性促使身体弯腰、蹲下、攀爬、滑行、跳跃、转向和挑选路径以避免潜伏的危险。由于脚下的表面变化和不均匀的纹理，行走无法遵循有规律的节奏步态，这些纹理迫使脚步高低不一，步伐或小或大。通常不可能以不间断、有目的的方式朝着预定目的地前进。与废墟空间互动的持续身体即兴创作通常从一个入口点开始，进入需要身体努力爬过不稳定的墙，穿过缠结的植被开辟一条路径，或挤过一个小窗户或部分打开的门。一旦进入内部，必须绕过、跳过、避开或平衡各种障碍物，从倒塌的砖石和旧机器到各种描述的碎片。

废墟不断演变的反结构与决定城市中大部分移动的监督线性形成对比，并打开了许多通常不会被穿越和占据的空间。尽管有警告侵入者将受到惩罚的标志，但几乎没有对穿越废墟的行人进行监控。最多，保安可能会为一些短暂的陪伴感到高兴，或者临时居住的无家可归者可能会守护他们的空间，但除此之外，没有规则或人员阻止行人冒险进入任何地方。此外，在几乎没有人类存在的空间中，限制表达和戏剧性即兴创作的行走表演的专有代码是无关紧要的。没有社会障碍限制移动，没有时间限制规定在那里度过的时间，也没有必要在监视旁观者的城市中坚持自我监控自己的身体。所有这些元素都允许废墟的游客在没有被他人规制的情况下行走。我们可以长时间停留、闲逛或奔跑，没有任何目标。

废墟中的行人可能会沿着休眠的生产线行走，在过时的机器上行走，在办公椅上旋转，滑下滑梯，爬上梯子和消防梯，爬进阁楼或下到阴暗的地下室。曾经包含秩序的其他空间现在可能被侵犯。我们可能会滑过董事会会议桌或在工头的椅子上休息。因此，行走可能会被其他几种身体努力所增强。有空荡荡的走廊可以冲刺，楼梯可以跑上去，窗户和其他空间可以爬过。有陷阱门可以避开，或者通过它们掉下或投掷物体。爬过茂密的灌木丛，翻过墙壁和篱笆，跳过障碍物和跨越间隙，踢着地板上的各种质量的碎片，向选定的目标投掷瓦砾，在地板上跳舞和冲刺，这些都会重新唤起对童年体操和表达性运动的意识。受流行文化意象启发的幻想可以通过在屋顶上奔跑或沿着破旧的消防梯疾驰来实现。由于这些对表达性和游戏性运动的激励，废墟中充满了游戏性运动的迹象。绳秋千悬挂在木梁上，爆裂的足球和即兴的球门柱散落在地板上，瓶子排列在射击场中，轮式容器被用作即兴的交通工具，足球场被临时搭建。废墟是儿童和成人在“过度确定的、狭窄的、有条理的成人存在、成人空间和成人组合”之外的替代游乐场（Cloke and Jones 2005, 330）。间隙空间如废墟是冒险、建造巢穴和想象性游戏的场所，而不仅仅是那些与浪漫和田园诗般的童年版本相吻合的场所。

广阔、废弃和清理的车间地板使得壮观和危险的冒险表演成为可能。橱柜、储藏室、地下室、阁楼和办公室提供了舒适、愉快的空间，可以作为巢穴和藏身之处。在这些无人监督的游乐场中，平衡、敏捷和勇敢的壮举可能会完成，这些游乐场充满了风险，与外部更有序世界的受规制的娱乐空间——即官方指定的“游乐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将允许的实践范围限制在“适当的”和基本上无风险的活动中。废墟允许回归到一种不那么自我意识的与空间和材料的接触，而无需有目的的规划或对实用性的考虑。

除了解放身体运动外，废墟还可以提供奇怪和破坏性的行走空间。进入黑暗的内部空间会使已经适应了一个永远被照明的世界的感官感到困惑，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开放的，眼睛能够通过空间绘制一条路径。在昏暗的光线中，突然意识到身体的微妙、即兴平衡，这种运动需要在不稳定的空间中摸索前进，与周围环境保持联系。穿越一个巨大的空旷空间，可能是穿越一个曾经是车间地板的混凝土地板，脚步声回荡，身体是唯一移动的、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整洁的领域中，这会引发一种突然的孤立感。其他奇特的体验通过面对衰败的纹理而出现。例如，我曾经走过一片广阔的木质地板，由于潮湿的渗透，地板已经弯曲形成波浪，创造了视觉上的惊喜和对行走的挑战。这些物质偶然性要求在不熟悉的空间中进行不熟悉的运动，引发对身体运动效果的意识——在不寻常的表面上行走产生的声音、物质的位移和衰败泥土中留下的脚印——以及对其未经练习的能力的感觉。

习惯于安全和无缝移动的行走身体还必须应对不寻常的风险，如滑溜的木材、松动的地板、突出的钉子、陷阱门、摇摇欲坠的楼梯、摇摆的灯具和电线。因此，废墟中的行人需要考虑他们遇到的不稳定或滑溜的地板，并且必须区分稳定的表面和那些太危险而无法行走的表面。根据遇到的障碍物进行即兴创作，身体在一段时间后会发展出对废墟空间的感觉，知道在哪里和不应该在哪里行走。

穿越废墟还违反了通常的常识性边界，这些边界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性质——内部和外部、过去和现在、农村和城市、自然和文化之间的边界。当然，这些边界的广泛理解和接受是行人复制空间并在其中表演的方式所固有的。然而，在废墟中，曾经构建的隔间以支撑这些边界并最小化其越界范围的隔间被打破并融合。屋顶、墙壁和窗户向元素敞开，掩盖了内部和外部的区别。植物繁茂生长，动物进入以前被划定为内部的空间。我们穿越各种非人类的足迹，鸽子的飞行路径、兔子和狐狸的踪迹以及较小生物如木蛀虫的痕迹。废墟的世界充满了通常被分配到边缘空间的非人类生命形式。此外，穿越废墟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时间感，正如我在下面更详细地讨论的那样，这有助于分散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简单划分。例如，废弃的空间通常充满了过去的模糊迹象，这些过去很少能被理解，但它们也充满了新的生命形式。

因此，工业废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陌生化的空间，其中的通过模式是即兴的、不受惯例指导的、不断中断的和表达性的。与其说是一种自成一体的身体举止，具有固定的步伐、稳定的步态和最小化的手势，限制了与环境、物体和其他人的互动，不如说身体无意中被引导进入一种更华丽和表达性的风格，唤醒了超出其习惯的表演可能性。废墟的物质特征以及缺乏监控形式和社会压力，允许行走方式促进身体体验和表达的扩展，与城市行人大部分受限的倾向形成对比。这种陌生化进一步通过废墟的奇特感官性被带出。

#### 工业废墟的感官可供性

为了进一步发展上述讨论的一些想法，我现在转向对工业废墟的物质可供性和感官特性的更详细描述。我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平衡文献中对行走作为一种通过观察和表现世界的体验的叙述的强调。这些叙述呈现了一种奇怪的非具身观点，而行走是一种强烈的身体体验。通过淡化脚与身体其他部分以及所穿越空间之间的关系，它们往往忽视了行走所提供的更全面的感官体验。###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 体验

弱化脚与身体其他部分以及行走空间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导致忽视步行所提供的更丰富的感官体验。

我已经提到，步行穿越西方城市的体验正变得越来越去感官化。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 1994, 15）甚至认为，城市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纯粹的运动功能”，导致了“触觉的贫瘠”，进而使身体变得麻木。森内特认为，为了减少对行人和驾驶者的干扰和分心——让他们专注于购物、工作和娱乐——运动被典型化为快速通行而不带任何情感。他专注于“微动作”所代表的与空间的最小互动，这些动作使旅行者对其环境变得麻木，优先考虑“自由移动的欲望……而不是身体移动所经过空间的感官诉求”（同上）。这种去感官化的环境反过来影响了通过脚感知世界的方式。平坦、无菌的表面——城市铺装的平滑触感——确保脚和腿不会因与地面的接触而活跃，也不需要因感知不规则而进行偶然的操作。在这些物质条件下，只有当脚感到疲倦时，对地面接触的体验意识才会真正显现。

我对物质性对步行感官体验的影响的关注，源于一种坚持：步行永远不能纯粹被视为由表演惯例、意识形态和浪漫预设或其他社会和文化理解所塑造（或约束和促成）的行为，因为这将步行从物质世界中抽象出来。正如费尔德（Feld）所指出的，“当地方被感知时，感官也被安置；当地方有意义时，感官也创造地方”（1996, 91）。在这里，借用“情感”（affect）的概念是有用的，它表示“地方和情境的情绪、基调、色彩或强度的变化”（Wylie 2005, 236），只要它们嵌入并体现在物质和物体的（暂时）配置中。因此，地方对行人身体产生了影响，因为它的可供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于其物理和物质特性与步行社会性和主观体验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文化准则对这一实践的解释。根据塞雷梅塔基斯（Seremetakis）的说法，“感官不仅作为内部能力或力量被封装在身体内，而且作为事物的自主特征分散在事物的表面，然后作为感知体验侵入身体”（1994, 6）。

高度规范、熟悉的城市空间被组织为允许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其物质性和感官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规范性表演的干扰，诱使身体执行与通过重复惯例巩固的倾向相一致的常规、规范性步行模式。城市空间的规范通常涉及管理感官世界，将强烈的气味、噪音和粗糙的质地排除在外。虽然香、咖啡和面包的商业化气味弥漫在购物区，但污水、食物和工业的气味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创造了德罗布尼克（Drobnick）所称的“平淡景观”（blandscapes），即“由现代主义去味化驱动创造的无菌场所，如此空洞以至于导致了一种疏离的无地方感”（2002, 34）。同样，声音被精心控制，降噪程序限制了噪音，而通过铺设平滑的质地来设计充满背景音乐的声音景观，以消除身体移动的声音。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制造的平滑性确保了身体在行进过程中不受干扰，并能够无障碍地移动到目的地。

相比之下，在遭遇废墟空间时，身体被丰富的多感官效果——包括气味、声音和触感——所激活和挑战，这些效果阻碍了任何优先考虑视觉的疏远操作。我认为，以废墟为中心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活动之所以成为可能并令人愉悦，是因为它们发生在一个充满丰富且不熟悉的可供性的空间中。这里我指的是废墟中物体的质地、形态、重量、一致性和衰变状态等特征，以及步行所经过和围绕的其他重新分布的物质和材料。步行者体验到衰变材料的不熟悉质地、工业金属机械的坚硬冰冷感、潮湿木工作台的分裂和浆状质地、数十年磨损至光滑的木扶手的诱人光泽、墙纸和灰泥的霉变潮湿、油桶和钢箱的重量、形状奇特的边角料和未组装的制造碎片的丰富性、链条和齿轮的厚油脂、铸造配件的结壳外表、电线和薄金属条的柔韧性、苔藓的柔软一致性和湿腐木的粘滑感。

在不同触感和质地的表面上行走——分裂的地板、坚硬的混凝土、碎石铺就的地面、玻璃碎片、混合的植被和破碎的砖石表面——唤起了对德勒兹（Deleuze）和加塔利（Guattari, 1987）所称的“成为动物”（becoming animal）的意识。对我来说，对废墟的熟悉培养了对物质和空间的高度敏感性，类似于在苏格兰长途步行中所体验到的感觉。几天后，对穿越地形的更深层次、非认知的感官形式的欣赏通过脚和腿发展起来，促进了通过增强的身体平衡感对环境进行适应。同样，在废墟中，对身体危险的意识发展出了一种更感官化的身体，它能够考虑并学会如何应对危险的空间。

步行身体在废墟的临时结构中的即兴表演可能会触发不熟悉或半记忆中的动作，这些动作将身体从自满、固定的镇定和习惯性无表情的自我意识表演中唤醒，这些表演在城市街道上上演。因此，成年身体可以与其周围环境进行更广泛的物理互动，一种充满感官童年游戏的身体倾向。最初具有破坏性的废墟物质性可以使身体向感觉开放，并以一种无自我意识的、游戏的方式与空间互动，使我们能够在一种情境中既身体又感官地参与，在这种情境中，我们的行为可能对礼仪和财产几乎没有影响。

尽管步行穿越废墟的体验模式特别多样且偶然，但它们也反映了更广泛的步行体验。然而，它们在废墟中被压缩，在那里我们可以从一个微空间走到另一个微空间，感知不同的氛围，意识到不同的声音景观和气味，以及其他更难以描述的暗示。如果社会化的维度被置于背景中，步行行为可以使我们适应地方的（不断变化的）感官性。通过空间的移动产生了不同强度的展开时刻，这些时刻将步行者、物体和非人类生命形式联系起来。体验的强度和丰富性在这些关系元素之间分布，并由它们的品质塑造（Amin and Thrift 2002）。步行与废墟及其众多不可预测的组成部分交织在一起，与这些废弃环境的体验和互动，像其他环境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使身体熟练地适应感觉、危险和吸引力，并发展出替代的思考、感知和移动方式。正如怀利（Wylie）所说，通过步行，“自我和世界在一种柔韧且不断折叠和展开的过程中重叠”（2005, 240），在与地方和空间的独特可供性的相遇中。

#### 步行中的视觉：视觉与废墟

步行穿越净化、高度规范化的城市空间的一个方面是视觉的主导地位和其他感官体验的边缘化。在讨论旅游空间时，Rcjek认为，它通常被设计为排除“外来的、混乱的元素”，并将“视觉和功能形式简化为几个关键图像”（1995, 62）。正如厄里（Urry）所说，游客可以“占有物体和环境，通常是在远处”（2002, 147）。通过框定视野、吸引注意力到特权景点并突出特定的文化主题，旅游管理者和设计师将地方的视觉消费置于前台。同样，壮观的城市空间受到密集的美学控制，在典型的主题公园、遗产景点、节日市场、住宅区和购物区中，动员了一种“品牌化”空间的编码，并将其简化为几个关键主题或设计。

废墟违反了纪律美学方案，在这些方案中，物体被精心安置，差异被驯化和包含，“可能复杂化视线和通道的杂乱”被不断移除，明亮和平滑被保持。因为在废墟中，没有刻意保持外观的尝试。场景是混乱、无序和通常不同类别事物的混合。这种物质过剩，其中事物和物质从它们指定的位置移开，最初对习惯的美学感受是令人不安的。在废墟中，我们面对一种替代美学，它谴责了许多城市设计的无缝性，并开辟了欣赏美和形式的异端可能性。不寻常或异常的景象可以将身体从步行过程中的任何静止沉浸中唤醒。奇怪或偶然的雕塑、位于奇怪位置的事物、事物的并置和物质的古怪组合扰乱了适应视觉秩序的目光。此外，当注意力必须集中在路上的障碍物上并且必须处理物质偶然性时，远距离的视觉理解是不切实际的。一种专注的、全神贯注的运动模式是由需要操纵而产生的，但我们也可能突然意识到身体的紧张、周围环境的质地和记忆的爆发。

在美学规范的城市空间中，行人的目光被组织为抑制视觉的运动学品质，通过将触觉、听觉和芳香品质的距离化，视觉变得去感官化。城市空间的美学主题化和规范掩盖了（不断变化的）空间如何被视觉理解为景观，景观本身由独特的物质性和影响构成，这些物质性和影响影响——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我们的意义生成能力。例如，光的品质不断促进和限制视觉，从中我们可以推断，我们不仅在其中，而且与周围的空间一起看到。步行总是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当我们的注意力从脚的即时性间歇性地转移到附近或更远的景象时，我们可能会以非视觉的方式感知这些景象，因为景象可能会唤起对质地、重量和气味的理解。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凝视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唤起过去的理解。因此，当我们步行时，我们总是旅行到其他地方，不仅沿着眼前的路径，而且向外到远处的景象和场景，回到过去和想象中的地方，以及记忆中的气味、噪音和非视觉感觉，通常是由旅途中的景象所激发的。

这种视觉与其他感官的混合——加上认识到视觉的主导地位并非不可避免——在废墟中行走时尤为明显。正如拉瑟姆（Latham）所说，这是一个培养“一种看待和体验世界的方式的环境，在这种方式中，眼睛不会将外部物体固定在坚定的沉思目光中……它是一种感受周围环境的方式，而不是用距离化的目光固定那个地方……[它]与身体的其他感觉紧密相连……”（1999, 463）。在这种环境中，看是特别多感官的，不可分割地嵌入在身体与周围环境互动的所有其他感官的工作中。

#### 时间性、叙事与步行：废墟的不连贯故事

在讨论通过废墟的未规范空间步行可能实现的表达和感官表演的潜力时，我强调了空间物质特性的影响。我故意这样做，以抵消许多学术写作中步行物质性被叙事边缘化的倾向，叙事既作为描述步行的手段，也作为步行本身的隐喻。步行通常被认为类似于叙事，因为城市中的步行者被英勇地认为在空间中刻下他们的存在和意义。最著名的是，德塞托（de Certeau, 1984）认为他们产生了“短语的转折”，这些转折与权力者制定的元语言相对抗。但通过将步行作为叙事刻写的隐喻置于前台，步行的情感、感官维度往往会消失。

在考虑步行作为叙事的政治时，重要的是要承认步行叙事在巩固他者表征方面高度共谋。像试图按顺序捕捉旅程“本质”元素的旅行叙事一样，西方人在“异域”空间步行的叙述是殖民化操作，主张对土地的权威理解。通过步行，专家自信地辨别出景观中的文化痕迹，并绘制其“自然历史”以及其他“关键特征”，这些特征标志着所穿越的空间，以便他者——无论是自然的、文化的还是历史的——可以被“了解”。这些步行叙事不仅确定了理解他者领域空间的首选方式；它们还绘制了步行者可以定位自己与周围环境的众多路线——例如，通过遵循长距离步道的注释指南。

尝试将步行作为一种叙事技术来陌生化城市的壮观、规范化和商品化空间，以产生多重意义的替代解读（Lefebvre 1995），无疑是有用的。然而，像超现实主义的步行模式和辛克莱（Sinclair, 2003）的心理地理学叙述一样，它们特别强调神秘、犯罪、文学和政治，奇怪地使与物质世界的身体、感官互动去中心化。步行叙事通常创造了一种通过顺序时间线性进展的幻觉：这个或那个特征被经过、讨论，然后下一个，依此类推，直到步行结束（Kearney 2002, 129-31）。然而，尽管可能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步行的临时体验通常远非一系列连续的事件。这在步行穿越废墟时尤为明显，它突出了复杂的时间性，从而引起了对叙事作为描述步行的技术手段和作为步行隐喻的局限性的关注。步行穿越废墟通常涉及循环和舞蹈般的重复，通过不同的视角接近和穿越同一片土地。

步行充满了混合的思想、体验和感觉的万花筒，因此步行的特征不断变化。这适用于众多的非线性时间性，正如其他地方一样，它们是“多重、复合、同时、开放和变化的”（Adam 1995, 5）。在这里，我借鉴了亚当（Adam）对飞机旅行重叠时间体验的有说服力的描述（同上，12-13），其中众多时间性重叠：普通时间惯例的暂停和它们在非正统时间进食、饮酒和观看电影中的违反，飞机的节奏，对其他旅行的突然记忆，时差和时间迷失的特殊影响，对身体时钟对饥饿和口渴影响的意识，一种期待感和渴望到达的感觉。

在寻求有序叙述的过程中，叙事无法有效捕捉所面对的瞬间印象、特殊的短暂氛围、节奏、内在感觉和步行的物理效果。尽管步行穿越废墟可能特别破坏时间和物理的线性，但它概括了叙事在描述步行和城市流动性方面的更广泛不足（Reid 2005）。在废墟中，有沉思和回忆的时刻，对资本主义生产循环特征的认识，无数模糊的过去痕迹，对长期遗忘的短语和流行文化图标的震惊提醒，突然的警报或惊喜，对特定工业未来消亡的突然把握，饥饿的痛苦，衰变和自然生长的时间速率不断改变场地的特征，动物居民的不同日常活动，以及身体体验的碎片化节奏。讽刺的是，这种时间无序感与促进工业生产的严格调度和时间管理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失效时间性的迹象在打卡设备和公告板上的时间表中仍然存在。

我特别想提请注意步行如何唤起其他时间和地点，从而破坏任何线性流动。例如，当我的身体被迫面对上述弯曲的木地板时，我被抛回到童年时在布莱克浦游乐场（Blackpool Pleasure Beach）的Funhouse的访问，其中一系列狡猾的装置——移动楼梯、旋转圆盘、摇晃的踏脚石、巨大的旋转隧道——挑战了我直立行走的能力。在其他时候，我敏锐地意识到早已去世的工人阶级亲戚，他们的生活由艰苦的工业劳动常规塑造，也意识到我自己在工厂劳动的记忆。更模糊的是，我们在工业废墟中被过去的迹象所困扰，这些迹象将我们投射回我们半知半解或听说过的事物，对我们几乎无法识别的过去的回忆，并将我们带到记忆或想象中的其他地方。通过我们的脚步，我们追踪了废墟前居民的日常常规，并在这种意义上被他们所占据。这种幽灵般的方面延伸到沿着所有标记清晰的路径行走，在那里我们跟随无数其他人的脚步。

这些效果，以及其他仅作为几乎无法识别、难以理解或部分理解的痕迹存在的效果，告诉我们关于步行穿越废墟的故事只能是推测性的，不能依赖于硬知识或理解，也不能轻易地组成连贯的时间序列。碎片化、非线性、印象主义和偶然的故事比传统的线性叙述更适合在废墟中步行的体验。除了德塞托（1984）对步行多重表达的承认外，索尔尼特（Solnit）不仅认为步行产生了特定的“思考节奏”（2000, 5），而且认为“叙述的步行鼓励离题和联想，与话语的严格形式或传记或历史叙述的时间顺序进展形成对比”（同上，21）。即兴而非分析或预先确定的，如导览，大多数步行叙述是流动和不规则的。但无论如何，将步行的叙述置于优先地位，就是将其内在的、体现的、感官的特征置于次要地位，因为故事抹去了与空间的物理互动，其意义生成技术通常仅在事后、反思的概念化中被动员。词语只能微弱地暗示感觉，叙述的选择性内容只能指代所体验的一小部分。我们可以讲故事——尽管它们的影响通常取决于讲述者的技巧——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它们的片面性及其低估时间、空间和身体体验的奇特倾向。

#### 结论

步行是防止思想、身体、景观和城市侵蚀的一种方式，每个步行者都在警惕地保护不可言喻的东西（Solnit 2000, 11）。

我提出，步行穿越废墟，尽管有其独特的特征，但引导我们质疑更广泛的步行概念和描述。例如，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批判意识，以质疑许多城市和郊区空间的过度平滑、规范化的结构——或许还有精心修剪的自然形式。我还提出，步行穿越废墟的丰富体现、感官体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西方城市步行环境和体验的方式。正如思里夫特（Thrift, 2004）所指出的，除了精心制造的“嗡嗡声”使城市对居民、投资者和游客具有吸引力外，关于情感的叙述在城市文化的讨论中被忽视，或在关于城市表征和实践的激烈辩论中被淹没。步行穿越工业废墟突出了情感的渐进益处，因为它“允许我们在接受新的情感充实的揭示空间时保持开放”（同上，70）——那些以“小的、混乱的和临时拼凑的”为特征的不可表征的空间（同上，75）。尽管城市看似严格的组织和有序的外观，但总存在一些间隙空间，适合不同的步行方法，这些方法跨越有序和无序，并构成“一系列中断和重复，从构建的城市和未建区域的片段交替，在从满到空再回来的连续通道中”（Careri 2002, 186）。这些碎片化的空间突出了城市的可变性，使步行者能够“通过在它们的转变的此时此地领域采取行动来干预它们的持续生成”（同上，26）。因此，城市步行者间歇性地进入“模糊地带”（terrain vague），这是一个“提供与秩序和消费对城市的统治方式形成对比的领域……为自发的、创造性的挪用和非正式使用提供空间”（Levesque 2002）。

我对步行穿越废墟的讨论唤起了达达主义者试图使步行者从资产阶级理解城市的规范中迷失方向的漫游，解放他们对平凡城市空间中意想不到、未分类和深不可测的事物的情感反应。它还提醒我们超现实主义者试图通过步行唤起城市的“无意识”领域，这些领域“逃避计划控制，并构成传统表征中未表达、不可翻译的组成部分”（Careri 2002, 88）。也许最明显的是，我的叙述与情境主义者的“漂移”（derive）相呼应，通过打破既定的城市规则并发明游戏性的替代规则，识别出关键的情感岛屿。同样，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寻找“免于表征的领土”，处于“持续转变”中的空间和“思想和文化的废弃物”（Careri 2002, 166）。他在废弃的郊区工业场所、“熵的领土”中找到了这些元素，“由废弃物和破坏构成”（同上，168）。另一方面，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步行艺术结合了步行的物质、动物、植物、感官、行动导向和体现的维度，而不偏袒其中任何一个（见Edensor 2000a）。然而，除了朗的作品外，这些陌生化步行的尝试淡化了地形的感官、情感、物质和空间特异性，仿佛人类主体可以自由解释和体验，而不论所行走和经过的品质如何。在本章中，我试图将空间的物质性及其对身体的影响重新纳入步行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中。

### 第十章

走出教室：在阿伯丁的街道上学习

伊丽莎白·柯蒂斯（Elizabeth Curtis）

#### 引言

在阿伯丁，孩子们手持剪贴板走在街头的景象十分常见（###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 图10.3 作者作为AEEC（环境教育中心）导游时使用的注释手册

\*\*将街道转化为课堂\*\*

AEEC强调环境教育的综合性，突出步行过程中学习的多个方面。例如，在《维多利亚步道》教师指南的引言中，强调了参与步道活动与课程特定领域之间的联系。这些领域包括苏格兰学习与教学（LTS 2000）发布的5-14国家指南中的广泛科目，如社会学科、技术、数学、语言和表现艺术。中心明确将每条步道的潜在学习与国家指南的具体内容联系起来，这一做法得到了选择使用其服务的教师的认可。一位来自阿伯丁郡乡村小学的教师选择该中心进行维多利亚时代研究，理由是《维多利亚步道》和《维多利亚课堂》“完美匹配5-14标准”。通过步行穿越保护区引发的讨论，展示了“培养知情态度”这一关键技能，使孩子们能够质疑为什么过去的建筑需要保护，并思考当地规划法规在保护中的实际意义（Stewart 2002, iii-iv）。《二战体验》的领导者引言（Bennett et al. 2003, iii）也强调了与“公民教育”的联系，建议“正式教育应促进和培养的公民意识需要是深思熟虑和负责任的”（LTS 2000, 10）。

\*\*积极行为与有效学习之间的关系\*\*

积极行为与有效学习之间的关系是当前课堂组织和管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教师喜欢将引导步行纳入环境研究计划的原因之一。除了以课程为中心的学习目标外，领导者笔记还讨论了在步道活动中学习的社会规范，例如步行中的可接受行为模式。在《探索建筑》手册的领导者笔记引言中，明确列出了一套“户外工作规则”。这些规则提醒学生：“远离路缘和道路行走，随时注意交通，过马路时与老师或组长一起过，并注意其他行人”（Atherton et al. 2003, iv）。这些规则并未在学生手册中重复，因为预计组长会在步道开始时与孩子们分享，并在步行过程中适时提醒他们。对教师来说，重要的是这些规则与课堂规则相呼应。

\*\*通过步行探索与学习\*\*

沿着阿伯丁的街道步行为动觉学习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在与建筑环境相关的步道中，孩子们被邀请用手感受建筑材料的不同质地，如花岗岩、混凝土或砂岩。石头可能感觉热、冷或潮湿，这些身体体验帮助孩子们形成对特定建筑石材不同特性的理解，并了解建筑师、建筑商和消费者选择这些材料的原因。在《维多利亚步道》中，孩子们被要求“停在斯基恩街180号对面并倾听。你能听到流水声吗？”（Stewart 2002, 12）。在街道的这一段，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地下有一条小丹伯恩河在涵洞中流动。由于主干道上的交通噪音，通常很难听到水声。

\*\*探索与游戏\*\*

虽然鼓励和培养探索，但游戏并不是历史步道明确议程的一部分。部分原因在于小学对游戏的态度。人们普遍认为，学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学生无法通过游戏以外的其他方式学习。预计五六岁的班级在研究学校周围的街道设施时会想要玩耍，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孩子们被允许跑步、跳跃、喊叫、指指点点、单脚跳和拖步行走。为年幼儿童设计的步道允许领导者通过结构化的、以游戏为导向的步行帮助孩子们学习。一位教师在其班级参加了一次围绕学校的苏格兰家园步道后，在评估表上评论说：“班级非常喜欢房屋/家园步行和搜寻，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环境。”

\*\*从点到点的步行\*\*

《维多利亚步道》和《探索建筑》都涉及孩子们步行并观察建筑物的建筑特征，然后根据这些观察推断出建筑物设计的原因以及建筑如何反映居住或工作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然而，孩子们并不是连续行走的；他们遵循一条有计划的停顿的步道。这些停顿旨在让他们在远离交通的安全环境中观察和探索，尽管偶尔他们会被要求寻找街道名称或在步行时留意特定建筑物。环境研究的明确指导——例如，学习与建筑特征相关的词汇——因此在孩子们停下来观察和思考的停顿中发生。

\*\*创建步道\*\*

中心目前提供12条步道，涉及环境中的学习、关于环境的学习以及通过环境学习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维多利亚步道》、《二战体验》、《苏格兰家园》、《交通优先》、《探索建筑》和《与树共生》。一些步道具有历史性质，重点关注城市过去特定时期的证据，一些步道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另一些则涉及城市设计，包括交通管理。步道的路线确定方式也有所不同。所有历史步道都遵循通过阿伯丁特定地点的预定路线，例如《维多利亚步道》的罗斯蒙特地区。其他步道，特别是那些专注于城市设计探索的步道，其路线是与班级教师协商确定的，并在学生学校的步行距离内。步道内的结构程度也各不相同。由于历史步道遵循固定路线，孩子们创建了自己的步道叙述。他们因此发展了一项关键的历史技能：从历史证据中构建叙述。专注于生物多样性和城市设计的步道具有更开放的结构，较少强调创建叙述，以便孩子们可以选择在哪里停下来以及详细探索哪些特征。

\*\*《维多利亚步道》\*\*

最常步行的历史步道之一是《维多利亚步道》（Stewart 2002）。这条步道穿过阿伯丁的一部分，建筑物大多建于19世纪，将孩子们从市中心的三到四层公寓楼环绕的棉纺厂带到维多利亚时代富裕郊区的大型花岗岩房屋区。许多商店位于主街公寓楼的底层，还有几座19世纪的教堂。在过去的15年里，《维多利亚步道》在孩子们步行的距离和调查的范围和方向上都有所发展。最初设计时，步道布置在中心周围的区域，孩子们步行约一小时。现在需要大约两小时，并遵循虚构人物杰米·克雷格（Jamie Craig）在小说《煤气灯下的危险》（Ramsay 1998）中的杂货店路线，该小说由AEEC委托支持步道。一位教师在带领10岁和11岁的孩子参观中心后评论说：“孩子们学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知识，并使《煤气灯下的危险》栩栩如生。”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班级来自阿伯丁以南约40英里的乡村学校。参加这条步道的学校班级通常会参加另一项活动，以创建一整天的短途旅行，通常是在中心主楼旁边的重建维多利亚教室中进行角色扮演活动。

\*\*《探索建筑》\*\*

与《维多利亚步道》不同，《探索建筑》设计用于任何城市环境。其目的是“通过环境中的直接体验提高对建筑设计的认识”，并扩展学生对“当地具有重要意义###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 行人如何利用城市空间

行人完全依靠自己来利用为他们提供的空间。为了应对这些城市设计的新趋势，需要新的感知和行动框架。

\*\*图11.1 瑞士的相遇区域，一种上升的趋势\*\*

尽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商业街的彻底步行化仍然局限于城市核心区的小岛，并且因其窒息商业而受到无情批评，但最近在将步行友好区域扩展到整个城市的住宅区和混合用地区域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这些新的城市政策承认不同的出行需求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解决，但没有一种特定的需求（因此也没有一种交通方式）优于另一种。这是迈向全面公众认可城市步行者作为新社会类别成员的第一步。

#### 个人魅力的营造

在前往工作、购物或其他日常活动的路上，行人可能会选择一条稍微耗时但会经过某个特定公园、桥梁或小巷的斜线路线，仅仅因为这些地方会带来一丝魅力。突然间，他们仿佛置身于度假中，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美妙回忆之旅。魅力的所有要素都在这里：一方面是设计这些便利设施的魅力工程师，另一方面是愿意短暂逃避现实的游客。工程师们无法单独制造这种暂时的幻觉，只有路过的行人才能挥动魔杖。我们甚至可以补充说，提供的便利设施越开放、越容易让人投入个人情感，魅力的条件就越成熟。这是另一种说法，即个人赋权——通过魅力实现的个人占有——并不一定依赖于由专业魅力设计师设计的壮观设施。当他们的设计过于紧凑时，它们无法为个人的想象和历史提供空间，反而可能回归其物质基础——邀请涂鸦的平坦混凝土表面。

我们将探讨日内瓦的四种魅力营造策略。前两种非常谦逊：它们包括在城市各处种植小花园和沿湖修建简单的步道。这些显然与个人魅力和赋权有关。第三种是更为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工程，可以被视为明确的魅力营造；然而，它有时会引发公众的负面反应，公众可能会说：“让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我们是自己的魅力制造者。”这表明集体魅力和赋权不能由当局决定，而只能通过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来实现。第四个例子是一个成功的集体魅力和赋权策略，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漫步者”。

#### 口袋花园

小规模、几乎不被注意的便利设施，如目前正在日内瓦各处规划的“口袋花园”（Jardins de Poche）（Barbisch 2005），可能会为匆忙的行人在前往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的路上创造一条迷人的线索，暂时让他们停下脚步。这些花园的朴素绿化和几乎隐藏的长椅甚至可能会让行人的步伐放慢几分钟，因为在迷人的地方行走通常是缓慢而平稳的。尽管这些邻近的便利设施并不壮观，但它们在城市组织中的定期出现加强了步行网络的连续性。一个人可能会将这些花园中的每一个视为自己的私人空间，靠近家或办公室，但设计和目的的相似性使人们能够将这些特定空间与城市中其他地方的空间联系起来。绿墙和长椅以规律的间隔点缀每一条路线，并有助于将路线解读为一条连续的线索——构成城市结构的众多线索之一——而不是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断断续续的片段。

口袋花园为普通的城市景观提供了一个简单而连贯的钥匙。我们知道，普通的步行是由最微不足道的事件、短暂的幸福时刻以及重复和平凡组成的。穿越城市意味着通过可预测的迹象、仪式和节奏来确认自己正在遵循一条既定的路线，同时体验小意外发现带来的惊喜和愉悦。尽管口袋花园可能为所有城市居民所用，但正是由于其规模的谦逊和设施的简单，它们可能成为个人占有的载体，让人感到“这是我自己的小花园”。它们构成了“氛围”，有助于（重新）发现城市中的愉悦感（Amphoux et al. 2004）。

\*\*图11.2 口袋花园：长椅作为魅力的框架装置\*\*

#### 沿着罗纳河

其他便利设施，如在水滨复兴项目“沿着罗纳河”（Au fil du Rhone）框架内开发的设施，旨在通过水流的统一线索，为沿河的步行路线提供连贯性和力量。这些设施既作为连接器，也作为象征性地标。它们以独特的方式为那些在步行区域移动的人构建了城市景观，并因其地标和景观特性而吸引人们。这种装置的框架力量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在地面以下其实际用途仍然是个谜，但人们可以自由地解释它在地面上创造的城市景观。它已成为观看河上渐逝光线并让生活缓慢流逝的理想场所。

口袋花园和沿着罗纳河项目都优先考虑重新设计邻近的便利设施，以增强普通的公共空间，并在住宅区中为原本因缺乏可识别地标而变得难以辨认的路线提供节奏。

\*\*图11.3 Seujet步行桥，水流与行人融为一体\*\*

#### 城市的眼睛

另一个优先考虑邻近便利设施的举措是一个短暂的年###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 东京地铁中的迷失

地铁当然只是一个例子——它让我思考它与我在东京地铁中的项目之间的关系。我的探索意图同样是诗意和个人的，尽管我的目的和体验与奥格（Augé）大相径庭（毕竟，奥格对地铁的描绘源于他一生的地铁旅行经历，而我是一个新手访客——无论是国籍还是目的，我都是一个局外人）。这是一次与系统背道而驰的体验，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但这也为项目提供了某种切实可依的东西。

东京这座城市建立在日本企业独特的合作竞争原则之上，这些企业将经济实力与社会角色相结合，通常提供金融服务、儿童保育，甚至在私人巨型建筑中提供地方政府和广播服务。正是这种城市活动的混合，以及我在地铁站本身发现的多样性，使得漫游（flânerie）成为可能。东京城市漫游模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联系通过地铁站的布局得以体现，这些地铁站通常与百货商店相连。城市被结构化为多个较小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中心，围绕交通、经济和社会枢纽展开。这些枢纽取代了市政厅的功能，拥有剩余的空间，替代了城市广场。涩谷站周围的空间就是一个例子。八公广场是该区夜生活的聚集地，也吸引了希望来此表演的摇滚乐队，或者仅仅是为了享受演奏的乐趣。车站的其他区域则吸引了街头小贩、街舞者和摩托车帮派，这些地方在任何带有社会属性的有效城市环境设计中都无法通过建筑审查。东京的不同区域提供了更多极端的例子，这些地方本应无法运作，但不知为何却成功了。池袋站及其西武百货商店拥有丰富的社会生活，虽然不如涩谷那样以青少年为导向，但依然被认为为参与者赋予了强烈且有价值的本地身份。

我的系列绘画《东京迷失》（Getting Lost in Tokyo）源于我在2003年1月和2004年1月两次前往东京的旅行（Lucas 2004; 2008）。这些旅行表面上是对一个长期吸引我的地方的观光之旅。部分原因是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的电影旅行日志《无日》（Sans Soleil）中对美丽和幸福图像的追寻最终说服了我前往。我作为一个旅行者到达那里，虽然对当地有一定的了解，但对语言和习俗没有实际的接触或知识。我对东京的访问回应了我对漫游理论、情境主义漂移和景观的阅读。在众多体验中，有一个特别有趣——那就是乘坐地铁，尤其是穿越巨大的换乘站，如涩谷或新宿，这个项目的核心车站，有大约七十个出口。在这些车站中导航引发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如何在这个地方找到方向？”东京地铁的特点与巴黎、伦敦和纽约的地铁有何不同？

传统的空间地图或平面图对理解或找到路线毫无帮助；那么成千上万的通勤者和其他用户是如何定期应对的呢？我是如何应对的？鉴于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没有任何实际意图或目的的特殊情况，我在这个地方与人群的流动背道而驰，尤其是在传奇的高峰时段。通过记忆重建我使用新宿站的体验，我发现它最好用流程图来表示。这使我能够包括我在空间中进行的所有旅程，包括找到方向、迷失、离开或仅仅是为了换乘线路而通过。这个流程图将叙述分解为片段——每个片段彼此不同，并不与特定的地点绑定。流程图的片段性质使得一个复杂且不固定的整体被分解为可管理的部分。

这个环境的可管理性主题贯穿了整个作品。片段划分的主要目的是让每个较小的元素能够以拉班（Laban）符号表示。这是一种最常用于舞蹈编排的符号系统，用于追踪舞者的动作。在其中，时间从下往上读取，中央垂直线代表身体的垂直轴。两侧的形状记录了身体特定部位的动作（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并触摸火车。图表显示，运动是复杂、重复且多变的，我们可以开始看到符号本身可以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手势。系列中的每个符号描述了每个动作在通过地铁站时对身体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后，这一系列符号揭示了几种反复出现的主题——旅程中常见的元素。在三十个片段中，有十五个主题在符号中反复出现，尽管以不同的程度、位置和关系出现。这种重复让我考虑下一步，即使用甚至挪用（情境主义风格的误用）建筑绘图惯例。由于我的目标是在实际的建筑空间中重建一种体验，我必须避免任何试图重建新宿站实际平面图的尝试。采用轴测图的投影惯例，我将每个事件强行压缩到一个代表时间流逝的狭窄走廊中。我没有尝试调节空间的照明，例如将其置于朝北或朝南的环境中，也没有给出任何人工或天空照明的暗示。仅通过形式来描绘。这增强了“非场所”的感觉。平面图和剖面图本可以更容易地“设计”出这种方向感，但我选择强加一个图表——特别是迷宫（与迷宫相对）。在这个空间中最长的路线是由迷宫路径采取的，它螺旋向中心前进。这有意让人联想到塔可夫斯基（Tarkovsky）的《潜行者》（Stalker），其中目的地大多数时候是可见的，但只有半超自然的潜行者向导才能导航其隐藏的陷阱和陷阱（Tarkovsky 1986）。

图12.4 《东京迷失》中的建筑块原型

图12.5 源自塔可夫斯基电影《潜行者》的迷宫区域布局，来自《东京迷失》

#### 迷宫

整个迷宫的绘图向我们展示了系列的最终替代品。系列的片段性质使我们能够一次理解一件事，品味和理解每个细节和决定，而不会被整体所压倒。事实上，绘图系列可以作为回答“一个新手如何学会在这个不断随着高峰时段人群流动而变化的巨大复杂空间中导航？”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一次应对一两个片段，但不能同时应对所有三十个片段以及所有可能的决定排列。

城市是人类古老梦想的实现，迷宫。漫游者（flaneur）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奉献给了这一现实。尽管他不知道；然而，没有什么比传统论点更愚蠢的了，这些论点合理化了他的行为，并构成了大量追踪漫游者形象和举止的文献的无争议基础——即，漫游者研究了人们的面相外貌，以通过他们的步态、体型和面部表情来发现他们的国籍和社会地位、性格和命运。对隐藏漫游者真实动机的兴趣一定非常迫切，以至于引发了如此拙劣的论点（Benjamin 1999 [M6a,4] 429）。

波德莱尔（Baudelaire）中的群众。他们在漫游者面前像面纱一样延伸：他们是孤独者的最新毒品。——其次，他们抹去了所有个人的痕迹：他们是堕落者和后记的最新避难所。——最后，在城市迷宫中，群众是最新且最难以捉摸的迷宫。通过他们，以前未知的地下特征被印在城市形象上（Benjamin 1999 [M16,3] 447）。

整体的恐怖由塔可夫斯基的迷宫代表，其中通往期望中心的路径总是清晰的，但只有那些熟悉区域方式并能够避免其无形危险的人才能找到。

一个来源被记录得越多，意义积累得越多。但这种积累的结果是什么？这种对独特城市事件的解释为我提供了其他练习所没有的挑战。与传统建筑绘图对静态装置的关注不同，我可以描绘广告和标志对注意力的分散、人群向目的地移动的方式以及一个人如何在一个空间中导航。我的目标是探索这种建筑符号的使用与传统设计和建筑中使用的绘图惯例之间的差异。通过绘图系列还展示了建筑体验比通常在其表现中描绘的要多得多——包括建筑摄影——这些表现通常没有任何居住的迹象。通过表现其他关注点而不仅仅是实与虚的对比，我们拓宽了建筑和我们对城市的体验的范围。

图12.7 《东京迷失》中的照片示例

以这种方式记录城市不仅仅是表现体验的一种方法。有更直接的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点，例如通过散文写作或制作纪录片视频。通过图表、符号、绘图和摄影以这种方式工作的目的是更全面地理解体验。因此，记录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过程。

行走是如此基本的人类实践，以至于它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们的其他活动。艺术、建筑和其他创造性实践也不例外。这里简要概述的只是大量艺术行走中的一小部分。风景如画的景观确实可以被视为同一事物的早期版本，尽管位于荒野而不是城市。然而，城市的特定条件需要不同的方法。正如上述艺术家所发现的，城市漫游需要不同的表现形式。正如保罗·克利（Paul Klee）所描述的，画一条线就是将表面概念化为一个可以行走的领土。这是从日常共同经验的角度理解艺术实践。我在这里建议的是，不同的行走模式涉及两种表面的领土——景观和艺术媒介如画布或纸张——以有趣和新颖的方式。

城市提出了与乡村或荒野环境不同的领土概念。当然，仍然可以以浪漫主义景观或文艺复兴宫廷绘画传统的方式描绘当代城市，但这将是有意从另一个背景中挪用形式。有了对这些事物的态度，艺术家、建筑师或人类学家可以对其选择实践的领土的表现和居住做出自觉的选择，无论是城市本身还是一张纸。

### 第13章

可收藏的地形：行走、记忆与记录山脉

海登·洛里默（Hayden Lorimer）与卡特琳·伦德（Katrin Lund）

#### 引言——收藏的回路

对于收藏作为人类特有的倾向，小说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几乎没有什么好话可说。在大小收藏家中，他最强烈的谴责留给了那些习惯从自然世界获取东西的人。至少在一个意义上，福尔斯的批评是有针对性的。他可以从个人经历中写作。作为一个孩子，他曾是一个狂热的蝴蝶收藏家。以为这些童年的日子早已过去，享受着中年的悠闲，一只罕见的帝王蝶的出现激发了他无法控制的追逐欲望。震惊（尽管以一种最文学的方式），他发现自己不是在追逐脆弱的猎物，而是奔向“埋藏记忆的大陆”和“对自然的盲目态度”，这种收藏的激情在他心中滋长。

这完美地说明了由对自然的业余爱好态度带来的变形和盲目性。它将自然变成了一种周末去娱乐的高尔夫球场；变成了一面镜子，你在其中炫耀你命名的技巧。它剥夺了自然的复杂性、丰富性、诗意、象征意义和对应关系，以及它在人类存在中的潜在中心地位。比它对误入歧途的自然历史学家造成的损害更糟糕的是，它对绝大多数对自然漠不关心或中立的人造成的损害。如果这是唯一的途径，那么难怪他们会耸耸肩转身离开（Fowles 1984, 83）。

福尔斯强烈保护原始的遭遇，迅速驳斥了大众对自然的描绘，认为它们过于强加、简化和粗俗，“悲惨地滞后”或更糟，“致命的扭曲”。当然，厌世将为福尔斯带来一定的恶名。抛开傲慢和自负不谈，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坚持认为，对自然的高尚欣赏通常从属于他所认为的一种大大减少、较低形式的认知。他的信息很明确：只要分类、记录、列出和打勾的概念冲动占上风，我们对自然的共同反应就会更加贫乏。“并非如此！”，我们会回应，因为这些挑衅直接关系到本章及其对行走和收藏作为社会遭遇形式的考虑。在其中，我们希望揭示一个更复杂的交织，其中收藏发生在行走中，伴随着认知的雄心、情感和身体的反应。

福尔斯的文章提供了进一步批判性思考的资源。“盲目的眼睛”是他文章的标题，提醒我们收藏家对积累事物的热情在其中心有一个强大的视觉。收藏首先是被看到的东西。要欣赏收藏，我们需要学会通过观察者的眼睛看事物。一旦展示出来，这些集合就真正成为我们凝视的对象。尽管可见性很重要，但收藏也有触觉的吸引力。确保所有权可以赋予触摸感觉的专属权利。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占有性的主张：“我拥有并持有”（Blom 2003）。在那些拥有——以及那些被委托管理、评估或欣赏——的人中，与收藏内容进行身体接触的可能性是一种特权。与此同时，在不同的收藏社区中，判断、组织、检查、保存、重新检查和比较的任务作为灵巧的手和敏锐的眼睛之间的一系列对应关系发生。我们将这些感知练习中的每一个编码为视觉-手动，很容易被忽视。在最近的学术文献中，触觉意识通常被认为是通过手指、拇指和手掌的工作体验到的。对于收藏评论家来说，认知的回路仍然是坚定的头脑风暴。精神分析的流派将积累的欲望推向了下方。在这次展示中，我们希望进一步下降到身体的末端。接受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2004）的邀请，更好地融合认知和运动，我们希望优先考虑通过脚趾、脚跟和脚底首次遇到的收藏行为模式，并考虑当脚使收藏成为可能时会发生什么——以及它有什么不同。

#### 收藏作为一种地形传统

脚下的收藏品，以及这里审查的对象，是苏格兰的284座山峰，每座山峰海拔至少3000英尺（914米）。作为物理场所，它们在外观和特征上差异很大：从岩石山峰和圆顶到广阔高原的平坦高点。作为兴趣的对象，这些山峰属于收藏家的一个不寻常的类别。由于重力法则和开放的公共通道，它们不能被物理移动或完全从私人所有权中撤出。作为不可移动的文物，可以说苏格兰的山峰是一个民主的收藏空间。

总的来说，这些山峰通常被称为“芒罗斯”（Munros），以登山家和地主休·芒罗爵士（Sir Hugh Munro）的名字命名，他在1880年代根据海拔高度制定了分类系统。通过脚力、地图绘制和绘图工作的结合，他对苏格兰高地的地形调查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在执行中这个项目要求很高的体力，但芒罗制作的一系列根据海拔和区域部分标准化的地形“表格”同样受到他推动科学知识的雄心的驱动。芒罗在他的地形分类系统中没有预见到任何大规模的娱乐吸引力，他的苏格兰登山俱乐部（Scottish Mountaineering Club）的同行们也没有，他们支持了这项调查工作并发表了结果。今天，收藏芒罗斯的人数数以万计，并不限于居住在苏格兰的人。苏格兰登山俱乐部继续管理芒罗的表格，保留对由技术变革引发的各种修订计划的总体责任，这些变革导致了改进的调查和制图技术。地形“事实”通过持续的制度安排得到认可，这对巩固该系统的历史地位很重要（Lorimer and Lund, 2003）。虽然芒罗斯是一个无法以传统方式收藏的收藏品，但创始的系统结构确实有一个公认的精神-制度家园。从管理上讲，表格的维护并非微不足道的任务。一旦山峰被授予芒罗地位并“提升”到表格中（或失去其地位并被移除），这一决定很快反映在选择登山的步行者和登山者的数量上。曾经难以辨别的登山路线现在从远处就可以看到山腰上的小径。侵蚀和积水发生在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地方（Access Forum 2000）。因此，委员会房间中做出的分类决定对环境有直接影响。

今天，作为一种半正式化和全国性安排的机制，使人们能够组织他们登山的方式，芒罗的表格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尽管对于比较文化，参见Solnit 2000）。作为一个拥有共同娱乐热情的社区，步行者兼收藏家非常多样化且自我区分。早在学术分析介入之前，“芒罗主义者”就有了他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政治。声称你“在做芒罗斯”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过于明确和赤裸裸的意图声明。它给步行带来了未能达到期望的焦虑，并且在决定应该爬哪座山时可能无益地自我调节。对于那些收藏冲动或竞争欲望最强烈的人来说，“芒罗袋客”（Munro-bagger）这个词被保留了下来。这个标签让人联想到一个角色，他接受了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锻炼，并试图“尽快完成”。虽然不是对性格的完全贬低，但也不是完全恭维，“袋客”这个标签是很少有步行者自愿用于自我描述的。鉴于这种污名的可能性，步行者在任何自我展示中都可以对他们的收藏保持警惕或掩饰。他们提供的是不那么直接的解释或动机，说明为什么花时间在山上。更全面的收藏评论可能是更安静的忏悔内容。在同伴中，通常更倾向于培养一个堕落的收藏家、不情愿的收藏家或自我模仿的收藏家的地位。收藏芒罗斯的努力通常被降级为副项目。小心避免自己的类型学，步行者不愿意将单一目的或优先权归因于步行-收藏。许多人识别出在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步行中，意义的不同变化。通常会出现一个叙述，即最初的年轻紧迫感逐渐消散为一种“更成熟”的行为形式，不那么受驱动，也不那么受窒息的规定。同样，步行者声称对整体收藏“游戏”失去兴趣，或放弃任何完成的希望，同时继续秘密地积累山峰，这并不罕见。

芒罗斯是苏格兰山地休闲场景的重要现象：无论是被视为一次伟大的世俗朝圣、一个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还是一种商业营销机会（Highlands and Islands Enterprise 1996; Dempster 1995）。事实上，对芒罗斯的认可不仅限于实践者和活跃的收藏家。作为日常文化货币的山峰标志多种多样：公共建筑和工作场所的海报鼓励人们走楼梯，从而将累积的楼层转换为芒罗斯；周末天气预报提供3000英尺以上气象条件的特定信息；指南书和摄影庆祝是足够畅销的书籍，以至于高街书店为它们提供了突出和永久的货架空间。这种蓬勃发展的山地流行文化及其多样化的表现舞台可以进行更详细的审查，然而在本章中，所引用的材料——在与山地步行俱乐部和“山地步行者”群体的参与性研究中记录——紧密跟随步行中发生的行动。与步行者同行，并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希望将收藏视为一个开放的事件和进行中的活动，而不是文化上受限或已经评判的。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专注于四对实践，它们以山峰为背景：即定位与识别、积累与记忆、完成与实现，以及记录与报告。这四对实践讲述了步行者-收藏家中山峰的社会世界和后续生活。在结论中，我们注意到山峰收藏的地理如何对最近关于视觉、收藏和空间思维的涌现和实践性质的辩论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不再拖延，让我们进入山峰上的事件...

#### 定位与识别

在旧约中，山顶——就像沙漠一样——是启示和神圣干预的地方。它是一个具有戏剧性大气极端的地方，可能在你面前，甚至在你内部，产生精神上的视觉。但你也可以去山顶采取不同的措施，这样做似乎视觉是步行者的主要能力。正确“看”通常意味着停止前进并看到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山顶是山地步行者最喜欢的落脚点。

山顶提供了一个确定且静止的点，在一天的移动中，一个可以衡量周围环境、已经完成的事情和尚未完成的事情的地方。它们允许步行者在行进中自然停顿，并已被理解——至少在英国休闲文化中——为暂停或闲逛的道德正确场所。在山顶的宝贵时刻，步行的特征变得松弛和漂移。不再是一线性的，不再受驱动或目的固定，尽管仍然刻意设计，这里充满活力的运动让位于漫游。随着任何继续前进的紧迫感暂时被压制，对更高地面的期望现在消失，缓慢定义了山顶的即时地形及其社交场景。在风速和其他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练习的目的是花时间。在其他地方，很少会用“闲逛”来描述人类活动。如果休息和沉思被认为在山顶是“应得的”，那么在这些地方最重要的是某种意识品质。从山顶，人们通过定位和识别的社会实践吸收视野。在好朋友和完全陌生人中，这种视野——或缺乏视野——是轻松且完全可以接受的随意对话来源。在欣赏全景时，交流轻松地转向对山脉和山峰的识别。想象一下，在到达山顶后，听到这些地理问题（和答案）：

“那边那个大而笨重的是什么？左边。”

“哪一个？那个？”

“不。那个。那个云刚好遮住顶部的。”

“可能是克雷格·梅在行走的过程中，通过环境因素的出现，实践的空间性得以显现，它在偶然事件中找到突破口，同时又被最精心设计的编排所推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结果，我们需要将其视为一种流动且偶然的现象，它内在于实践中，因此只有在实地考察时才能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在284座山峰的顶峰上，视觉和顺序的排列几乎是无限的，这为生成个人拓扑提供了机会：只有全景中某些可见的山峰或高点才是“可收集的”；并非所有的山峰都因攀登而变得有意义；从任何一个顶峰上，已经攀登过的其他山峰都是可见的，但整个收藏却无法一览无余。对于收藏者来说，在任何一天，收藏都是一个恒定的存在，但每次出现时都会略有不同。眼前所见是不可重复的。这种体验可以比作在一本早已放下并重新上架的小说中发现书签；或者试图回忆起之前中断的对话的要点。你可能会自信地从上次中断的地方继续。或者，故事可能已经变得陌生。景观特征，可能只是瞬间可见，交织在生活的过去片段中。从山顶和山脊上，根据不同的天际线来审视收藏的景观。因此，记忆、时间和地点的集合，根据可见-可记忆景观的独特“事件视界”而清晰或模糊。审计和整理在“行进中”进行，作为一系列具身记忆和传记故事，使脚和眼协同工作。因此，对于许多在苏格兰的步行者来说，收集山顶提供了一种引人入胜的景观拟人化。

完成和实现

完成的可能性是收藏吸引力的基础；正如对收藏未完成的恐惧必须永远被避免。休·芒罗（Hugh Munro）的分类系统因其有限的组织性，使得完整性成为可能。对于那些渴望完成的人来说，有一个终点；从一开始，最终的目标就在召唤。苏格兰悠久的地球物理过程历史在这方面是仁慈的。步行者必须覆盖的地表面积相对紧凑；没有一座山离分类系统中的其他山太远。总共284座山峰通常被认为是“刚刚好”。对于身体健壮且坚定的山地步行者来说，芒罗山完美地体现了可能的艺术。通过规模、数量、海拔、排列和范围，它们是一个可以完成的收藏，但通常只有经过多年的坚持和努力才能实现。在步行者中，稳步前进以实现全面覆盖的目标带来了普遍的满足感：

……你可以说，去年我登上了那座山、那座山和那座山，你可以拼凑出你走过的区域，这就像一个大拼图，因为你站在高处，看着拼图的碎片，试图将它们拼合到位。

当然，完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也不总是可取的。曾经的收藏者可能会发现兴趣消散，分心的事情出现，最终更喜欢其他消遣。许多步行者继续表达对攀登山脉的巨大享受，但发现他们的收藏欲望已经减弱。

完整性的目标可以再次以不同的方式体现。所有的山脉都位于高地和岛屿——这是对苏格兰浪漫和原始版本的地理想象——因此吸引了那些将步行视为一种政治激进主义或农村军事行动以争取进入权的人，以及那些寻求在荒野伦理中避难或支持恢复本土生态社区运动的人。地理知识在不同的整体性主张中提供了安慰。收集山脉的实践对苏格兰当代景观的文化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完成并不总是直接或最终带来满足，正如许多不同的收藏理论所提醒我们的那样（Belk 1995）。对于攀登苏格兰山脉的困境，当地有不同的反应。步行者将通过重新开始收集来测试他们的耐力；然后如果必要，再次开始。此外，还存在“附属”地形分类系统，适用于海拔2,500至2,999英尺之间的数百座山峰和山顶（“科贝特山”），以及海拔2,000至2,499英尺之间的山峰（“唐纳德山”）。一些步行者发现同时从每个收藏中收集山峰是一种乐趣。

完整性也是收藏者可以体现的一种品质。做“芒罗山”是一种个人声明，可以为实践者带来深刻的满足感。步行的这一方面呼应了其他以生活方式管理为中心的社会文化话语，以及通过目标设定实现个人肯定的激励策略。“成就”和找到“结束”在步行者描述收藏如何塑造自我时占据了重要位置。完成收藏的动力可以来自步行者的不同来源。对于一些人来说，道德完整性和内在确认与自我决定和作为苏格兰人的身份形成密切相关。在这里，脚步的节奏敲响了爱国的节拍。就像其他步行者对领土关联的决定——例如古老的“敲打边界”习俗（Olwig，本卷）——步行穿越国家，并根据其最高点，是对某些国家版本的参与：有时强烈感受到，有时则更为分散。随着收藏的发生，归属感以亲近和熟悉的感觉表达出来，脚最有意义地体现了与土地的联系。摆脱了沉重的学术负担，收集“完整”的地理知识带来了一种轻松的狂喜。这种魅力可以以更壮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组织并表演爱国主义以标志最后一次芒罗山的攀登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山顶庆祝活动可能会融入某些苏格兰身份版本的戏剧性装饰：风笛手、苏格兰短裙、威士忌祝酒和诗歌朗诵。有时故意讽刺，偶尔颠覆，这些高度表达的归属感仍然是对国家理念的集体投资。

如果任何一个山顶都可以为一天的步行提供一个终点，我们必须注意到步行收藏作为一种爱好如何成为通往完全不同目的地的途径。我们走向的地方不需要通过主权主张来识别，也不需要参考北向和东向。在步行收藏的体验中，产生了一种遥远的、地平线悬浮的开放性——一个不那么可定位的他处——使人们能够将自我提升到一个有抱负的版本。步行通常以生成性、充满希望的术语解释：带领人们踏上一段旅程，至少部分地走向更大的个人安全感，重燃过去的愿望和生活抱负。最明显的是，山地景观具有治疗作用，是人们去调整自我以与通常被视为永恒节奏、元素、体积和表面的狂野浪漫自然相协调的地方。在这样的访问中，无论多么不频繁或基于周末，都有更高生活的承诺。反直觉的是，归属感和安全感可以在他处找到。这种情感安慰不仅仅是失去地方感，也不需要“非地方”来实现。他处可以简单地意味着非日常的景观。不那么隐晦，当然更坦率地说，芒罗山是在个人专栏中刊登广告的社会可接受替代品。如果收藏是一个潜台词，那么山脉就是人们渴望爱情、亲情、友谊或灵魂伴侣的基底。步行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社会空间，让人们了解他人，感到被接受并融入其中。许多步行者收集是为了再次感到（稍微）完整。

对于登山者和山地步行者来说，实际记录收藏内容的过程总体上是一件家庭事务。通常，记录最近出行的细节，从而正式编目任何新的山顶收获，是在家中舒适进行的。每个收藏所采取的物质形式可能大不相同，这种形式直接影响每个人选择记录的体验细节的数量。至少，公认的获取做法是在笔记本中记录山的名称，可能还会在旁边打勾。对于这种领土征服的谦虚姿态，可能会添加：任何山峰的攀登日期，当天出行的总距离，遇到的天气条件，步行同伴和进一步的描述性笔记。为此，许多芒罗主义者保留了一本传统的日志。一些版本已经为此特定目的设计和出版（例如Butterfield和Baines 1992）。同样，《芒罗山》（Bennet 1999）——苏格兰登山俱乐部出版的攀登苏格兰最高山脉的公认指南书——是一个公认的源文本，可以在边注中添加手写笔记。作为补充，步行者可能会选择用定制的芒罗山地图装饰房子的一部分（通常是厨房或书房墙壁），通过插入不同颜色的图钉来记录进度。更具创意、个性化的记录和展示练习包括剪贴簿、绘画或素描本和相册，每个都捕捉了成功攀登的某些图像方面（Rose 2003）。其他步行者已经接受了新媒体和技术作为记录成就的替代手段。基本的电子表格或更复杂的数据存储包用于在个人计算机上保存收藏。虚拟个人财产具有可转移性，可以在多个位置安全保存，被认为是对火灾、洪水或病毒“丢失”的有效保险。最近，安排展示“收集”探险照片文章的个人网页已成为展示个人收藏的更公开论坛。应该指出的是，很少有芒罗主义者自信到仅凭记忆来保存他们的收藏。即使对于最狂热的收藏者来说，过去时间和地点的回忆也会慢慢侵蚀和淡化。一旦离散，出行开始融合在一起，平淡无奇的攀登失去了它们曾经拥有的定义。因此，可能会产生令人担忧的怀疑，是否真的曾经去过某个特定的山顶：“我？那里？但什么时候？”记忆和景观的变幻莫测。

尽管形式多样，但在性质上大多是谦逊和自制的，芒罗收集的物质文化是户外社区收藏实践的组成部分。就收藏而言，许多步行所剩下的可能只是来自众多过去经历的稀疏文本或选择性视觉见证。然而，这些记录形式所服务的社会功能与更传统的收藏类别所服务的功能并无不同，在这些类别中，获得的物质对象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更直接地与努力相关。想象回到山顶的前景至关重要。对于一些山脉收藏者来说，编写日志的满足感仍然是一种谦逊的个人事务，对其内容的任何回顾都被视为偶尔的享受或内疚的乐趣。即便如此，对目录持续存在和安全保存的某些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不总是记忆的主要场所，它也被视为生命的记录。进行不同类型远足的前景可能是一种不同的诱惑。一些步行者发现频繁查阅日志和更新库存是一种乐趣。芒罗收集有其自己的狂热爱好者亚文化，对他们来说，事实是步行的额外奖励，他们过去爱好中更神秘的数字方面是强烈兴趣的来源。因此，娱乐性记账提供了一种基于步行努力统计分析的无害消遣的入口。根据不同的变量（例如进行步行所产生的汽车里程、步行覆盖的英里数、季节和日历月份、山顶景观的频率、步行同伴和每年山顶获取率），可以推断出全新的列表和事实，以及额外的个人意义层次（Campbell 1999）。其中大部分是深奥的东西，充满了自知和戏谑的自我模仿。步行者兼收藏者激发了他们对数字游戏的热情，并在（现在基于网络的）粉丝杂志《愤怒的科里》中庆祝“芒罗学”的狂热荒谬。

当然，打勾列表或保留日志是为了期待最终的山地步行，当收藏完成时。存在一个正式的机制来报告最终到达这一个人里程碑的事实，这带来了相当大的鼓励。自20世纪70年代末需求增长以来，完成芒罗山的步行者被欢迎写信给苏格兰登山俱乐部，要求将他们的名字添加到“芒罗主义者登记册”中。每个步行者都会收到一封确认信，分配他们在登记册上的编号，从而将个人成就与过去和现在的同行学院并列。在报告“完成”的协议中，信任的伦理占主导地位。不采取个人证词，任何主张的可信度都不受质疑；实际上，步行者只对自己负责。自然，一些步行者在完成芒罗山后没有公开他们的成就的愿望，也不加入登记册。根据最近的报告，完成芒罗山的步行者数量已经超过了三千人。过去二十年中，每年完成的步行者数量呈指数增长。

结论——收藏文化

在本章的四对以山顶为导向的社会实践中，我们试图回应最初提出的两个相关问题：即，人们在步行时如何发生收藏，以及它究竟是如何体现的？作为对户外收藏的光学和机械学的探究，我们注意到了Driver和Martins（2002）的建议，即应更加努力“将眼睛恢复到身体”。因此，我们专注于人们在步行过程中收集山顶时发生的看、感觉和移动的模式。作为结论，可以勾勒出三个更一般的观点。第一个关注步行和看的实践的不可分割性；第二个关注收藏的持续社会生活；第三个关注通过“芒罗山”作为一种特定的、定位的步行兼收藏文化揭示的空间形成的新颖性。

首先，虽然很难将拥挤的山顶场景个体化，但可以将经验扎根并在地理上定位特定的看的方式。基于民族志方法的观察性参与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现有学术背景下。出于非常不同的学科内和认识论原因，认知地图（见Laurier和Brown 2005；Laurier和Brown 2008）和女权主义批评（Rose 1993）将实践的人类主体与看的理论分开。通过近距离观察实践，山脉收藏被揭示为一种提升的看的表达，但总是由步行者接地。因此，我们认为感知是在不同眼睛和脚之间的一系列对应中获得的。非常明确的是，无论是看的能力，还是任何看的方式，都不是脱离的。

其次，像芒罗山这样的收藏的固有可塑性应该提醒我们，将收藏视为一种狭隘的目标导向实践的局限性。获取远非全部。正如我们所概述的，在山地步行的不同阶段，个人收藏可以时隐时现。它可以减少为模糊的愿望，然后以比预期更大的紧迫感重新出现。收藏的本质是临时的。它将通过持续的（重新）收藏重新组合。收藏不能被剥离或变得被动，作为社会行动不断展开的背景。但收藏也不是一种超越的、有序的步行机制，总是占主导地位，决定一只脚在另一只脚前面的位置。尽管如此，我们愿意承认收藏似乎是一种最英国式的关注，并想知道它如何与其他欧洲传统通过景观步行的传统相比较。

我们的第三个结论点涉及“社会”理论家最近的工作，他们寻找新的概念主题，以应对当前通过人类和非人类代理、新通信技术和各种自动移动性构成的不可抑制和内在的空间性（Urry 2001；Thrift 2007）。最具雄心和前卫的（探索火、烟、凝胶或流体的特性）确定了拓扑图形和复杂形式，被认为更好地捕捉了始终在形成中的社会世界，其中关系通过共存条件和传统尺度或维度的崩溃而出现（Law和Mol 2001；Law 2004）。我们在本章中考虑的内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更稳步、脚踏实地且积极步行。至少我们希望如此。虽然塑造生活的新空间形成有其时刻，但旧变体不应被忽视。从步行——这种最普通和古老的运动形式——中出现的社会世界产生了相当复杂的空间安排形式。在那些专注于苏格兰山脉的休闲山地步行者中，有大量的几何、地图和生命线需要在该国的最高点上绘制。我们可以将这些视为仍然依赖于传统地形知识形式和良好接地模式的连接、关联和依恋的收藏地图。